

权 利 声 明

对 从 博 库 网 (www.BOOKOO.com.cn 和 / 或 www.BOOKOO.com) 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OO, Inc. 的商标。

目录

权 利 声 明.....	1
目 录.....	2
走过西藏 那些路	4
1 引子.....	4
以情节串连的心灵的呼唤	4
那条黑色的河流.....	4
手拉手儿到拉萨	20
古老的藏歌.....	24
2 引 子.....	26
汉族姑娘眼中的藏族风情	26
江畔夜话.....	31
高原植树日.....	39
没有厕所怎么办.....	42
3 引 子.....	45
处于现代矛盾中的藏族人	45
想上大学的人.....	45
生活中应该多一点.....	52
4 引 子.....	63

拉萨一个中专学校里的故事	63
远飞鸟儿请告诉我，拉萨景况怎样	63
珞巴少年	67
阅览室内	74
相交织的命运	76
雪原上的韵律	78
5 引 子	96
与西藏结缘的汉族大学生	96
坟上飘 哈达	97
如果生命出现塌方	104
6 引 子	113
雪域高原静穆中的反思	113
何处是家乡	114

走过西藏 那些路

1 引子

以情节串连的心灵的呼唤

张永康，重庆人，1954年生，当过兵。曾在拉萨汽车五队任驾驶员。

张永康，请原谅我，小说是允许虚构的。

若你能看到这几行字，请与我联系。我渴望和你以及你的家人，吃一餐饺子，用凉菜下啤酒。

餐桌上，我们只谈风雪青藏线，只谈赤裸着的灵魂面对狂暴的大自然时，心灵深处无需遮掩的东西。

那条黑色的河流

雪山阴暗了。天空罩上一张巨大的灰色帆布，使整个原野混沌一片；这张帆布还不停地上下翻动，搅起团团灰沙，奔驰向北。

被罩在帆布底下的，有一辆满载着砖茶的柴油车，车头上五个字母：ISUZU。

驾驶员推开车门跳下地，伸巴掌挡住风沙，往周围

看了看。他身上是一件还算干净的蓝色工作服，肩上有两个熨贴的补丁。梳成偏分头的头发也是洁净的，被风一吹，象《三毛流浪记》里三毛的头发，朝天竖起。

他看见数十米外的两只野羊，挺直着漂亮的细腿，昂起头，正警惕地倾听着什么。空中，三只晦气的黑乌鸦象三架直升飞机顶风而来，转着圈儿徐徐降落，睥睨着这个见惯不惊的庞然大物——汽车。

“我操你妈！老子还没死呢！”驾驶员骂。他膝头着地，然后全身卧倒，爬到车头底下。看不出他的年龄。那挺拔的躯干显得年轻，而满脸的细密皱纹，特别是眼角那几道粗而深的皱纹，显得象个中年人。

狂风把荒原上一丛丛荆棘刮得东倒西歪，车头底下，铁器碰撞的叮当声随即飘向远方，象半空中隐隐回荡的古刹钟声。驾驶员卸下一个又一个零件，呼哧呼哧地，十分不得劲。他吐一口带沙子的唾沫，用油乎乎的手套揉眼，没想到手套上也粘满了沙子。他用劲眨巴眼，终于，泪水冲开了眼中的沙粒。

他笨拙地打个滚，从仰面朝天的姿势变成匍匐前进的姿势，爬出来。

雪山愈加阴暗了。

张兰呆坐在驾驶室里，看着玻璃窗上的霜花出神。霜花真美啊！开头出现铁枝盘虬的梅花，继而成了一片树林，亭亭玉立；林中逐渐长满灌木杂草，花繁叶茂，密密匝匝。让人联想到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白雪公主、东海龙宫、宝石花……

窗外，洁白的雪粉伴着风沙回旋起舞。

“……车坏了以后，驾驶员本来可以扔下车，搭过路汽车回拉萨。但他伴着自己的车和满车的货，在冰封雪冻的唐古拉山上呆了一天两夜。下肢冻得乌黑。作截肢手术时，他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这是她听来的故事，一个青藏线上的小故事。双腿乌黑。肌肉坏死。僵直的关节，青硬的血管。被追认为烈士。要是她也冻死在这里呢？多可怕，连烈士也当不上。

“宁可住在西安等飞机，等上两个月也无所谓……”出差前，男朋友再三叮咛。她现在还看见那双焦虑的眼睛。可她不愿意呆在西安无所事事。“返藏千万不要坐汽车，这是隆冬季节啊……”他怕她不听话。

真是自讨苦吃！她伸长脖子，想看看驾驶员在捣鼓什么，但看不见。据说驾驶员都不好伺候，要是不递烟，

不请吃饭，他们就不高兴。甚至，有的乘客被扔在半路上，哭天无路。为此，她买了一条烟。

她想下车去，又犹豫了。刚才，驾驶员曾嘱咐她：“千万别下去，一下去就冻成冰棍了。”

两天前，他们在格尔木。

姓姜的驾驶员从来不高兴搭人。他习惯于碰壁的乘客对他翻白眼。他又何尝不求人？深更半夜进客店得求人；又渴又饿想吃东西得求人；装货卸货得求人；车坏了，更得求人。白眼看多了，把古道热肠也磨没了，他懒得做好事。何况，那帮油嘴滑舌的江湖老手，求你时满脸堆笑，满口“师傅”，完事之后叫你“臭开车的”，恨得你牙痒痒！衣冠楚楚的出差干部同样使人反感，他们的客气奉承之中隐含轻蔑，那神气象虎离深山，龙游浅海，虽暂时屈居人下，却终将是你的主人。

他发动了车，开着暖气，悠然自得，翻着刚买来的《小说选刊》。街上，鞭炮爆竹声热闹非凡，不绝于耳。

“请问，”一个脆生生的女孩子声音，“我搭车行吗？”

“对不起，我不走。”他头都没抬。

车窗下半天没声音。好久，直到他觉得异样，才探

头往外看。只见一位白白净净约摸二十岁的姑娘，象才出校门的学生，提着一个黑提包，面前放着一个大旅行包，眼泪汪汪。

他赶忙缩回头。要是个大学生，他更不愿搭。让她找别的车去吧！何必非得他帮忙呢。

手指头轻扣窗玻璃的声音。他摇下玻璃，居高临下地望着那张稚嫩的脸，同时发现那脸上楚楚动人的神情不见了，代之以一副决心跟他泡蘑菇到底的表情。

于是驾驶员分外客气，简直和颜悦色。他要给人一种有教养的印象，让她知道司机里边并不全是粗人，同时语气要坚决，使她不抱希望。

“已经告诉你了，我不走。另外找车吧。”

“我都找过了，没有车。回拉萨过春节的车早走了，没走的都要在这儿过节。师傅，你的家一定不在这里，搭上我吧！”

“噫，”最后一句话使他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的家不在这里？”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吃团年饭呢？”

他咧嘴一笑。“家不在这儿，我也不走。你急着赶回拉萨去干什么？”

“我……我想早些回去过春节……”

“家在拉萨？”

“嗯。工作单位也在拉萨。”

“工作证给我看。”一个红皮小本递了上来。“张兰，十九岁，展览馆，干部。”

张兰……驾驶员心里一动。他凝视着她，心脏一阵紧缩。坚决不搭：“你另外找车，我真的不走。”语气突然冷淡了。

“师傅，听口音你是四川人吧？”她在绝望中寻觅出路，注意到他那带川味的普通话。

“不是。四川在哪个位置我都不知道。”他本来就讨厌人家跟他套近乎。“你是四川的？”

“我是重庆的。”

他想起了酸梅汤，担担面，冬天的火锅。早晨窗外有人叫“鸡毛鸭毛卖钱”。挤公共汽车时，把妹妹从窗口拉进去。多么亲切的回忆啊！那车水马龙、人涌如潮的繁华城市！他违背意愿，反问一句：“重庆哪里的？”

“九龙坡。师傅你也是重庆的吧？”

“不是。重庆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他又虚晃一枪。“九龙坡哪里的？”他自己的家曾经在杨家坪。

“我家在西郊公园旁边。”

“嗯？！”他再次注视面前的女孩子，大约比他小十来岁。当年只是拖鼻涕的小黄毛丫头。他瞪着她半天不吭声。张兰也尽力捕捉他脸上出现的问号，感到有了希望。

“师傅，带上我吧，我谢谢你。”

“谢？怎么谢？”他脸上的迷惑消失了，嘴角重现出嘲讽，“你拿得出什么来谢？要是我独自一人，走到哪里打瞌睡了，裹上皮大衣往坐垫上一躺，睡几个小时，醒过来又走。你是个累赘，懂吗？”

对方满含希望的眼里蒙上一层泪花。

他想看那泪花变成泪珠掉下来。“告诉你，我从来不搭人。”但泪花却慢慢干了，对方变得冷静，甚至是冷淡。

驾驶员倒开恩了。“你买票去。那扇绿色大门里边有一位姓赵的女同志。”搭货车买票是新规矩，为了阻止闲散人口盲目流入西藏。路上还有检查站。

张兰怔在那里，她没有反应过来。“你愣着干吗？买票去呀，节日期间，人家不上班，你说出我的车号，她会帮忙。记着，嘴放甜点！”

张兰浑身轻松了。露出笑容，想奉承驾驶员：“师傅，

你的熟人一定很多。”

驾驶员扭过头对她挥挥手。

“我好想吃汤元，”张兰用重庆话说。妈妈和姐姐正在家里忙着弄吃的。

“你将就点。”驾驶员用重庆话回答。离开重庆十三年了，父母相继去世，老家只剩下已经结婚的弟弟。家庭观念淡薄。“什么时候进藏的？”

“去年八月底”。

“怎么来的？”

“大学毕业分配来的。”

“男朋友也是？”

“嗯。”张兰偷眼看看比她高一头的师傅，觉得他时而象大哥哥，时而象阴谋家。她得跟他保持距离，别象个不谙世事的毛丫头处处需要依赖着人。

沿街的小饭馆、小吃部全关着门。好容易见一家清真拉面馆开着。还没进去，张兰就往后退了。羊膻味儿好重。

“妈的，拿着钱找不到饭吃。”驾驶员说。“这儿的人跟重庆的不一样吧？他们不想赚钱。”

“他们更重视天伦之乐。”张兰回答。

终于有一家门面极小的个体户饭店在向他们微笑。一掀门帘就碰到圆桌，总共也就两张桌子。一刻钟后，桌上有了啤酒、凉菜和饺子。

驾驶员伸手接饺子，张兰看见他左手腕上有一个奇怪的伤疤，由几横几竖组成的一个字。她刚要张嘴，驾驶员赶快拉下袖子。

常常有这种情况：心底里锁闭最严的那扇门，会突然对素昧平生的初识者敞开。

“你知道吗，我差点儿上了大学。”他并不看她，象自言自语，“上初中时，我的外语基础很好。一九七二年，北京外语学院来西藏招生，他们看上我了。”

张兰对他的警惕并不因这推心置腹式的谈话而取消。她决定尽可能的冷淡。“后来呢？”

“你看见了嘛，还是个车夫。”他淡淡一笑。“那次可真伤了我的心，我发誓永远不做大学梦。”

“哦，一个错误。”

“错误？生活是残酷的，梦做得越美，醒来后越痛苦，我们需要脚踏实地。”

“所以你失掉了机会，没有报考大学。”

“我并不认为只有进大学才是出路。后来我给报社

投稿。我写了篇小说，写青藏线上跑长途的。报社退稿时附了句话：‘希望你多写批判稿。’于是我又发了誓，永远不投稿。”

“又是一个错误。”

“不管错不错，我坚守誓言。人们捏碎一个青年的理想，象捻死一个臭虫。为了不让理想轻易破碎，它的外延应尽量扩大。仅仅以进大学或当记者为理想，是不够的。”

“那么你现在……”她迟疑了，转移话题，“热爱你的工作吗？”

“哼，”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觉得，不热爱某项工作却能把它干好，比热爱它而干好它更难，因此也更伟大。”

洁白的山峰，洁白的原野。公路象一条黑色河流穿越于雪原之中。没有什么比这一片土地更圣洁了，此刻它象一位含羞的身着素装的新娘。

张兰在暖洋洋的驾驶室里飘飘然。

“雪呀雪呀雪，

覆盖了沉睡的原野……”

驾驶员问：“你在哼什么？”

她不好意思。“这是诗，一位青年诗人的。”

汽车风驰电掣般，前无先行、后无来者——春节期间。

“我们都是喝长江水长大的，你注意过长江之源吗？”驾驶员边转动着方向盘，边拉开了话匣子。“它的源头气势多么磅礴！冬天水量那么小，并不比四川一条小河沟里的水更多，到了夏天它却从千山万壑汇聚拢来，形成一条开阔的河川，挟矿物泥沙，浩浩荡荡，囊括半个中国！只有这样的大江才具有这样的气魄……喂，大学生，我的口才怎么样？”

张兰听得入神，被他一问，张口结舌。

“不是自吹，有些大学老师的口才还比不上我……到了沱沱河，一定叫你好好看看……”

汽车进入一片开阔地带。左边远远的横着雪山，右边是沙土漫坡，公路两边的沙地上，生长着一丛丛耐寒耐旱的不知名植物。

谁知，标示着“OIL、P”字母的红灯，会突然眩目地亮了呢？

“糟了，机油打不上来，”驾驶员刹住车，“密封圈出毛病了？”他推开车门，回头嘱咐一句：“千万别下车，

一下去就冻成冰棍了。”

装载如山的柴油车被狂风刮得摇摇晃晃。素洁的新娘变成了暴怒的猛兽。张兰听着哗哗风声，随汽车一起摇摆。偶尔，听见驾驶员在车头底下哼哼：

“ 嗯——哎嗯—— ”

“ 哼—— 哼—— ”

仿佛他正忍受着酷刑，咬紧牙关不让痛苦的叫喊从齿缝溜出来。她突然觉得，自己坐在车里享福，简直是不道德。

她推开车门跳下去。还没站稳，头巾被刮跑了，顷刻间无影无踪。她有生以来没被这样的风刮过。双颊象刀子割，耳朵痛得要命，头也开始疼起来。她胆怯了，自己安慰自己：“不要紧，车马上就修好，就离开这里了。”

驾驶员打个滚从车底下爬出来，对她嚷嚷：“你出来干嘛？快上车！”

他们各从一边进了驾驶室。

“修好了吗？”她的嗓音怯怯的，包含无限的担心与希望，生怕嗓门一大，把好运吹走了。

“走不了啦。密封圈漏水，才换的曲轴，他妈的质量也不过关。”

“那怎么办呢？”

“等死。”

张兰透过模糊的泪眼望着窗外荒凉的、鬼都不生蛋的沙地。看看驾驶员，他脸上皱纹越发多了，衣袖上有粘糊糊一大片机油。肩上又撕了个三角形大口子，露出了棉花。她突然想到，要是自己的哥哥也受这份罪，妈妈准会心疼得了不得。

驾驶员陷入沉思。走不了，也退不回去。连工具都没处借。在这儿搁上几个小时，两个人都会冻坏。正想着，怀里掉进一个什么东西。原来张兰扔过来一条“大前门”香烟，怕散了，还用橡皮筋扎住。出于习惯，他看看包装纸上的字：不是上海的，是许昌的。

“我不要！”他生气地把烟扔回去，同时瞥见她善意的眼光，正等待着一声“谢谢”。

有几分钟，空气都发僵了。他听见吸鼻子的声音：一下、两下。偷眼瞧瞧，张兰睫毛上挂着泪珠儿。他扭过脸，装没看见。

吸鼻子的声音停止了。他问：“想男朋友啦？”

张兰脸上滚下大大的一滴泪。“你嫌烟不好？”

驾驶员别过脸，冷冷地回答：“是的。”

“没有熟人，买不到上海大前门。”

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们蜷缩着。柏油路面，雪粉和沙子赛跑似的，一溜儿、一溜儿滚过去。

张兰又塞过来一小卷东西。“这是昨晚的饭钱。我不要你请我吃饭。”

驾驶员板着脸：“拿开！”

“那你也把烟收起来。”

驾驶员苦笑。“如果你自己抽烟，递给我一支两支，还好说。”他停了停，“脊梁还没长硬，就弯曲了。”

张兰抿紧嘴唇，撕破包装纸，慢慢地抽出一支烟，送到驾驶员嘴边。“想教训我？你还没资格。”

他自己掏出火柴。“对有些司机可以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司机……”火柴“哧”地划然了。

傍晚来临，黑沉沉，象巨兽张开大口。张兰神情紧张，盯着车辆右侧不远的山坡。那儿出现一个黑点、两个黑点、三个黑点，并且越变越大。

驾驶员朝那边瞟瞟。“害怕啦？那是一群羊。”

果然，羊群爬上山坡，又顺着山脊溜下来。在它们后面，牧羊姑娘挥动鞭子，越走越近了。

装载如山的柴油车在风雪中微微摇颤。

牧羊姑娘睁大眼，伫立在风雪中。她裹着肮脏的老羊皮袄，皮袄下摆和袖口镶的几圈红绿布条已撕破得看不出来。脸蛋很丰满，但粗糙得象撒上糠壳。唯有那双晶亮的眼睛，如黑宝石般充满了纯洁、原始的迷人魅力，好奇地瞧着这辆半死不活的车。

驾驶员感动了：“这叫美，懂不懂？在大城市，你永远找不到这种美的。”

张兰看着那位牧女：“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你不回家过春节。”

驾驶员的脸色跟天色一样暗。他挽起左手袖子，露出腕上的刀疤。张兰又看见了那个刀子割出来的“兰”字。

“这是一位女大学生的名字。她进大学后我们断了联系。”

“为什么？”

“臭开车的，一脚踏油门，一脚踏牢门，配不上。确切点说，我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

“那么她呢？”

“她……”他咬住嘴唇，望着荒原尽头。沉默良久，他说：“为了她，我实在不愿意带上你。”

她眼里疑惑的阴影越来越深。

“有时我相信命运。”他又说。“我等待着，顺应自然，看老天爷给我安排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不想违拗自然的命令。终于我明白，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干好这一行。”

静默象梦一样笼罩了他们。

牧羊姑娘对柴油车失掉了兴趣，她挥动羊鞭走向风雪弥漫的深处。顺着她缓缓移动的身影看过去，在山坡与草滩的交接处，孤零零蹲着一座小到不易察觉的灰色帐篷。

“好罗，冻不死罗！”驾驶员欢呼起来，推推张兰。
“走，去帐篷里，有火烤，有茶喝。”

“走吧。”张兰也来了精神。她披上他的油渍麻花的皮大衣，戴上他的同样油渍麻花的皮帽，和他一起向着光明与温暖奔去。

四十分钟后，双颊被青棵酒烧得通红，驾驶员独自回到驾驶室。他从帐篷里借来一张老羊皮，用它严严实实裹住腿，连同穿毛皮鞋的脚一起裹上；用自己的皮大衣裹住上身，然后戴上皮帽和皮手套，用张兰的挎包做了枕头。

在做这一切之前，他先抽支烟，考虑着明早怎么答谢帐篷里的老阿妈。给钱？她肯定不需要。还是提上一小桶汽油吧，这可是好东西。回想起张兰刚进帐篷时的窘态，他不禁笑了笑。

刚才，张兰追到帐篷门外，在寒风里，愁思万缕地瞧着他，“太危险了。有狼吗？”

他不习惯这种目光，在这目光里他变得很重要。

张兰不说话，但她的眼睛在说话。

于是他说了句笑话。“怎么，怕明天见不到我了？别担心，不是活的，就是死的，总会见到的。”

（原载《西藏文学》1984年第6期）

手拉手儿到拉萨

10多年前，去拉萨乘飞机远不如现在方便，那时人们多是乘汽车进藏。1984年8月中旬，我在成都购得至拉萨的汽车票一张，买票时得到承诺，10天内肯定到达。

同车有两个香港的女大学生，高而文静者叫郑素贞，矮而喧闹者叫张琼英。记得她们的课程中有“家政”一

项，让我知道了香港不似大陆。她们趁暑假自费去西藏旅游，穿着红白黑相间类似运动衣的短装，戴个黑黄相间的旅行帽，背着行囊。脚上趿着双拖鞋，也让我感到香港不是大陆。

沿途高山大川，景色壮美，天如火来水似银。每遇雪峰或开满鲜花的草滩，她们必定欢呼雀跃取出相机咔嚓地拍，胶卷盒子一个接一个扔。渡过金沙江以后，海拔越来越高，气温越来越低，车窗外时时飘着雪粒，人们开始流鼻血，气喘头晕，唇干舌燥，高山反应不断。两个香港姑娘沉默了，她们头痛，鼻血涌出。

第七天到了波密，在藏南谷地中，这算个大地方，一个消息惊呆了我们：前方塌方，堵塞道路，不能通过。

办法有三：一是就地等候修路，二是原路返回，三是改道经昌都、那曲到拉萨。同车25人经激烈辩论否定了后二种办法，大家就地等候。在波密一呆七天，伙食住宿花去不少钱，几个进藏打工的青年农民已花光了盘缠，将随身带的烟酒等礼物摆地摊卖了换饭吃。

越来越多的滞留旅人使小城显得热闹。人群中有四个年轻的香港缝纫女工。郑素贞和张琼英凑过去，六个女孩哇哩哇啦像炸了锅的炒豆。小女工们决定搭车返回

成都，两个女学生送别她们后神色黯然。目光射向澄澈的天空，几只几鹰在盘旋，她们坚定地说：“反正我们要去拉萨！”但相机使用得少了，笑声也少了。

第七天上，同车 25 人商量出了第四条办法：由本地人当向导，弃车而行，徒步越过塌方区，涉过野贡藏布江，到对岸找车去拉萨。大家收拾了简单的随身物品，将笨重的行李留在车上托司机照管。只有年逾古稀的行脚僧——江苏灵岩山寺的游方老和尚名叫释葆蓉的留下没走外，24 人开始了惊险的行程。

越过冰川造成遍布大石头的缓坡，就是一带陡峭的悬崖绝壁，长约四、五华里，没有路，头顶是陡如石墙的百丈高岩，脚下是波涛汹涌正在汛期的野贡藏布江，浪头一个个扑来，化为大大小小的漩涡，将枯枝败叶卷入江底。不知生长了多少世纪的原始森林黑沉沉地，葛藤缠绕，荆棘丛生，勾住衣裳，划破手脸。我们鱼贯前进，遥相呼应，近者互帮，猿猴般攀岩跳坎。我拉住一棵古松粗大的裸根，跳过挡在面前的岩石，站稳之后转身拉着郑素贞的手，帮着她也跳过来。她推着我的背帮助我爬上一道土坎。她的旅行背包很妨碍她的行动，不时会听到前面的张琼英充满恐怖的一声大叫，也不时听

到精明强干的四川打工仔简短有力的招呼“快点！拉紧！”突然，我的脚下一滑，直往崖底的回水深潭摔去，情急之中我也一声尖叫，反手抓住了粗如缆绳的茅草，不顾手的疼痛，脚下一阵乱蹬，蹬掉虚土踩着紧实的地面，背心立即被虚汗浸湿了，手抓的茅草几乎被拔了出来。抬头一看，郑素贞在我头顶上，镜片后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手捂着嘴，吓得连喊声也没有。这段艰难旅程结束后，更危险的关口横在面前：野贡藏布江脱缰野马般，大桥已被冲毁，道班工人放倒一棵巨大的松树横跨江面，成为独木桥，桥旁再拉上一道粗铁丝算是扶手。这一带江面极窄，宽不过20米，江水怒吼，流速快得让人发晕。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独木桥，踩在圆溜溜滑叽叽的圆木上。铁丝晃晃荡荡，水声吼啖震天，令人手脚发软，耳鸣目眩。我抖抖颤颤从圆木上走过，脑海里浮动着一人们的传说：三天前，一对蜜月旅行的小夫妻从这上面走过时，女的掉下去，男的奋不顾身也扑下去，双双冲入了印度洋。那情景让我至死不渝地记住了。江对岸站着一个壮实的藏族汉子，他是道班工人，手臂伸得长长的接应每一个过桥者。当他粗糙有力的大手抓住我的手时，我深深吐出一口气。

24个同车的人全都过河后，沿公路走了整整两天，计80余公里路程，晚上不分男女统统挤在道班空房子的泥地上睡觉，以抵御西藏的寒风。终于搭上一辆货车，又换乘军车到了八一镇，再搭上青海来的一个车队的车，到了拉萨。

到达拉萨那天，沉稳的郑素贞低声感叹道：“终于到拉萨了！”而活泼的张琼英则高声欢呼道：“终于到拉萨啦！”

后来我与郑素贞通过几次信，地址是“香港黄竹坑屯1座402室。”两个香港女大学生勇敢坚韧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曾在报刊发表）

古老的藏歌

唱歌，得有适合于歌声的心境与环境。在世界屋脊上，那最高阳光也最充足的地方，人们最爱唱歌。

那年隆冬季节，我从日喀则搭乘公共汽车回拉萨，同车20多人全是藏胞，都是后藏地区的农民，家里人纷纷提着青稞酒前来为他们送行。

客车驶出日喀则市，穿行在冻结翻起碱花的田野间。车窗外，朔风驱赶尘沙，阵阵掠过柏油路面。路旁的护路树举着枯枝，摇摇晃晃。大自然吸干了每一片绿色，除了原野的灰白就是山岭的赤黄，举目四望，无限苍凉。

耳畔响起了深沉浑厚的歌声，循声望去，一位粗壮的汉子正以温和的目光盯着我。我习惯于藏胞的目光，便微微一笑。他年约三十，紫红脸膛上象是涂了一层清漆，亮晃晃反射着阳光。大襟老羊皮袄不辨颜色，蒙满尘土，头上戴顶不知什么皮的翻毛帽子。骨节粗大的双手上满是老茧。他抬抬下巴，我知道这是邀请我和他一起唱呢，可惜我不会唱藏歌。

全车的藏胞都加入了合唱。那是一支古老的藏族民歌，象《伏尔加船夫曲》，稍快，更雄壮一点。它发自心灵深处，包蕴了整个生活的内涵。有对劳动的赞美，对艰辛的叹息，对灾害的忧虑；有爱情的回忆和家人的祝福。而最直接的，是冷酷的冬日环境里对春天的呼唤，那热烈的希望与追求。它剔除了哪怕是一丁点的虚矫，朴实到极点，他牵动人心中被老茧包裹的最纤柔的那根弦。我在这一刻明白了财富与歌声不成正比，为什么唱歌能够净化灵魂。

也许因为我是车中唯一的女性，唯一的汉族，因为我专注于他们的歌声，领唱的中年汉子不时转头看我，那双经受住了雪域高原强紫外线的眼睛里，映照出蓝天白云，淙淙溪水，庄稼和土地，青稞酒与酥油茶……

后来我认真学会了一支藏歌。

再后来，常常拥挤在重庆的公共汽车里，汗流浹背头晕目眩之时，回忆起西藏的歌声。

（原载《重庆晚报》1996.5.17）

2 引 子

汉族姑娘眼中的藏族风情

美丽的藏族姑娘，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温馨静谧的夜晚，和一个汉族姑娘来到拉萨河畔，漫步赏月。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是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这是什么力量，由谁支配，只有她们的心知道。心，却不肯明白地告诉她们。

不同的民族来自于不同的历史和地域，因而互相觉得神秘：不同的民族走到一起来了，用诚实的劳动创造

共同的生活。

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永远无可争议的，是民族大融合中，劳动人民之间的水乳亲情。

难 题

“月亮还没出来。”出门的时候，我说。

同伴今天没穿藏装，而是穿一件灰中带绿的细呢大衣，同样颜色的风雪帽紧扣在头顶上，鹅蛋脸儿从帽里鼓出来。可惜后脑上的发髻看不见了。她的发髻挽得很别致。

她曾告诉我，在学校时，她从来不辫头发，让它象黑色瀑布一样披散下来。

我们走到大街上，看见十来个小伙子聚成一堆。人堆中间，举起一只拳头，在空中划个弧形，又落下去。

“打架？”我赶紧往旁边绕。

同伴却往人堆中间挤。我没能拉住她。

一个矮胖小伙子从人堆中挤了出来，边嘟哝着什么，边用愤怒的眼光往身后盯。人们发出嘲笑，接着散开了。同伴将手插在呢大衣的衣袋里，走到我身边。

“我想去劝架，”她看看我。“你们汉族姑娘就是胆

小。”

“谁说的？我们不熟悉情况。”

是因为不熟悉情况，还是因为本来胆小，弄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自己似乎一向挺胆大。我看看自己披着的草绿色棉大衣，又看看同伴的灰绿呢大衣，以及我们相仿的个头，说实话，外貌上的差别不大，如果不仔细观察的话。

我们走到拉萨河边，灰色河水波光粼粼。灰色天际，云层薄薄的，小星在云缝里时隐时现。

“月亮还没出来，”我说。

同伴注视着—群归宿的小鸟，它们低低地从河上掠过，白脊背，灰翅膀。“多漂亮啊，这可能是海鸥。”

“海鸥？随青藏高原从海面升上来的？”

“不知道。”她笑了，把又黑又亮的眼睛转向我。“你数过吗？一共三十五只。”

“月亮！”我欢呼起来。

大山清晰的轮廓后面，露出了光华夺目的圆月，象一颗璀灿的宝石，银光四射，给山峰镶上一道银边，给天空镀上一层亮色。

这时候最需要安静。我们好象是有默契，一言不发

地在卵石滩上坐下来，全神贯注着越变越大的月亮，有半小时之久。

我想起了去年的拉萨初雪。我对一位同事也是同乡说：“你看，这多美！”他抬起苍白下巴上有硬胡楂子的脸，将眼光往天空和山头上四处乱射，最后射到我身上，仿佛我是个怪物。

身旁的藏族姑娘注视着天空，眼里有梦幻般的神色。她去年才从民族学院毕业。要是穿上藏装，跟月色会更为融洽。

她偶然回头，亲切地问：“你想什么？”

“我想起了关于月亮的神话故事，我们汉族的民间故事。”我回答。“藏族也有吗？”

“当然有。”

现在月亮已脱离山峰的扶持，颤巍巍地悬在透明的天空。它显得很大，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对它的感情已不仅是喜爱，简直是敬畏了。它威严地、冷冷地逼视人间，撒下的清光却显得很柔和。

“你知道吗，北美印地安人说，他们的祖先住在离月亮最近的地方。”同伴不看我，看着月亮。“奇怪的是，印地安人在生活习俗上，在装饰品的艺术风格上，却酷

似藏族。”

“教科书上说，印地安人是从亚洲越过白令海峡到北美安家落户的。他们会不会是藏族的一个分支？”

“这正是现在的人种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她仍然盯着月亮，梦幻色彩渐渐消失。

她的脸型跟银幕上印度演员的脸型很相象，肤色黑黑的。跟我的方脸和白嫩肤色正相反。

一个民族分化了，许多民族融合了。历史的谜语，历史的难题。有没有什么东西超越这一切之上呢？

灰云全部退去了，让位给蓝湛湛的夜空。小星疏疏朗朗，闪着微弱的光。河水也由灰色变成蓝黑色，汨汨流淌。每一道波浪映出一个闪烁不定的光斑，无数道波浪映出的光斑组成一条光柱。夜空、河水、大山，十分协调地组成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世界的中心，便是那一轮银色圆月。在月光抚慰下，拉萨古城象一位稳健的藏族妇女，操劳一天之后，渐渐沉入梦乡。

（原载《西藏文艺》1983年第5期）

江畔夜话

江水呵，清清的江水，
你是流在我心中的一条花溪；
你的水味如同美酒，
刚尝了几口，我便怡然如醉。

——藏族民歌

春来了。宛若不易为人察觉的手指轻抚琴弦，雅鲁藏布江两岸低回着一支优美的晨曲。

河滩上有滚来滚去的小绒球，白的、黑的、花的，那是刚落地的小羊羔；田野里有一粒粒碧玉，娇嫩、新鲜、翠绿，那是冬青稞的幼芽。无数新生命在艳阳普照之下，悄悄出世了。

在暖融融的季节里，我沿雅鲁藏布江岸作一次醉人的旅行。心象浸入了澄澈的江水，荡涤整个冬天积下的泥垢，那么洁净，那么透明。

解放牌汽车驶进江边一个锯木厂窄窄的院坝。只见四周群山环抱，山涧流水冲击着一道十数丈高的木制水槽；宿舍近旁，带刺的灌木密不透风，足有一人多高。

真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小小锯木厂被树木荆棘挤得几乎看不见房屋。司机说：“今夜住这儿。”

一位年约花甲的藏族老妈妈把我们迎进宽敞清洁的平房宿舍。她揩擦细花磁碗，斟上酥油茶，对我说：“我家没有酥油味儿，你放心。我知道，你们都怕被子上有味儿。来我家住的人可多啦。昨晚上，七个。”

老阿妈的女婿，厂里的电工，约摸二十五六岁，端来了馒头和菜汤。“阿姐，吃吧，来不及给你做汉族的菜，这是食堂里打的。”转身又给司机端来糌粑和辣椒水，还提着一块怪吓人的干牛肉——一整条牛腿。

司机从腰间拔出藏刀，割下生牛肉蘸了辣椒水塞进嘴里。我也拿起馒头。

“嗨，这么多奖状！”墙上共有九面奖状，全写着“奖给顿珠同志”。主人珍惜荣誉，奖状上一尘不染。“是你的吗？”我问。

“不，这是，”他想了想，“我老婆的阿爸，汉族怎么说？”

“岳父，”我笑了。

顿珠进来了，中等个头，很壮实，花白络腮胡茬，黑铁皮似的脸，目光威严。他对我点点头，笑笑；但笑

得很勉强。我不由自主地收回了本来很随便的手脚。

当夜月华如银。锯木厂里放电影，人们全集中到礼堂去。可惜我们晚了一步，没看到片名和开头。老阿妈告诉我，厂里常放电影，每周都有一两次。

电影散场时已近深夜。我返回宿舍，见老顿珠独自坐在厨房里一张熊皮上，吸纸烟。

火舌顽皮地舔着锅底。多可惜，整棵树被锯断当柴烧。再看看独立于平房之外的小厨房，木柱、木墙、木顶，除了房顶上覆盖着一层铁皮，它几乎是纯木的。使人联想到锯木厂里堆积如山的原木，锯开后散发芳香的木方、木条、木板，更使人想到周围群山上茂密的森林。这里是树木的世界。

红红的火光在顿珠脸上跳跃，那张黑脸却没有任何表情。我默然坐下，觉得空气凝固了。山谷之中，离锯木厂不到一里路的悬崖下边，我能想象出，深黑的江水在月光下怎样静静流淌。它一定入睡了，睡梦恬淡得不起一丝涟漪。鱼儿躲在石缝里，也一定随着江水甜甜入梦。

一声“吱扭”，一股冷气，门开了。进来个扎两支硬邦邦羊角辫的女孩。好清秀的小姑娘！神韵一如透碧的

江水和两岸青山。从脸形和肤色来看，这是个汉族女孩，约有十岁。

“老阿爸，你没看电影？”

“嗯。”老人眼皮都没抬。

小姑娘背后跟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看模样是小姑娘的哥哥。

“电影好看啊，”男孩说，“真有这种孙女，连奶奶的金牙都想拔去卖钱。阿爸是吧？”

“哼，”老人不置可否。

“哥，”女孩怪惋惜，“阿爸没看电影。”

门外有人声喧哗和杂沓脚步，推门进来了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孕妇，径自在屋内坐下，用夹杂汉语的藏话议论刚才的电影。接着又进来了两个小伙子和一个穿藏装的漂亮姑娘。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木屋内挤了十一个人，有两个小伙子只得站着。

小伙子们清一色的瘦高个。肌肉结实，腿脚灵便，裤腿和鞋面上蒙着灰尘，手掌上有茧巴，手背青筋暴露。浑身透着重体力劳动之后的轻微疲倦，又洋溢着适当消遣之后的轻松愉快。他们穿着新旧不同的蓝的卡上装、草绿军装、烟色粗灯芯绒外套，故意敞开领口，露一点

大红或鲜绿的运动衫翻领，更增添了粗犷色彩。

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出有三位青年是藏族血统；他们面孔粗黑，鼻梁又高又直，头发微髻，眼珠如墨。而另两位，鼻梁低而平，皮肤白皙，是汉族。

现在进来的是提青稞酒壶的老阿妈，女婿捧一擦细花磁碗跟在她身后。从年轻人纷纷露出微笑，用藏汉两种语言跟她打招呼、开玩笑来看，她是这自由小聚会的中心。老人扭动微胖的身躯，笑容可掬，在每个人最顺手的地方放上一只碗，依次斟酒，还用藏语说着笑话。我声称不能喝酒，她便急忙端来竹箩盛就的炒蚕豆。

老阿妈放一只碗在扎羊角辫的女孩面前，调皮地笑得象个顽童。“索——达，索——达！（藏语：请喝）”

女孩涨红脸，窘急地又摇头又摇手，“索——默，索——默！（藏语：不喝）”

全体客人都笑了，连老顿珠也微笑了。女孩抓一把蚕豆，跟大家一起笑。

“昨天食堂里杀的那头猪，从肚子里抠出来五只小猪崽。”年轻孕妇说。她负担着六个多月的身孕，鼻梁两旁有雀斑。

“哎呀，我们可不知道！”有几个人叫起来。

女首先告辞，接着小伙子们陆续离开，连小姑娘也坐不住了。最后剩下我和男孩陪着老顿珠。

“我最喜欢跟人吹牛，”男孩说。“干活时，机器轰轰响，大声嚷嚷都听不见，只好闭着嘴。”

老顿珠吐着烟。“要是你肚子是空的，就不想吹牛了。”

“我想办法填饱肚子。”

“拿什么填？”老顿珠一本正经。

小伙子想了想，“西北风。”

我忍不住扬声大笑，老头却板起脸，重又变成一尊铁像。

外面响起低语声，被老阿妈找回的司机表情严重，叙述着什么事，他们走进卧室。

男孩注意倾听。“阿妈不来了？”

他妹妹却隔着门叫他：“哥，叫你回来洗脚！”

男孩长叹一声，很有点恋恋不舍。

老顿珠从墙角提出一支步枪，穿上羊皮袄，戴好帽子，对我点点头，出门融入月色之中。

我独自站在月光下。

群山深黛，寂默无声。山上的红松、白桦，象肃立

的持枪卫士，象禅定的披袍僧人，象大山盖上的厚棉被，那么静谧，那么神秘。月光亲吻着，令人顿生奇想，觉得月光之下，密林之中，定有无数精灵在欢跃，在舞蹈。它们邀请山中居民参加舞会，兔子啦，獐子啦，野鸡啦，纷至沓来，扭纤腰，蹦细腿，一派升平景象。当然，也有恐怖因素带来惊慌，如象大黑熊，它会搅乱舞会，惊起飞禽，吓跑走兽。

而挎枪的老顿珠，恰如一位夜游的山林之神，保护着所有善良的生灵。

第二天清早晨曦微露时，我看见老人头枕步枪，裹着皮衣，斜靠在门口的卡垫上。

“……一定要来啊，再来我家喝茶！……”

车轮扬起滚滚尘埃，我耳边还萦回着老阿妈的声音。似乎她还拉着我的手，似乎她还站在院坝里，高扬手臂为我们送行。面容那么慈祥，态度那么殷勤。可我并没留下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名字。

公路迤迤向东，汽车沿江行驶。我想，从文成公主的时代到如今，历史已飞逝了一千三百多个年头。其间，统治者有过多少次争夺与议和，发生过多少次血腥的仇杀和战争！而昨夜江边小木屋中的谈笑，一定是古来

有之吧？它既是那么平常，那么普通，那么，它将会长存，与人类同在。

（原载《西藏文学》1984年第10期）

高原植树日

在拉萨布达拉宫西南面数公里处，有一座楼阁重叠、树木参天的园林，称为“罗布林卡”，藏语意为“宝贝园林”。夏天浓阴匝地，绿草如茵；冬天枝柯横直，鸦巢杂陈。过去，这儿是达赖喇嘛避暑的夏宫，现在是拉萨的人民公园。

3月12日，是举国上下的“植树日”，我们来到罗布林卡，在林间空地上补种树苗。

跟藏族同志一起植树，真是别有风味。一边用铁锹撬开刚解冻的泥土，碰上石块，叮当响时，一边已用石头架起铁锅，火苗“吱吱”地舔着锅底，炊烟飘渺，轻纱般游荡在树林中。这儿那儿，不时腾起一阵欢笑，响起悠扬动听的民歌声。

头顶的灰色杨树枝，在春风吹拂下泛着微微的青光。围墙迤旎，隐隐露出五彩缤纷的宫殿檐角。脚下是金黄

的落叶和干枯的草茎。我使劲将铁锹踩进泥里去，撬起一块带草根的土块。半小时以后，第一个坑掘好了。

“喂，验收员！”我叫住匆匆走过的扎诺，他是个中年汉子，“来看看我的合格不？”

“你办事，我放心。”他拿着一根标有尺码的木棍走过来量。“80厘米深，80厘米宽，你这还差半寸。”

“半寸？”我有些不相信。“请你帮帮忙吧。”

“我对你的友谊是永恒的。”他过来帮忙，吭哧吭哧地开掘。白木锹柄在他手里变得轻巧，只见铁锹上下翻飞。我赞美地看着他——多粗壮的胳膊，多有劲的动作！油亮的红脸膛上有几条粗粗的皱纹，那不是衰老的标志而是烈日寒风留下的印痕。

我开挖第二个坑。忽然觉得喘不上气，胸闷头晕，额上冒冷汗。高山反应发作了。

“你喝口水吧。”耳边响起一个柔和的声音。这是负责烧茶的格桑大婶。她中等微胖的体形，头发盘在后脑上，蓝布围裙上有烟熏的痕迹。当她戴上眼镜坐在资料室里的时候，庄重，沉静，谦和之中透着严肃，俨然一位女学者。格桑大婶的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父亲从英国一所水电学院毕业，她还给我看过她姨妈的照片，照片

上穿藏装的漂亮女子，现在是锡金国的王后。

我喝下半杯水，借水里含的氧来帮助自己恢复正常。
可是藏族同志都不喝水。

格桑大婶第二次提着壶送来的是“恰斯玛”——酥油茶。茶又鲜又浓，藏族同志争着递过碗去，汉族同志的杯子也都斟满了。

春日明亮的阳光下，人们不断挥汗，矮树上挂满了外衣、毛衣、帽子……当林间荒地上布满树坑时，格桑大婶第三次提着壶走来。她用藏语叫道：“强桶！强桶！（喝青稞酒！）”把青稞酒依次斟进递过来的杯子和碗里。小伙子们一口气饮干一杯，又一杯，再一杯。大婶用藏语叽里咕噜地警告：别喝醉了啊！

“休息罗！”是扎诺的粗嗓门。“各人拿上家具来吃饭！”他管“餐具”叫“家具”。他跑前跑后帮着炊事员把饭箩和菜盆从汽车上卸下来。人们在草地上团团围坐，碗盏叮当，笑语拂扬，劝酒的，上菜的，开玩笑的，荒芜而静谧的树林中弥漫着热闹的气氛。

饭后，我独自向密林深处走去。新掘的土坑散发出清新的气息，和炊烟的气味融合在一起。春气动，草萌芽，嫩叶从枯草下怯怯的露出头来，碧绿可爱，它们将

高原打扮得鲜丽动人。头顶上，蓝玻璃般的天空被树枝分割得支离破碎，朵朵白云在其间轻盈游荡。我突然想起格桑大婶常说的一句话：“哪儿也不如拉萨好哇！”

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把这蓝天白云，这初春的杨树林，这巍峨宫殿的彩色檐角，以及正在林间欢乐野餐的人们，一齐搬到画布上，那将是一幅多么有特色的浓郁的风情画啊！

（原载《重庆日报》1983.4.7）

没有厕所怎么办

1982年，我初到拉萨，常在电影院和大商店门前空旷处，见三三两两妇女，穿着牧区装束，蹲在地下，神情专注，眼盯鼻尖。我不知她们在干啥，便认真看她们，她们也看我，双方都很惊奇。等她们陆续站起来，就看见地面留下了热气腾腾的一滩，我脸红了，急忙转过脸去，她们若无其事，拉好袍子下摆，一动一动地走了，很有几分潇洒。

后来我搭车去亚东，途经帕里镇。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城镇，海拔四千多米。时值隆冬，温度在零下，嗖嗖

的风卷起雪粉打得脸疼。汽车在这儿停了两天三夜，我下车先找厕所，没见有什么厕所。小巷弯弯曲曲通向一户人家，向藏族妇女打听，她们不懂汉语。我说了藏语单词“吉姆达嘎”（意为上厕所），她们随便往地上一指，意为“蹲下即可”。我四面看看，十分为难。

汉族妇女的习惯是要在绝对不被窥视的情况下才能方便。看看她们，长袍遮住脚面，蹲下自然安全。我的上衣和长裤却将躯体分成了上下两截。惶惶之时，一群孩子发现了我的意图，先是伸头探脑，继而前呼后拥，穷追不舍，要想看个究竟。其中有两个小伙子比我还高，恐怕已经十四、五岁。我急了，决心去镇外找个隐蔽处。出得镇南，满目空旷，一片开阔，连只兔子也藏不了，兼有寒风呼啸，野狗徘徊，那群孩子跟在身后决不罢休……

捱到晚上，提心吊胆躲开人们，溜到墙根下黑影里，一边提防着满街乱串的狗，一边解决了问题。我决心不吃不喝，以免再找厕所。

房东煮了一锅“土巴”（用牛羊肉、萝卜丝加面粉煮成的羹状食物），年轻女主人盛一碗递给我，我摇摇头。她以为是汉族人吃不惯牛羊肉，望着我笑笑，倒来一杯

开水递给我，我又摇头。她转身拿来白糖瓶子，往开水里加两匙白糖，搅匀了递给我，我还是摇头。她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她多半以为我瞧不起她做的藏族饮食。我满怀歉意，却无从表达。

幸而带着半斤巧克力，熬过了这几天。

汽车终于启动了。我的嘴唇已开裂脱皮，胃部也隐隐作痛。

回拉萨后胃病加剧，动辄痛得面色苍白，冷汗涔涔。难免一肚子窝囊——怨谁？怨那群跟着我的半大孩子？怨我自己？是什么使得汉族妇女非礼勿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吃喝拉撒，人之本性，日必躬行。有的民族视排泄为自然之举，坦然对待；有的民族则视为秽浊之事，讳莫如深。性相同，习相远。

对自己也真有些想不通——在帕里时，若公然蹲下，敬请参观，又如何？

（原载《中国市容报》1990.5.10）

3 引 子

处于现代矛盾中的藏族人民

渴望接受现代文明熏陶的藏族青年，却被阿妈的亲情锁住了。

一对青年夫妻，双双从民族学院毕业。他们以现代人的心态，观照生活中出现的矛盾，表现现代人的喜怒哀乐……

有了现代化交通工具，西藏并不遥远；作为自治区首府，拉萨也不荒凉。

想上大学的人

我被选送拉萨上学的时候，阿妈笑得合不拢嘴。她盯着我看，目光那么奇特，好象今天才认识我。后来乐滋滋蹦出一句：“跟你阿爸一模一样！”她替我收拾东西，一件一件塞进旅行袋，声音突然低了，嗓子眼哽住。“跟你阿爸……一模一样！”

阿爸进过咸阳民院。那时候我们家充满欢乐。

阿爸死得太突然。他夜里独自穿过山林，遇上了一——当时不能肯定遇上了什么。去公安局报了人口失踪。

公安同志辛辛苦苦调查两天后，把阿妈叫到那片林子里。

从那片林子里，阿妈找回来完整无损的帽子、裂开的靴子、撕得稀烂的藏袍碎片。还有一绺带血的头发，和几根连着肉丝的骨头。

刀鞘也找到了，但是没有刀子。

从那以后，阿妈再也不敢去那片山林砍柴和下绳套。她找来一个豹子头骨——我不懂为什么她断定是豹子——把豹子头骨挂在卧室的墙上，每两天换一次敬供的青稞酒和糌粑。

半个月后果真发现了那只豹子。它死了，蜷缩在山坳里，腰腹部斜插着我阿爸的佩刀。刀插得很深，连刀把都几乎陷进肉里去——村里的乡亲们恭恭敬敬将它埋葬。

阿妈再也不会笑了，脸上消退了红润，皮肤失掉光泽。亚嫫每封信都向我诉苦，说阿妈待她很刻薄。

我爱亚嫫，也爱阿妈。我希望亚嫫陪着阿妈好好过日子，让我能安心地去内地学习。

我买了一件鲜艳的衬衣，一条尼泊尔金丝围巾。转三次车，很顺利，花一个星期就到了家。衣服头发眉毛胡子全是灰土，都快成土人了。阿妈一边干着事，一边

不转眼地盯着我瞧，瞧个没完。我却想着亚嫫。

阿妈打酥油茶，呼隆隆，呼隆隆。

“阿妈，我给亚嫫买了点东西，你看漂亮吗。”

“我不看。你只想着亚嫫，忘了阿妈。”

满头满脸的灰土还没洗呢，游子归家的欢悦心情却阴暗了。阿妈你不能这么说，我的心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亚嫫。

我灵机一动。阿妈啦，我从拉萨给你带回一件花衬衣，你看漂亮吗？

“你骗我，”她说。“你这不是给我买的，这是给亚嫫买的。花色好新鲜，我老太婆怎能穿这样的花色。”

“不，阿妈你不老。你才三十八岁，年轻得很。这是专为你买的，我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穿上试试，合适吗？”

她笑了，树根一样的脸上有了光彩。

不知不觉地我超假了。阿妈坐在屋里，在阳光底下那片阴影里，幽幽的。我背对着她，虽然毫无声音，但我知道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我脑袋里搅混了一盆浆糊，连大气也不敢出，只是垂着头。

“你别哭了。”我轻声说。

那眼泪还是一滴一滴往下掉。她说：“我，我要跟你去拉萨。当年你父亲不让我跟着去咸阳，他答应我毕业后一定回来。我要跟你去拉萨，给你打茶、煮牛肉。给你洗衣服、带孩子。你不能扔下我孤老太婆。”

我说：“有亚嫫陪着你不是挺好吗？现在我不能带你去拉萨，我住的是集体宿舍。”

“我不要亚嫫。我讨厌亚嫫。我只要跟着你，跟你上拉萨去。”

我狠着心上了汽车。没有回头看阿妈，连亚嫫也不看。鬼知道阿妈这是怎么啦，我感到担子好重呵。这是什么担子呢？

还记得十岁那年溜进果园的事。算不上“溜进”，是得到允许的。旺堆笑咪咪地让我们进去，他一边用缺了两个指头的右手拉开木栅门，一边说：“只许吃，只管吃够，要是往外拿一个苹果，看我不从脖子上把头给他拧下来！”我们笑嘻嘻一个接一个往里钻，马上躲到果园各个角落不见了。我和亚嫫在一起，她黑红的脸蛋上有凝结成块、干得起壳的鼻涕。胸前衣襟上也凝着成块的干鼻涕。

“我发明了一个吃苹果的游戏。我们不要挑挑拣拣，

亚嫫，我们每个苹果咬上一口，各种各样的味儿全有了。你看呢？”

我们就踮起脚尖、衔住一个苹果咬下一大块，又去衔另一个苹果。树矮矮的，枝杈分布恰到好处，是嫁接过的良种树，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红苹果。

“亚嫫，味道好吗？”

“好极了。”

于是每棵树上的每个苹果都缺了一块。

阿妈那时候太喜欢亚嫫了。为她擦鼻涕，叫她来家吃奶渣和桃干。还叫她把开缝的袍子脱下来补好。

“阿妈你不是常说亚嫫又顽皮又可爱吗？为什么你现在讨厌亚嫫呢？要是你愿意让亚嫫陪着你，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内地，去学习电子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这多困难啊！阿妈，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啊。”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讨厌亚嫫呢？”

那时候我们一个接一个从苹果园钻出来，脸脏得黑一块花一块，笑嘻嘻露出满口白牙。旺堆啦坐在木栅栏外的大石头上，本来很鼓的眼珠现在快要掉出来了，盯着我们的衣袋衣襟。我们没有拿苹果，一个也没拿，不

信你检查好了。

傍晚旺堆啦骂骂咧咧到我家来了。

阿妈给他顶回去。“闻到果子狸的味儿，就该追到果子狸的窝里去！你怎么知道是我儿子咬的？你抓住他了吗？”

我缩在屋里，动也不敢动，听着阿妈在屋外与旺堆啦顶嘴，嗓门越来越高。天色黑下来，铁皮灶膛里的火舌一亮一亮。

阿妈进屋来了。她的手背和手指头满是伤痕和裂纹，手心却很柔软。我让她抚摸个够。发烫的手掌从额上滑到脸蛋上，脖子上，又伸进衣领揉搓肩膀。最后握住胯下那东西，轻轻掐了一下。

一股热流从胯下升起，涌遍全身。这一夜我做了好多七颠八倒的梦，尽梦见有人掐我的那玩意儿。

有一次我从树上摔下来了，右胳膊被一段枯树桩刮得稀烂，落下现在这一片疙疙瘩瘩的伤痕。那一个月，阿妈整天围着我转。

阿妈啦，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我怎么会忘了你的身影，你的双手，皱纹密布的面孔，尤其是你的目光！阿妈啦！

十年过去了。

右胳膊裸露，靠近肩膀处有碗口大一块疤痕从结实光滑、古铜色的肌肉上隆起，令人联想到柔滑丰润的山坡上凸露一大片岩石。

他坐在机关大门口晒太阳，那紧实得似要渗出油来的皮肤，吸收了过多的紫外线，肤色介于黑种人与红种人之间。加上他挺直腰板、手肘搁在膝盖上，双手耷拉在双膝间的姿势，好象一块人形岩石搬到了机关大门口。

眉头似蹙非蹙。凝聚成细细一束的目光，不是直射出去，倒好象是往心里射回去的。这目光正在他自己心灵中萦绕，他被自己的回忆所困惑。每一个从大门口经过的人先是漫不经心瞟他一眼，忍不住惊骇地再次回眸注视他，直到走出去很远。

他坐在那里，审视内心中的苦恼，没有注意阳光已经缺乏热力，那一轮鲜红如血的太阳，从西方天际直坠下去，落入阴沉沉的群山之中。

（原载《西藏文学》1988
年第9期）

生活中应该多一点……

次登和格桑在同一个单位当干部，他俩是好朋友。

下午四点，处理完了当天的事务，他们一同骑着车，穿过熙熙攘攘的幸福路，避开“东方红”影剧院门口如潮的人群，拐过设有岗亭的丁字路口，进了路旁一家个体户甜茶馆。

地面坑坑洼洼，桌凳高低不齐。十来张桌子只剩下左边靠墙的一张空着。他们扫视喝茶的人们，走到那张低矮而且油腻的空桌前。格桑掏出两张二毛的钞票，放在桌子上。

梳长辫的姑娘提着冒汽的铜壶，收了钱，斟上两杯热气腾腾的甜茶。

次登的个子有一米八，黑红脸膛，双目炯炯，一看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有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突出的嘴唇象布谷鸟的喙，因此有人开玩笑叫他“布谷鸟”。他低声对格桑说：“昨晚，又梦见我父亲了。他站在村口那棵老杨树底下，盼我回去呢。”

格桑的个子和次登同样高大，膀阔腰圆，但动作迟缓。他抬起那双善良、迟钝的小眼睛，看着次登咖啡色

晴纶棉外衣上发亮的扣子，不说话。

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拐着腿走过来，蓬头垢面，咧开嘴，露出一排洁白细密的牙齿，朝他们伸出乌黑的小手。格桑朝小孩笑笑，掏出一个两分的硬币。小孩转向次登，次登也给了一个两分的。

马上有一个老乞丐赶过来，脖子上缠一块透着黑色血迹的、满是灰土的布，身后还跟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格桑掏出一个五分币，然后朝小孩摇摇头。次登给了两个五分的。等一老一少走开后，次登把袋里所有的六七个硬币全掏出来，垒成一叠放在桌子角上。再看看在甜茶馆里转悠的乞丐们，发现当中有一个小伙子。

“我父亲年轻时也来过拉萨，跟他差不多。”次登用下巴颏点点绕桌子要钱的小伙子。

格桑粗糙的黑脸上看不出表情，只有瞳孔深处一点东西闪闪烁烁。过了一会儿，他张张嘴，欲言又止。

次登马上觉察到朋友有什么话哽在喉头。

“你想说什么？”

“嗯，”格桑看着地面，迟疑地回答，“这段时间，你瘦了。”

“不是，你要说的不是这个。”次登直视他的眼睛。

格桑迟迟疑疑，终于把要说的话吐出半截：“次登，你跟卓玛的事，千万不能让你爱人知道，她会伤心的。”

次登皱皱眉，颇有几分不快。他警觉地注视格桑，对方负罪似地把眼睛转开了。

“有人说什么吗？”

附近有只录音机在轻轻颤动，飘来一阵流行歌曲，把格桑的回答掩住了。

“你大声点嘛！”次登的嗓子有点粗。

“今天卓玛挽着你的手走进大门，旺堆鼻子里哼一声。”

“又没挽他的手，哼什么，管得着吗？！”

“反正，很多人都有点……有点那个。”

“什么意思！”次登几乎要跳起来。

格桑深深垂下头，象个做错事的孩子，高大的躯体弯得象只虾。“最好别让巴桑知道。”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你算了吧！”次登愤愤地端起茶杯，一饮而尽。“我爱人绝不象你爱人！”

两人走出甜茶馆，都怔住了。

他们单位的炊事员卓玛，一个十六岁的姑娘，上穿

黑黄色相间的大花紧身衣，下着暗红色喇叭裤，披散着满头卷发，笑嘻嘻地推着车，从拐角处迎上前来。

“次登啦，我都等了十分钟了。”

次登没好气地回答：“讨厌！谁请你来等的？”

格桑沉下脸，扭过头，顾自打开自行车。

卓玛撒娇地擂了次登一拳：“人家想等……”

次登闪电般回敬一拳，打在那丰满的脊梁上，而且下手很重。“少来这一套，成什么体统！”

卓玛悻悻的，她一回头，见格桑已骑着车跑到五十米开外，不辞而别了。

次登骑上车，卓玛跟在他身后。

“次登啦，中午妈妈骂我了。”

“骂得好，应该多骂。”

“妈妈拿扫帚打我，赶我出来，叫我永远不要回去。”

“那就别回去。让你阿妈满八角街找你。”

卓玛闭上嘴，在一条小巷前刹住车。她内心痛苦，又很孤独，周围的人厌恶和轻蔑她，好多人跟她说话都用带侮辱性的字眼。只有次登，她觉得，才仍旧把她当做人看待。这条小巷通向一个对她具有诱惑力的地方。

次登从车上跳下来，摆摆头：“走吧，上我家喝碗茶

去。话说在前头，可不准乱翻东西，不然我揍你。”

次登边走边想，要是妻子巴桑在家，能和卓玛谈一会儿就好了。要是她听了风言风语，今天就应该驱除这道阴影。

次登有点烦躁。本来不用费神专去告诉巴桑，因为他们互相信任，感情深厚。多嘴多舌、爱管闲事的人真讨厌，讨厌透了。不管怎样，他决定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巴桑知道这事。

到家了。一推门，他傻了眼。

地上摊着一堆铁的和木的零件，那是他昨天刚从公司里买来的两支价格昂贵的玩具冲锋枪，两个宝贝儿子四肢着地，在研究枪的弹簧装置。

听见门响，五岁的大儿子赶忙爬起来，双脚并拢，诚惶诚恐，等待处罚。三岁的小儿子仍然爬着，笑嘻嘻地，自鸣得意地望着父亲。

卓玛没有注意父子间紧张和滑稽的气氛，她在巡视周围。这里属于另一个世界，她不理解而希望理解的世界。这里全是十八军进藏后才开始兴建的那种平房，简陋而实用，每栋平房住三至五户人家。人们穿着蓝色、灰色、咖啡色的衣服，一本正经，急匆匆地进进出出，

似乎都在考虑重大问题，没有卓玛生活的环境里那种散漫、嘈杂、纷乱和危机四伏的气氛。

她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些平房，另外一些整洁的小道。那是医院。

“……要做流产手术？”穿白大褂戴眼镜的医生上上下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她。“你多大了？”不等回答，又说：“去，叫你丈夫来。”

事隔半年，想到这里卓玛仍旧心惊肉跳。医生对她好不客气呵。孤单、恐惧……眼泪在眼眶里转。只有阿妈经常陪伴着，悉心照料她，直至出院。而现在，阿妈对她也不宽容了。

但是，又有谁明白告诉过她，她错在哪里呢？大家都取笑她，把她当一只乞食的无家可归的狗。

这时她听见了次登父子的对话。

“阿爸，我和哥哥把枪拆了，拆得好快啊！”

“你们光会拆，不会装，算什么英雄好汉？”

卓玛看见了次登家成套的汉式家具，引人注目的藏柜和藏式方桌。门口用木栅栏围成一个小花园，叫不出名字的花儿正红艳艳地开着。几盆长红果子的小树，树根有水浇的痕迹。紧靠栅栏是两行绿油油的大葱。花间

有蜜蜂轻飞，树上有鸟儿鸣叫。

“哦——”卓玛呼出一口气。拉萨的夏天这么美好，树木格外葱茂，阳光分外明媚。从开春以来，好象第一次感受到这一点。她自己家，那藏式小楼的底层，紧隔壁有绵羊“咩咩”叫，熟悉的羊粪味儿从门缝往里钻。

次登和孩子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浮想。

“你们拿什么下的螺丝？”次登抱着小儿子。

大儿子还立正站着，把小刀递到父亲鼻子底下。

次登摇着头，把报废的铁片木块拣进一只大木箱，木箱里还放着被肢解的玩具猫、掉了脑袋的布娃娃和没轮子的汽车之类。

卓玛在次登背后伸长了脖子，望着木箱里的东西问：“这都是买来玩的吗？”

“小巴珠，小罗布，叫阿姨。”次登拍拍孩子。

清脆的童音使房间生气勃勃。卓玛恍惚觉得自己的童年是昨天才结束的。她正和妈妈一道，每天赶着十几头奶牛去拉萨城外的草滩里放牧。

“次登……”她叫，鼻子发酸。

次登用父亲般温和的眼光看着她。这是个不太懂事的小姑娘，他想，不能象对待一只狗那样鄙弃她。如果

大家都对她皱眉头和瞪眼睛，十几岁的女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现在还来得及，因为她还年轻。

“早点回家去。别跟阿妈赌气，让老人满八角街找你。”

卓玛泪汪汪地点点头。

“这几天晚上，你都在哪里？”

“陪阿妈去大昭寺转经。”

次登苦笑。转经的并不都穿着老羊皮袍。“好吧，转经去吧。跟阿妈在一起，总比跟流氓在一起鬼混好。”

“我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卓玛突然用异样的目光凝视他。“次登啦，好多话，我和阿妈都不说，只想告诉你……”

门口一暗，进来一个人，是次登妻子巴桑。她提着一小袋土豆，刚好听见卓玛的最后一句话。

“这是我们新来的炊事员，叫卓玛。”次登对妻子说。

巴桑对卓玛友好地点点头。只一眼，她便将卓玛的衣着神态一览无余。转身放土豆时，巴桑暗自皱皱眉。

次登注意着巴桑的表情。

卓玛如坐针毡。她到现在才意识到女主人的存在。女主人越是温和有礼，她越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她怎么会到这儿来的？是孤独驱使的，还是好奇吸引的？她想起是次登请她来的。只有次登把她当人看。卓玛想学女主人的样，谦逊地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告别。但她心慌意乱，大花紧身衣和暗红喇叭裤使她觉得自己象一只可笑又可悲的大花蝴蝶。

“卓玛，以后来玩！”次登在她身后说。

“慢走啊，以后来玩！”是次登妻子的声音。卓玛连忙答应一声“好”，那嗓音不象自己的。

巴桑动手做晚饭。她边洗土豆边对孩子们说：“小巴珠，小罗布，把今天学会的新节目表演给阿爸看，好吗？”她没有正眼看次登。

孩子们欢呼雀跃，开始了“家庭表演”。次登笑咪咪地听着大儿子咬字不准的独唱，劳累和烦恼一扫而光。“巴桑真能干，”他朝妻子投去感激的目光，妻子感觉到了，回报以微笑。但与此同时，他捕捉到了巴桑眼里的一丝阴影。

饭后，当他盘腿坐在卡垫上，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巴桑也伏在一张条桌上，摊开一摞练习本，给中学生们批改作业。她突然想到了什么，放下红色蘸水笔，走过来替次登斟上满满一碗酥油茶。然后，好象漫不经心的，

轻声问：“卓玛和那帮流浪朋友断绝关系了吗？”

次登沉吟片刻。他可以用一两个字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是，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呢？这个时候他真希望能有人跟他讨论一些问题。巴桑信任他，信任却不等于理解。巴桑不是那种心胸狭隘，情趣低下的妇女，她宽容大度，对人对事有自己的看法，往往还很正确。不过，啊，妇女终归是妇女。

“前天晚上我九点钟才回家，你也没问问。”次登同样轻声。

巴桑温柔地摇摇头。“我想你有工作。”

“我送卓玛去了。她蹲在食堂火炉前不肯回家，也不说为什么。我怕她出事，送她走。在冲赛康街口，窜出来三个小伙子。”次登又捉住了巴桑眼睛深处的阴影。他凝视着，不说话。

“次登，你会不会……？”后半句咽了回去。

“什么？”次登笑着问，心里却很紧张。

“……会不会出危险？”

“怎么问这个？”

“上个星期，就有人加油添醋地告诉我，有个漂亮姑娘缠上了你。我没相信。你送卓玛回家，应该的，你

明白吗？我支持。”巴桑忧心忡忡，“我想提醒你，你有两个孩子，还很小……万一被流氓盯上了……也许，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次登笑了，打心底里笑了。人生呵，多一点体谅和欢乐，少一点妒嫉和仇恨吧。

停电了，一片漆黑。次登点上蜡烛，走近床边，瞧瞧已沉入梦乡的巴桑和孩子。

次登老忘不了阿爸。人们都说，阿爸是村里最善良的人，而次登最象阿爸。老人总是斜套着氍毹袍，袒露右肩，里边穿一件白衬衣。他送少年次登去上学，又送青年次登参了军。每次得知次登要回家，他就站在村口那棵老杨树底下等着，有时一连等上几天。看到心爱的儿子从青稞地里向他跑来，高兴得泪花闪闪。

故乡的青稞地，故乡的小河，故乡的老杨树呀！次登痴痴地想着。

（原载《西藏文学》1984年第2期）

4 引 子

拉萨一个中专学校里的故事

不要猎奇。

对藏民族，我从来没有抱着猎奇的心态。

一个民族就如一个人，有自尊自信，才会有自立自强。谁都希望自己的习惯被人尊重，谁也不愿意自己的习惯被当作笑料。

以平等爱人之心，去贴近自己所希望了解的一切。

远飞鸟儿请告诉我，拉萨景况怎样

西藏艺术学校位于拉萨西郊，闻名于世的青藏公路蜿蜒于学校大门外。往东望去，会看到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往西走两公里左右，雄踞在山窝里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寺庙之一哲蚌寺；而南面，越过西藏宾馆和一片开阔地，是达赖喇嘛消夏宫殿美丽的罗布林卡。艺术学校座落在这些闻名于世的古代建筑之间，她自己，因为参加过两届大型国际舞蹈节取得轰动效应，同时作为亚运圣火少女达娃央宗的母校，也闻名于世。

我有幸在西藏艺校担任过 6 年汉文教员。

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因为经过严格挑选和严格训练而气度不凡。每当舞蹈班、藏戏班的女学生结队外出，总象夜空中闪烁的群星引人注目。器乐班的学生腋下夹着乐谱，唇边挂着微笑，不紧不慢地踱步，多了几分矜持。我第一次给话剧班学生上课时，走进教室便呆住了——这个班集中了人间尤物，男孩气宇轩昂，女孩娇美若花，年龄，气质、个头都非常整齐。

给美丽的孩子们上课，教师的心情象春天的早晨，增添几分明朗，几分清丽。

汉文教学中，最使学生烦恼的要数作文课了。尤其对于这些藏族孩子，用汉文作文更是一桩苦差。当然，无论对于什么学生，仅仅关在教室里讲文章法则，都是写不出好文章来的。经过一番准备，我决定带他们去野外。在教室里讲规则，到野外去观察，把观察结果按要求写到本子上。孩子们自然欣喜若狂，他们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天生一双矫健有力的长腿，喜欢到广阔天地里驰骋。

拉萨永远艳阳高照。我领着一帮兴高彩烈的男女学生，拿着作文本和笔，踩着软绵绵的青草，到小河边去观察垂柳、白杨、清澈的流水，水中的小动物……他们

认真地看着，写着、殷勤地询问着。有的学生还要再去，以求作文更加完美。这样的作文课，轻松愉快，收获颇丰。

我住在一栋四层大楼的底楼，头顶上二楼是声乐班学生宿舍。每天晚饭以后、晚自习以前那一会儿，孩子们喜欢聚在阳台上唱歌。

“请到西藏艺校来，一年到头两种菜：

冬天来了吃萝卜，夏天来了吃白菜。

来呀来呀来呀……”唱完，爆发一阵大笑。

更多的时候，则是深沉浑厚的男中音小合唱。略带忧伤的嗓音用藏语低哼，非常动情。记得有一首藏歌正在流行时，他们天天唱的就是这首歌。

“啊——啊——啊——啊——

眺望圣洁的雪山，思念我的家乡。

启明星光闪亮，想起恩深的爹娘。”

据说这是一位流亡国外的藏胞创作的歌曲，曲调深沉优美，充满了难解的故国之思。这位藏胞一直不愿披露姓名，有关部门曾呼吁他的出现，也查找过，这位作者却拒不露面。

声乐班的男中音们用略带忧郁的嗓音唱起这支歌，

歌声中充溢着对流落国外的同胞的耽心与思念，那份深沉使住在楼下屏息凝听的我心灵为之震颤。

“身居异国他方，心儿随风飘荡，
上苍啊上苍，佑我平安无恙……”

歌声中有着对异国气候水土的不适，有着不溶于异国文化的苦恼，有尘土飞扬的大路，有繁重的劳作，有无家可归的凄楚，更有夜半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的怅惘……

就在曲调低沉伤感、十分苍凉时，一个清脆嘹亮的女高音加入了合唱，带来阳光穿过云层般的明亮，使精神为之一振：

“远飞鸟儿请告诉我，拉萨景况怎样？……”

我情不自禁挂念起那位流亡的藏胞：你想念祖国，想念家乡吗？你希望回来看看美丽的家园，投进亲人的怀抱吗？你希望回来加入建设者的队伍，建设繁荣美丽的新西藏吗？

接着，高亢振奋的男女声混合，歌声激越，充满强烈的希望：

“我的青龙骏马啊，不必凄凉彷徨，
命中相会有期，定能如愿以偿……”

最后，又是令人回肠荡气的结尾咏叹：

“ 啊——啊——啊——啊—— ”

我不知道，楼上唱歌的孩子们，是否有亲人流落国外，他们的父母长辈是否把对亲人的思念传递给了他们？

每天黄昏，我坐在底楼的窗前，听着美丽的孩子们在阳台上唱着美丽的歌，觉得这是一整天忙碌之后最高级的享受了。

如今，我坐在重庆歌乐山下小小居室的窗前，不禁要望着窗外：远飞鸟儿请告诉我，拉萨景况怎样？

（原载《重庆民革》

9 6 — 1 期）

珞巴少年

果让坐在那儿。

他皮肤粗糙；头发黑得凝重，墨汁似地象要渗出油来；眼睛黑得深沉，连反光的亮点都没有，但眼神是温和的。他满脸崇敬，听着面带微笑的女老师讲课，女老师刚刚开始，正侃侃而谈。

瞬间祸起萧墙。果让不经意地占住了两个女孩子的

座位——那是两个女孩原本用两本书占住的位子，果让推开了她俩的书，当仁不让地坐下来。女孩们来晚了一步，她们要果让走开，果让不理睬，女孩们气愤地指责他。

果让很容忍，他呆坐着一言不发。继而脸红了，由绯红而通红，而血红。他没有跳起来，女孩们几次碰了他，也没有动一动。但是当激动中红衣女孩抓住果让的胳膊使劲儿拉时，果让就跳起来了，“腾”地一下，眼冒血光。他反手抓住红衣女孩手臂往外推，另一只手抄起座凳，由下往上，以加速度甩过头顶，抡圆了，重重地砸向桌面。

果让砸凳子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但红衣女孩右手的四根指头正扶在桌面上，刚好在凳子砸下的位置。

女老师闭了眼。事件发展迅速，果让的暴跳始料未及。她好像看见女孩的四根手指头，断了骨头连着筋，血肉模糊。她脊梁上冒出冷汗，手掌发麻，一颗心直沉下无底深渊。

千钧一发之际，红衣女孩本能地挪开了手指，凳子“砰”地一声在桌面砸出了一个坑——惨祸避免了。

阿克校长来了。校长的大巴掌猛力往桌上一拍，震

得桌子跳起来，随着厉声训斥，果让颓然坐了下去，头慢慢低了，眼里的血光逐渐消退，眼神一点一点收敛，眼珠重又黑得深沉，黑得连反光的亮点都没有，显出面对神明般的敬畏。

阿克校长在果让心中占有神明般的位置。果让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父亲。

作为舞蹈班学生，果让的形体条件并不理想。个子太矮，腿短而粗，属于那种永远长不高的体形。但阿克校长慧眼识珠，百里挑一选上他，还很器重他。

1983年，阿克校长乘坐那辆“212”型北京吉普车，风尘扑扑赶到藏东南察隅县去招收学生。顺便提到，察隅县山水秀美，素有“西藏的江南”之美称，不仅林木丰茂，花果飘香，环绕着村庄还有水稻田，弥补了西藏绝大部分地区不产稻米之不足。还顺便提到，察隅稻米颗粒短小，色泽黯淡，可是煮出的饭很香。村子由一栋栋独立的木楼房组成，楼下堆放柴禾饲养牲畜，楼上住人，屋前一片庭院，种有苹果和梨。

阿克校长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白天和老师校长接触，晚上去广场参加锅庄晚会，观察测试一个又一个孩子。

13岁的果让正戳在稻田里帮阿妈插秧。他个头矮矮的，满屁股拖泥带水，在泥浆里挣扎得挺苦。果让被带到阿克校长面前，伸胳膊，动腿，下腰。果让腰腿的基本能力令阿克十分欣喜——这孩子，别看个子矮，腰却特别有力，又特别软；大腿能力好，通过训练，能完成很漂亮的旋转动作。至于形体条件欠佳，上舞台不理想，可以当教员，如果文化课成绩优秀，还可当编导。

当即拍板：收了！

没想到果让的母亲不同意。母亲希望他学医。果让不听母亲的，果让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阿克，他信赖这位体格魁梧、相貌威严的校长。他愿意跟他走——潜意识里，已经把阿克当作了父亲。

果让没有父亲，缺少父爱。阿妈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六个孩子养大。阿妈把阿克校长拉到一边，避开果让，她对阿克校长哭诉了家庭的不幸：果让的父亲去世与酗酒斗殴有关。阿克校长肚里装满了果让家中的悲欢离合，眼里便溢满了父亲般的慈爱。

果让离家那天，母亲拦着他不让走，果让推开哭泣的母亲，头也不回地跑了。

教舞蹈基本训练课的老师注视着果让。果让正在认

真练习，按照她刚刚讲解过的要领，“甩头，留头，不能停顿。”教师眼里流露出喜爱的神色。果让是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摒除一切杂念，专心致志，十分投入。

基本训练课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严酷的考验，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紧张，艰苦，疼痛，疲劳。常有学生过不了这一关而逃学甚至退学。但是果让不觉得苦，质朴勤劳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良好的习惯。

平转接空转。老师说：“劲要用在脚的位置及蹲上，空转720度，果让，你只有540度。劲不能用在甩腿上，亮相要稳！”

720度？什么叫720度啊？果让想了半天也没明白。

勤奋与聪明常常不统一。因为难以理解老师的话，因为记不住动作，果让常常感到心灵的压抑和创痛。自己笨，不开窍，也许有同学在背后嘲笑。

那些念完了小学、念过初中的同学悟性最高。他们风度翩翩，他们并肩而行，开怀大笑，有的斜着眼看他。这使果让非常恼火。

果让做得最好的动作是“蛮子”，俗称“空心筋斗”。他做得干净利落，先打飞脚，再蹦起来翻筋斗，很是漂

亮。有一次他听见一个男同学轻蔑地说：“什么了不起，果让就只会这一个动作！”果让在心里恨恨地说：“我要揍他！”他咬着牙，攥紧了拳头，眼珠子通红。

果让常常打架，不管对方年龄大小，个头高矮，甚至不管男女。打完架，挨老师批评的往往是他。

整个80年代，在西藏艺术学校，珞巴族学生只有果让一个人。他常是踽踽独行，他满口方言，不善交流，倏忽间会牙关紧咬眼珠血红。同学们回避他，他也疏远同学们。而孤独永远对学习有利。

孤独使他跟汉文女老师很接近。从年龄上来讲，女老师介于果让的姐姐和母亲之间。

“我们村属义都部落，在察隅县松冷区，西方人称我们为‘朱利嘎塔’，意思是剪发的人。我们梳的发式很特别，沿额头剪刘海，一直剪到后脑，在后脑留长发，再卷成一个髻。男女相同。女人头上发针首饰要多些。有材料说，穿我们这种服饰、说我们这种方言的，全世界一共只有30多人。”

果让语气中充满了骄傲。他还说，家里养猪、牛、羊，不是关在家里养，而是清早轰出去，傍晚它们自己会回来。就象住旅店一样。当然偶尔也有不回的，或是

被野兽吃掉了，或是与山中野牛羊交配，数月后带着一大群后代，与配偶一齐归来，使主人又惊又喜。“如果主人对它好，有了感情，它们会回来的。”

1988年7月，已经是这一届舞蹈班临近毕业的日子。果让和同学们一起，由阿克校长率领，组成代表团，赴广州参加“88羊城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再转赴香港参加“香港第三届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

在广州，西藏民族民间舞引起轰动，博得好评如潮，赢来一面“誉满羊城”锦旗。在香港，热烈奔放的西藏舞激起在场所有人的强烈共鸣，观众始终随着节拍击掌助兴，气氛炽烈，不时赢来一阵阵轰破屋顶的掌声。果让表演的“满地滚”功夫，其速度、力度令人惊讶，堪称“绝活”。

正如阿克校长预言的：果让的外型条件注定他永远当不了主角，他却永远是一名成功的配角。

从香港载誉归来，孩子们面临着毕业分配。留校名额非常有限，阿克校长日夜思虑。

“果让，果让，果让……”让他留校作毯子功教员呢，还是让他回家乡的地区宣传队去呢？如果回地区，他得不到最佳发挥条件，其特殊才能将被埋没；留校呢，

是合适的也是可行的，只是这孩子的性格脾气……“果让，果让，果让！”阿克校长反复思虑。

当校长犹豫不决时，如果果让能够主动谈出自己的想法，会帮助校长下决心的。

果让不吭气。他回避着阿克校长。他的沉默里有某种抵触的东西。这沉默帮助校长下了决心：还是让他回家乡宣传队去吧！当教员必须有教员的气度，还必须具有协调能力，人际关系紧张可不行。

一直关心这孩子的女教师把果让找了去。往常他对女老师无话不谈，今天却只有寥寥数语：“自从来到拉萨，一直感到自己受学校老师同学照顾，因为自己是珞巴族。”他激动起来：“我干嘛要接受照顾？我不要照顾！我宁可回到家乡去当临时工，呆在地区宣传队也行，我决不愿意被照顾留校！”

铮铮然掷地有声。然后果让坚决地闭上嘴。

女老师长长的叹口气。

果让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阅览室内

平措老师以脾气暴躁闻名全校。他素来讨厌孩子们

在阅览室内大呼小叫，吵吵嚷嚷。“喂，同学们安静！”他使劲敲桌子，“砰砰”声盖过了那一片喧哗。

可是孩子们不理他。他们围成一团发出的叫嚷声连天花板也似乎要被抬跑了。

平措老师哼哼地朝聚在一起的学生们走去。他不止一次和那些大男孩干过仗，若他打赢了，便会被校长批评一顿；有时他输了，便自忍倒霉，把从牙缝中流出的鲜血咽下肚去。

他也常常自责，唉唉，就是改不了这臭毛病！

学生们依旧闹着笑着，谁也没把这个目光阴沉的年轻男老师放在眼里。平措老师伸出手要揪一个男孩的脖子，要把他扭过来，而这孩子常常以打群架凶猛震惊全校，平措常跟他较劲，两人难分难舍……

就在这时，小姑娘尼玛从人群中探出头来，得意洋洋，将一本画报举到平措老师鼻子底下，喜不自胜地尖叫着：“格平措啦！你看呀，这是我，这是我呀！”

平措收回正要去抓男孩脖子的手，一把夺过画报，同时怀疑地瞧瞧这个亭亭玉立、收拾打扮得挺时髦的15岁女学生。

画报上有张三寸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有个年约四

岁的小姑娘，穿着门巴族服装，傻呼呼，脏兮兮，抱着一个大红苹果，毫不害臊地张着大嘴，还缺着一颗门牙，笑嘻嘻地啃下一块来。

平措老师忍不住，跟所有的孩子一道，“哈哈”大笑了。

（原载《拉萨晚报》1986年）

相交织的命运

我认识他，是在一次黑夜的斗殴中。那个夜晚，月色朦胧。柏油马路旁边的岔道上，有一团黑影纠结扭动，时聚时散，发出急促的喘息声和拳头击在身上的闷响，还伴有呻吟。一个人倒在地上，其余的象狼一样扑上去，用拳头，用穿皮鞋的脚，乱打乱踢。不一会儿他们都跑走了，只剩下被打倒的那个孩子，象头受伤的小鹿蜷成一团。我走到他身边，只见他满脸鲜血，牙关紧咬。听见脚步声，他慢慢睁开眼睛，瞪着我，眼里射出冷冰冰两道寒光。

几年后，因打架伤人，他被公安机关逮捕。

我想，冰冷的手铐锁住他双手的时候，眼睛里射出

的一定也是这样的光：冰冷、锐利，而且粗野。难道他陷入这样的命运属于必然？要知道，对于生活，他曾经满怀热烈的憧憬和希望！

那是一个傍晚，夕阳的光线格外柔和。我正在批改学生作业，忽然有人敲门。轻轻的，怯怯的，敲了三下。原来是他！卷发梳得整整齐齐，衣裤鞋袜都很干净，搓着双手，满脸羞涩，迎着我惊讶的目光，他说，“格啦，我想学英语，你教我吧！”

我教了他三个月英语。每周两次，都是在同样美丽的黄昏。他学语音很困难，特别是当爆破音和长元音构成轻读音节时。期末考试临近，我们的英语课被迫中止。这之后，在校园里相逢时，他投向我的目光，总是那样羞涩，充满感激，令人想起草原上贴着牧人站立的小牛犊。他告诉我，期末考试，除了一门功课是75分外，其他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

有时我们闲聊。他说：“我的最高目标是进大学，西藏大学。”还说，大学毕业之后，要拼命攒钱，买辆摩托车，把老婆搭在车后座上，跑遍全西藏。

“老婆？！”我好吃惊。“你才十六岁！”

“是的，老婆，”他脸上洋溢着柔情，全身都被温柔

的光辉笼罩住了。“不过，这只是我理想中的老婆，忠诚，温柔、美丽。”

那时候，我觉得，他的命运之光是金色的，金色光辉投射到我心里，使我的生命也为之充实。

可是，两年后，我从内地返藏，他却在监狱里服刑。我心的某一隅塌陷了，沉落在苦涩而阴郁的大海中。从此我生活中又有了一项新内容：关心这个孩子，帮助他在人生旅途上勇敢地走下去。我希冀，也相信，金色的命运之光会再度降临，照亮他的整个生命。

（原载《拉萨晚报》1987年10月27日）

雪原上的韵律

——记西藏艺校校长阿旺克村

拉萨河静静地往西流，淌过古老的日光城。河道纵横，沼泽遍布，河谷地带空阔舒展，植被繁茂，显得那么肥沃。松赞干布时代，牧民们称它为“涡汤”，意思是“淌着牛奶的平原。”

直到本世纪50年代，在拉萨渡河仍需乘坐羊皮筏。

从此岸到彼岸，得花费大半天时间。当今拉萨城内的时髦青年听到这一传说，像听神话般地，还得努力去想象当时的情景。

西藏和平解放那年，荆棘丛生的河滩上，孤零零站着一个衣衫槛褛的牧羊少年，他就是阿旺克村。仅仅 13 岁，已当过了小伙夫、小木匠、小牧人，饱尝了奴隶生活的屈辱与辛酸。

他贫穷，却很聪明。没有机会念书，却拥有丰富的想象。在“歌舞的海洋”里，他秉承着藏民族歌舞兼长的天赋，自幼便熟悉了“堆谐”、“朗玛”、“果谐”的节奏与旋律。他常常像小鹿一样欢跳，还能在头顶上放一碗水，跳完一曲活泼的“堆谐”，水却一点也不洒出来。他还天生一副嘹亮的歌喉，独自一人时，仰望青天，俯视流水，歌声在河滩上久久回荡。

抱着初生的小羊羔，他常常满怀憧憬，做着“等我长大了”的梦。但是，谁来砸开套在农奴脚腕上的镣铐呢？

惊雷一声，“十七条协议”打开了农奴翻身的大门。牧羊少年以惊异的目光注视着列队开进拉萨古城的金珠玛米，又看着他们在河滩上开荒种下苹果树苗。

全新的生活召唤着阿克。他挎上缀有红五星的书包，跨进了拉萨小学。两年后，他和一群男女同学一起，作为“青年观光团”成员，骑着马，带着帐篷和酥油，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到了成都。然后换乘连做梦也不曾见过的火车，到达神话般的首都北京。眼界和心胸突然拓展了，他省悟到，在拉萨河滩上做的梦就要变成现实了，崭新的道路已在脚下延伸。

先后在北京和昆明学习。16岁的共青团员阿克迅速成为一名优秀歌舞演员。他与著名歌唱家胡松华和他的妻子、舞蹈教授张曼如，共同切磋艺术，潜心钻研舞蹈、声乐知识。

这时的阿克，已经萌发成为他艺术生涯主导思想的“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这一创作观点。

在全国首届舞蹈编导训练班结业时，阿克奉献了他的结业作品——双人舞《背水姑娘》，获得老师与同学的一致好评，给他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歌舞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59年，在举国上下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他应邀到了北京，舞蹈《丰收之夜》赢得了最热烈的喝彩，并与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

娃等一起在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设宴招待。1960年，与才旦卓玛等一道出席了全国第三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并作了《昔日的奴隶，今日的主人》的专题发

60年代初，他以小时候亲眼见到解放军在河滩上开荒种树，后来结出了又大又香的红玉苹果的经历为题材，编导出舞蹈《高原苹果香》。阿克深深懂得，艺术创作决非一蹴而就，真正的艺术品是在不断修改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中日臻完善的。为了把《高原苹果香》改得更理想更精致些，他下到被誉为苹果王国的林芝地区，深入观察和体验，差点连车带人栽进湍急的尼羊河。《高原苹果香》几经润色，艺术上更趋成熟，舞蹈所表现出的真挚感情曾使许多老战士为之流泪，被评为优秀节目。这之后，他又先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翻身农奴向太阳》、大型歌剧《红旗卷起农奴戟》、双人舞《颂家乡》中担任男主角。这些舞蹈作品在西藏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阿克舞台生涯的光辉灿烂的顶点。

有首歌优美的旋律经常在他心中回荡：

“……甘甜的雪水把我养大，
闪光的银峰看着我成长；

富饶美丽的家乡啊，
我怎能不为你歌唱……”

这首歌成为他生命的基调，使贫穷的牧羊少年迅速成长为舞蹈演员，舞蹈家，直至成为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西藏艺术学校校长、西藏文联副主席。

古老的藏民族昂首挺胸走进现代社会，走向世界。短短时间里，西藏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民主改革，民主选举，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科学种田、科学饲养，报纸广播邮电航空……各种影响，各种观念，古与今、新与旧、土与洋，潮水般冲击着纯朴的西藏人头脑里的传统观念。作为一名舞蹈艺术家，在历史大潮面前，如何看待古老的藏族歌舞艺术呢？

阿克说：不要赶时髦。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传统，继承这一传统。民族民间艺术，特色越鲜明，越有生命力。

当然，60年代的阿克，这一思想，还带着局限性，还不成熟。“古老民族传统怎样才能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直到80年代，迪斯科牛仔裤垄断拉萨古城时，阿克观念中的朦胧色彩才逐渐退去，进一步提出“过分强调‘土’，无异于提倡倒退”，完善了这一思想。

他说：老老实实把自己所想所虑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去表现，挖掘透彻一点，表现深刻一点，这样才更具有现实意义。

六、七十年代，他曾多次去昌都地区采风、演出，体验生活。跟当地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间同去娱乐场所唱歌跳舞。每年七、八月份，是东藏最美的季节。有一次，他们去波密地区的松宗为部队演出。雨后，空气湿润清新，森林峡谷景色壮观，一弯彩虹直插江中，明朗而绚丽。那一刻，他突发了创作欲望，决定要编一个舞蹈，以东藏傍晚景色为背景，表现藏族青年的幸福生活与纯洁爱情。

要把浮动在意象中，难以把握的创作情绪具象化为可见可触的舞蹈节目，是非常艰苦的过程。先要把“果卓”动作中最有特点的部分分解开来，寻找其中的韵律，取其精华，再根据舞蹈节目的主题需要，重新组合，加以融汇。

他给这个舞蹈节目定名为《江边篝火》。舞蹈语汇、音乐、服装都充分体现出东藏特色。表现出来的性格像骏马，像雄鹰，深沉而又刚健。这时候他已开始琢磨：怎样才能给予自己熟悉的意象具有新的时代感？

这一想法直到他担任西藏艺术学校校长的数年后，才得以实现。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往后推延了十多年。

霉运来自于他妻子的家庭成份。虽然妻子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族舞蹈演员，却因“贵族小姐”的出身连累了丈夫，阿克编导的曾使观众感动得掉泪的《高原苹果香》被禁演，他本人一度被取消演出资格。这使得阿克精神上长期忍受着痛苦的折磨。

乌云终于散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阿克恢复了名誉。一天，他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会，从广播里听到为《高原苹果香》平反的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

1978年，他创作了民间舞蹈《弦子》，被选为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北欧五国的节目，外国观众评论道：“典型的东方色彩，优美典雅！”

不久，阿克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时接受了筹建西藏艺术学校的艰苦任务。

拉萨的八角街，以繁华热闹的商业摊区著称于世。自然组合发展起来的土黄色陈旧建筑，挨挨挤挤，一座连着一座。有商店摊贩、市民住宅、手工作坊以及政府设置的机构，那条窄窄的主要街道，也是绕着大昭寺磕

长头的转经路。每年藏历四月十五，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涌来，一圈一圈按顺时针方向转经、祈祷。

初建的艺术学校校址，位于八角街闹市中心，大昭寺背后的转经路旁，不过是一幢占地千余平方米的百年旧楼。

一位外国朋友参观了学校后，奇怪地发问：你们是不是单单要继承大昭寺的宗教艺术？！

那情景是令人难堪的。八角街里，佛教徒的香烟终日缭绕，一缕一缕飘进学校；讨价还价的喧哗声不绝于耳；还有转经磕头，投机倒把……

然而艺校的创建者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根据阿克的建议：马厩改建为琴房，楼底破仓库改建为厨房，楼顶改建成办公室兼阅览室、小排练场。原贵族的经堂被改装成唯一的练功房和实习剧场。阿克筹划和主持开办了“首届全自治区舞蹈编导训练班”，并在这座经堂改建的剧场里，成功地举办了结业汇报演出。

与此同时，阿克积极组建教师队伍，策划招生工作。开学前后便迎来了一批经验丰富的藏、汉族专业教师。然后，他又深入农村牧区，观察挑选好苗子。他总是在下乡过程中兼作采风学习，歌舞兼长的优势带给他莫大

好处，常能满载归来。后来发表的若干论文，有好些就是招生归来写成的。

他正式担任艺术学校校长时，还不到50岁。可很多人都以为他已年近花甲。满脸沟沟坎坎的皱纹包容着逝去的故事。已到发胖的年龄，由于竟日操劳居然没有胖起来。但那灼灼的目光却给他平添了一股威严。学生们碰见他，总是毕躬毕敬地问候：“阿克校长好！”

一个毕业生在作文中写道：“……在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回忆在母校度过的五年，阿克校长头上的白发使我吃惊：我们进校时，阿克校长的头发还全都是黑的啊……”

艺术学校搬迁到了风景优美的西郊。

卢梭说过，“一个真正的教师指点给他的学生的，不是已投入了千百年劳动的大厦，而是促使他去做砌砖的工作，同他一起来建造大厦，教他建筑。”阿克校长正是这样带领孩子们，给民间舞蹈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阿克校长亲自从偏远的国境线附近招收学生。他熟悉他们，胜过熟悉自己的儿女。

一个来自国境线上某山村的男孩子，刚来时14岁，个子小小的，想家，哭了，哭了好多次。只因酷爱跳舞

才留了下来。发练功服时，他发了半天愣：“这是啥玩意儿？”他的满口方言很难让人听明白，又动辄涨红了脸挥动拳头打得对方口吐血沫子，几乎与所有男同学都打过架。校长和老师教育、教育、再教育。终于，他拿尖利的刀子，在右手腕内侧刻上两个汉字：“改正”。从此不再打架。

后来小家伙长到18岁，面目清秀，体格匀称，躯干细长，敏捷灵活。阿克校长评价他说：“学习进步快，动作灵活，情绪表达充分。舞台生命长，可以跳很多年……”

另一位尖子学生，来自国境线附近的门巴族，出身干部兼知识分子家庭，性格内向，教养很好。父母希望他上大学，他却坚定地选择了舞蹈艺术。他精读《舞蹈编导知识》，漆黑的大眼睛显得执著。阿克校长说，这孩子，在舞台上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将进入创作研究阶段，最终成为编导或理论工作者。

格桑卓嘎，后藏地区一位县委书记的女儿，父亲早逝。她感到阿克校长就像父亲一样。这女孩形体条件好，性格沉静温柔，学习勤奋自觉，尤为难得的是毫无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她是阿克重点培养的学生。阿克校长曾

在操场上与格桑卓嘎谈了很久。

“……苏联乌克兰莫依斯耶夫民间歌舞团，从建立那天开始，跳一个很动人的民间舞。过了50年，依然跳那个舞，依然感人。原因何在？时间像江河一样奔流，民间舞跟着江河奔腾般的时代前进。他们把节奏、速度都改变了，体现了时代感，强调了内在韵律，什么时候看，都让人觉得新鲜，都给人以力量

阿克把孩子们的目光引向历史，引向国外。他要他们迅速摆脱古老习俗造成的局限，去迎接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机遇。

这时，《昌都果卓·江边篝火》已顺利排演完成，获得一致称赞。但是阿克不满足。他感觉其中有个薄弱环节；缺乏高潮。观众不但没有激动，相反，关键时刻情绪还降下去了。问题在哪里呢？经过反复思考和推敲，最后找到症结所在：以前跳的都是情节舞，有悬念，有发展，一定程度上，情节帮助舞蹈动作产生吸引力。而《江边篝火》纯是情绪舞蹈，全凭舞蹈语汇自身所产生的美感、所唤起的情绪来激发观众，产生吸引力。经另一位舞蹈家建议，阿克改双人舞为雄健的男子集体舞，豪迈奔放，昂扬热烈，使整个节目情绪推向高潮。这段

男子集体舞也是“昌都果卓”的舞蹈语汇，是从左贡县农村中一次锅庄晚会上吸取来的。

还有一个舞蹈节目《藏北牧民舞·欢乐的羌塘》，其最初的动作来自民间，多是摹仿动物，弓着腰，低着头，一股沉重的压抑感。后来改为抬起头，挺起胸跳，变沉重，低落的情绪为激昂奋发，舞蹈风格为之一变。阿克再往里揉进了慢迪斯科动作，现代色彩显得更浓。同样，《江边篝火》中也揉进了西班牙民间舞蹈动作，使“昌都果卓”的风格得到发展。

这时，他的创作思想臻于成熟。“风格指的是人，是随时代而改变的人。民族精神也在发展，民间艺术也在变。有人认为‘越土越好’，这并不对。过分强调‘土’，无异于提倡倒退。民族艺术不是老古董，不是放在博物馆里当陈列品的。民间舞蹈体现一种气质就是主题。”

对学生，他说：“应该从二年级起就排练儿童节目，过去没有条件，现在要列入议事日程了。到四年级时，开初级艺术理论课，讲艺术的产生，不同艺术门类的共同特性，重点讲什么是舞蹈。”

阿克积30多年舞蹈生涯的体验，来创作排练舞蹈节目。但如何让孩子们领会、表现，实在太难了。他说，

“舞蹈教员们强调力度、开度、软度，却忽略了思想情感的训练。小组合动作不光有技巧，更应该包括感情。到排练节目时，还要求丰富性，有主题，有意境，有思想性和情绪要求。但我们的孩子呢？根本谈不上第二创作，他们都跟木头似的，令人头疼……”

他强调了文化课，要求教务处尽早开设文艺理论课。

1988年6月12日晚8时半，拉萨剧院。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丹增同志缓缓踱入观众席。陪同前来的，有自治区文化厅正副厅长及下属各团体负责同志。剧场气氛平添了几分庄重、几分紧张。

舞台上，厚而且重的紫红色帷幕后面，艺术学校的学生们已经做好演出准备。他们即将赴广州和香港参加国际舞蹈节，今天晚上接受自治区主管部门领导的审查。

台上的学生，台下的阿克校长，都仿佛面临成败攸关的一场考试，又激动又紧张。

聚光灯骤然射向前台，场内笑语声嘎然而止。报幕员微笑着站在强光下，演出开始了……

《藏北牧民舞·欢乐的羌塘》——关于那些手执“乌尔朵”身披老羊皮的勇敢牧民获得新生活的生动写照。

这个舞蹈告诉我们：有位老牧民，拥有大批牛羊，过着令人羡慕的富足生活。音乐轰然响起，欢快又热烈，男女演员快速跳上场来，他们浑身洋溢着青春的美，散发出年轻生命的欢乐气息。组舞、群舞，变化多端，令人眼花缭乱。阿克校长紧紧盯着舞台，吹毛求疵地观察着、挑剔着……音乐转入悠扬，老头上场了。他怀抱洁白的小羊羔，手执赶羊的“乌尔朵”，一撮白胡子贴在下巴上。动作夸张，滑稽可爱，赢得阵阵掌声。掌声中，阿克不自觉地骂了一句：“这小子，又错了！”

老头的扮演者，就是在手腕上刻下“改正”二字的那个学生。

《昌都果卓·江边篝火》则给人以另一种审美享受。牧歌情调，傍晚的彩虹直插江心。藏族青年经过一整天劳作，来到江边。此时时光属于他们，爱情属于他们。悠扬的牛角二胡响起来，江风轻拂，原野飘香。他们围着篝火跳起庄重的舞蹈，体味人生的欢娱与幸福。

那位拉牛角二胡的小伙子，漂亮、稳重，引人注目。他就是熟读了《舞蹈编导知识》的门巴族学生。阿克赞赏地注视着他，考虑着他毕业后的去向。他想让他留校当教员。

格桑卓嘎表演女子独舞《牧羊姑娘》。雪山下，草原上，美丽活泼的牧羊女赶着羊群，来到清澈的泉边。她时喜时嗔，若浮云流水般纯洁美好。舞姿轻盈，线条舒展，把牧羊女子的情态表现得维妙维肖。她是素质最好的学生，是阿克校长最钟爱的一个学生。阿克不让她留校，而是分去了歌舞团，使她在舞台实践中锻炼发展。后来，她没有辜负阿克的期望。

接下来，获得满堂喝彩的，还有《热巴舞·欢腾》中的领舞，“空中转”、“满地滚”……的优秀学生。阿克对他们的身体状况、心理素质、发展前途，全都了如指掌。

当演员们退下场去，把观众留给徐徐合拢的幕布时，丹增书记面带微笑，热情鼓掌。审查通过了。

由西藏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民族舞蹈艺术人才，将要到国际舞蹈节上去交流、去碰撞。而参加国际艺术节，在西藏艺术史、艺术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

38年前，荒芜的拉萨河滩上，那个孤独的牧羊少年“等我长大了”的梦中，出现过今天这一幕吗？20年前，在东藏森林峡谷区萌生创作欲望时，想象过今天这一幕吗？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艰难的日子，憧憬过这

一幕吗？艺校创建之初，在八角街倍感烦恼时，预见过这一幕吗？

夜深了，艺术学校也入梦了。年已半百的校长，坐在他陋室一隅的卡垫上，在海一样的漆黑中，老泪纵横。

“88羊城国际舞蹈节”，有来自西班牙、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舞蹈团。

7月14日上午，西藏艺校舞蹈团的演出拉开了帷幕。剧场里座无虚席，英国代表团早早架起了摄像机，广东电视台派来了采访组，演出过程长达105分钟，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粗犷的性格，昂扬的情绪，鲜明的色彩，强烈地吸引了观众，每演完一个节目必须谢幕多次。场内不时进出几声“nice！”“wonderful！”的赞美。

演出刚刚结束，阿克团长就被层层包围起来。广东省舞蹈界的知名人士纷纷上台握手、合影，祝贺演出成功。文艺团体的专家同行也主动向阿克团长谈了观后感。英国代表团摄像人员特意挤过来，乐滋滋地表示：太感染人啦！

当晚是向广州观众公演，票早在几天前已全部售完。广东电视台记者上午看了演出便决定直播晚场。演出结

束，不少观众守候在剧场门口，包围了卸装出来的演员，一位观众爽快地说：“我20多年没看到西藏的节目了，真高兴呀！”

在广州，西藏艺校舞蹈团获得一面锦旗，上书“誉满羊城”四个大字。

香港演艺学院。

第三届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在这儿举行。西藏舞蹈专场安排在7月20日晚，与英国、加拿大代表团同台献艺。

9时15分，西藏舞蹈团上场。

随着一阵别开生面的藏戏锣鼓，帷幕徐徐拉开。5位身穿华丽藏戏服装、头戴白面具的男演员，踏着急促的鼓点入场，剧场内鸦雀无声。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整个演出过程，观众始终随着音乐节奏一齐击掌，气氛炽烈。

7月22日晚，舞蹈节闭幕，各团联合演出。上半场的压轴节目定了西藏的《热巴舞·欢腾》。满堂喝彩，人声鼎沸。人们评价：这是上半场最精彩的节目。

闭幕演出计划，是以各国演出团上台与台北艺术学院50多人同跳一个民间舞结束。出乎意料，台湾民间

舞刚刚表演完，西藏演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带头跳起了西藏民间舞“果谐”。在热情奔放的击节呼喊声中，各国艺术家一呼百应，手拉手围成了几个大圆圈，形成一个热烈欢跃的巨大场面。原在台下的演员，也情不自禁跃上舞台，参与这沸腾的场面。

西藏“果谐”，为第三届国际舞蹈学院舞蹈节压了轴。香港演艺界到处传说：西藏震了！

阿克校长心潮起伏，心里洋溢着一种深沉的民族情感。这强烈的情感在后来1991年5月23日又体验了一次，那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李铁映率中央代表团视察艺术学校。舞蹈班三年级学生——圣火少女达娃央宗向李铁映同志敬献鲜花。他当天写下了：“……神圣的火炬在西藏圣洁少女手中点燃时，它烧掉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耻辱，重新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崭新的形象……”

阿旺克村，历任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舞协主席；连任三届中国舞协常务理事；中国舞蹈家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会理事；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音乐审查委员。

他还兼任承担过国家“八五”计划三项重点科研项

目：

《中华舞蹈通史》编辑部聘他为《中华舞蹈通史·图
录卷》民族舞蹈编辑专家；

国家教委聘他为音乐学科审查委员；

国家民委聘他为《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撰稿专家。

《中国艺术家辞典》、《当代中华名人录》、《中国当
代艺术界名人录》收入了他的生平及事迹。他还荣获首
届“珠穆朗玛文学艺术奖”。

本文原载《芙蓉》1994年1期，内容经改动后，
以《雪域舞坛泰斗——记西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阿旺克
村》为标题刊登在《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4期）

5 引 子

与西藏结缘的汉族大学生

龚巧明，毕业于四川大学，是才气横溢的女作家。
1982年春天她沿川藏公路进藏工作，1985年秋
在这条路上遇难。

长眠在拉萨烈士陵园里的龚巧明，才思喷涌的灵魂
得到了安息。

进藏工作过的内地大学生成千上万，情况千差万别。获奖电视剧《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的编剧因车祸致残，这里有一个揪心的故事。

坟上飘 哈达

——记长眠在拉萨烈士陵园里的龚巧明

龚巧明是川中才女，在四川大学念书时曾名噪一时，不知道可否称她为“学生领袖”。整个八十年代，确乎有许许多多“学生领袖”，如雨后春笋，而笋终究要成长为竹，“领袖”的地位常常随着学生生活的结束而结束。而龚巧明是不朽的，正如有人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却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活着”。龚巧明永存在那一代文学青年心里。她的品位不是用“学生领袖”一词可以概括的。

我与龚巧明认识是在读大学期间。她在川大中文系七七级，我在西师中文系七八级。我从在川大经济系念书的妹妹那里听说了她，在川大学生心目中，龚巧明享有极高的威望，我妹妹谈起她时，语气中充满了崇敬，这是因为她的胸襟、境界、气度、才华和组织能力，还

有教养程度。她和一班同样有才气的同学办了一份刊物叫《锦江》，四川的青年学生们提到这份刊物大多都很喜欢，因为它是学生自己的刊物。我们西师的学生想自己办刊物，鼓捣了几年，还集了资，最终泡了汤。

我给《锦江》寄去了两份小说稿，龚巧明很快就回了信，说其中一篇将采用，语气的亲切平等让人非常感动，就是从那时起，她进入了我的心，成为我心底永远不会消融的影子。我相信，她用同样的方式征服了无数人的心。

那年暑假我去了成都，在她的寝室里见到了她。她瘦高个，面容清俊，戴着眼镜，聪慧而有教养。寝室里有好些人，说些什么已记不清，只有她说的一句话长久在耳边萦绕：“每出一期《锦江》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便自告奋勇去为她们卖刊物。这是我第一次当卖家，很不好意思，见人就低着头。和我同路的一个男生把十来本刊物拿过去，见人就凑上去，“买本吧，学生办的，内容活跃，很便宜。”当时就卖掉好几本。每本二毛五还是三毛记不得了。

好景不长，龚巧明来信说《锦江》被勒令停办，我投去的又一篇千字小说，已排版，可惜了。她说那是一

篇真正的小说，她的来信通篇没有激烈的言辞，淡淡的，只有几许忧伤。我也就消弭了激烈的言词。

龚巧明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她曾对我说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要想有所作为，要入党比不入党更难。她是一个真诚、正直、热情、积极的人，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以忘我的热情投身于实现理想的奋斗之中，既然人世感极强，渴望有所作为，又有坚定的认识，为什么不入党？问她，回答说：党不要我。

就在这种矛盾之中，她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编辑出版文学杂志，团结大批业余作者，深入生活、勤奋写作，一边却因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惹出好些麻烦。例如在大学期间写下的小说《长长国境线》，就遭到过来自上面的点名批评。《长长国境线》写的是中苏两国边境线上的卫兵各尽其职又和睦相处的一种情景。此后不久，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公布了两国边防军和睦相处的事实。在拉萨，她倾注了极大心血写下一篇报告文学，歌颂了一位农学家献身西藏农业的事迹，写得血肉丰满，很感动人，却招致农学界的普遍批评，上级领导中也有不好的印象，为此她有作不完的自我批评和写不完的检查。分析起来，其中一大原因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

不久，许多人不接受她所取的角度和她的写法，不能容忍她探求英雄人物的内心和情感世界。其实那只是她的文学探索，力求在人性和情感世界里有所突破，这只是新时期文学那一道道巨浪前面的一朵小浪花。数年后，文坛上推出了《白鹿原》、《废都》、《丰乳肥臀》这样的巨著，再回忆当年许多人对龚巧明的苛求，令人不寒而栗。由于她的无私和她惹起的麻烦，龚巧明很出名。无论人家爱她还是恨她，她都坦然处之，反正她当惯了名人，她有干不完的事，无暇顾及其他。

一九八二年五月，龚巧明大学毕业，她选择了去西藏，乘车沿川藏线进去的，沿途写了好些优美的充满激情的散文，激动了她的朋友们的心。可惜这些文章我一篇也没有读到，但我的心是随她去了。

秋天我也毕业了。那一届毕业生为名额分配竞争激烈，几乎发生流血事件。我的去向几经反复，很不如意。我茫茫然不知该去何方，该干何事，迷惘中想到了龚巧明，何不也去西藏？就这样我追随龚巧明到了拉萨。

龚巧明永远也不会知道我的进藏与她何干，我没有告诉过她，永远也不可能告诉她了。留在心里的最真诚的那些话，没必要也不可能挂在嘴上。

已经不记得到拉萨后第一次见龚巧明的景况了，但是第一次交稿后的情况倒很清楚，她满面喜色地告诉我说，栏目编辑如何欣赏这篇稿，主编如何注意到这篇稿，那情景倒好像稿子是她写的。

但是第二篇稿就没这么运气。龚巧明就不满意，叫我改，改，改，一直改到第七稿。每一稿她都仔细看，直看得她告诉我她的感觉全没了，又换个人看，终于通过。这篇稿发表后寄给一个同学，被他批驳得体无完肤，我猜测也许是编辑们为了安慰我才发表的，倒有几分不安。

正如一位朋友评论的：龚巧明总是兴致勃勃地去干一些对她自己毫无好处的事。例如，一位文学新人的稿子因为字迹潦草，龚巧明竟然一篇接一篇地誊抄清楚。在她看稿量最大、工作最繁重的一段时间，常常夜里吐血。她遵循着她心中的规律，那规律并不为她自己的利益所左右。正因此她显得那么高大。

那一时期，西藏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西藏文学》所发表的作品不断被《小说月报》等权威性刊物选登。后来有人评论说，西藏文学界的繁荣与龚巧明是分不开的。作为文学编辑，能耕耘出一片

文学的沃土，应该是最大的满足与骄傲。

龚巧明是一个可爱的女性。除了一般女性所具有的美丽、善良、温柔等特点外，她还特别善解人意，不少男人都说，只有龚巧明能理解他。许多男人被她所吸引，勇敢的会向她表白。当时她又是离婚独居，由此惹起的麻烦也不少。后来她复婚了。

在拉萨，我和她经常见面，为了文学也为了在拉萨的种种感受，为了心里涌出来的那些东西。后来，龚巧明内心尖锐的矛盾逐渐外化，她反常地失去了沉静。这就是她调去新闻单位当记者的前后。

杰出的女人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易为旁人懂得，龚巧明左冲右突，难以解脱，最后决定逃离文学，改当记者。我最后一次碰到她，是在拉萨幸福路大街上，当时我刚从内地休假回来，我们已好久不见。她穿着一条红花长裙——在拉萨，她是第一个穿裙子走在大街上的女人——又苗条又漂亮。她喜欢叫我“小朋友”。寒暄之后，她接连说了几句“文学没得搞头，”闷闷不乐。

她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去藏东南采访。就在回来的路上，不幸出了车祸。车翻到尼洋河里，她被河水冲到下游数十公里外，几天后才找到她。

后来再见到她，就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太平间了。

那天，在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太平间外，许多人等待着龚巧明。男同志红着眼眶，他们都铁青着脸，女同志啜泣着。也有脸冲着墙哭出声来的。很少有人说话。卡车载着龚巧明回来了。为她梳洗换装，大家都很认真。梳洗时谁也没哭。芳魂飘然远去，她却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擦洗她脸上身上那青肿瘀血的伤处，涤净头发里的砂子，抹上发乳。龚巧明很安详，任我们摆布，那情景就象一群美容师，围着一位年青姑娘，为了她的幸福，尽力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

“她是憋死的而不是淹死的。”一位懂得人体的朋友说。“她拼命控制呼吸以求生存，血管都呈青紫色，嘴唇发乌，但腹腔里没进一点水。她多顽强啊！”

灵堂布置得很美。拉萨正是开花的季节，以黄白二色的单瓣菊花为主，间以各色鲜花，龚巧明就在花丛中熟睡，四周挽联飘逸。

龚巧明憩息在拉萨烈士陵园里，享受高原的温暖阳光，沐浴极地的夕晖朝霞。她用汗水浇灌过边疆的土地，又以鲜血和生命滋润了长长国境线。

年年清明节，坟前都供着香甜的青稞酒，坟头上挂

着洁白如云的哈达。龚巧明是殉道者，充满着献身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那肯定会焚化了自己的熔炉。这样圣洁的殉道者现在还有吗？

龚巧明的无私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了小群体利益，甚至不是为了某种排他的信仰。那是为了属于全人类、广大无垠、无所不包的文化事业。

龚巧明为了文学而被误解、被伤害，那伤口太深。她悲伤地遁入新闻去求得平衡，然而平衡并不是通过空间移位来完成——她献出了生命，留下了永恒。

永恒的不是她的作品，她尚未来得及留下成熟而恢宏的作品。永恒的，是她为了文学作出的奉献和牺牲，这是做人的境界和品位。

没有一大批龚巧明式的文学编辑，不可能有文学的繁荣。

如果生命出现塌方

——关于《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的编剧张鲁

张鲁的名字对于西藏朋友来说并不陌生。扎西达娃的小说《巴桑和她的弟妹们》被改编搬上荧屏，获得飞

天奖单本剧一等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西藏日报》曾用整版篇幅展开争鸣，那时，就有不少西藏朋友熟知了张鲁这个名字。

张鲁和我曾是同班同学。

1987年春天，他因车祸致残。也许死神认为他阳寿未尽，重伤后居然活了过来。然而因脊椎受损，高位截瘫，只能终日坐在轮椅上。

人生莫测，旦夕祸福。

在大学读书时，张鲁显出几分神秘。首先，在众多以知识青年身份考入大学的同学中，他是一名老练的记者；其次，有人传说他的家庭如何有权势、女友如何漂亮。他闻后不置可否，不笑亦不怒，涵养极好。偶然一次，淡淡地说：“父亲不过一般干部而已”；第三，他智力过人，若有心考好某门功课，那么这门课最高分非他莫属，正象后来竞选学生会主席一举中的。同学们老觉与他隔着一段，亲热不起来。一晃四年过去，握别离校，他在给我的临别赠言中写道：“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后来听说不断有电视剧问世，不断获奖。

他受伤后，许多人出于关切和同情，准备前去探视，又纷纷被护理者挡驾，说“需要静养”，颇为神秘。以致

引起种种猜测。

张鲁自己说，目前已进入康复阶段，情况正常。常在黄昏后独自将轮椅推到院坝里，看半个夕阳，一抹晚霞，蜻蜓点水，风吹树动。呆呆的，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几位老人怜惜他，劝勉些坚强勇敢之类言语，他谢谢人家好意，再呆呆地看那下坠的残阳。老人们则看他，也呆呆地，都觉得他古怪而且神秘。

其实张鲁的神秘感不过来自他的从不废话。

那时张鲁体格强健，常在清晨六时起床跑步，从本校宿舍起跑到另一所学校大门前，往返达五公里。他还练拳击，弹跳灵活，出拳迅猛。篮球场上也少不了他的身影。

瞬息间，一切都留在记忆中。

我去医院探视，他躺在隔离室里，身边围了一圈医护人员，输液瓶高挂。颈部切开插入一根胶管直通肺部，呼吸困难。两个护士正在他胸前忙着些什么，她们的动作使他痛苦。尽管这样，他还是隔着玻璃门冲我眨眨眼，眼神里竟传达出一层幽默：你看我这副尊容！

很少有人会设想：假如有一天早晨醒来，发觉双腿没有了，永远不能行走，永远要靠别人代为料理生活，

自己将与一个可怕的字眼“残疾人”相联系，那该怎么办？

尤其，假如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生龙活虎的人？！

张鲁决不轻易流露他的痛苦。他只有两种选择：死亡，或活得比从前更好。前者很容易，瞬间便可完成，后者很艰难，艰难到不知何处是起点。

那时他正濒临第四次生命垂危。肺部充血，从颈部插入一根管子吸出血水，靠输气输液维持生命。几个老太婆打听他的病情后，议论说：这孩子，不死不活的，也不指望能治好，还不如死了呢！一位朋友听见，将这话转告他（足见这位朋友知他之深），并发表见解说：要是死了，就没有了；活着总还存在着啊。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给了他极深的印象。是啊，不能随便掐断这存在啊！

危险期刚过，迎来35岁生日。往年生日，妻子总会买来一堆好吃的，兴高彩烈为他贺寿。今年不同以往，谁也没那份心情，都避免提及这事。不提不等于不想。景况越发惨淡，生日便成了心头的沉重负担。生日终于来了，妻子清早便出门去，什么也没说。张鲁惦记着，躺在床上，眼睛老在往门边溜。中午时分，她回来了，

跟往年一样，抱回一堆好吃的，摆了满桌。全家人围拢来就吃，说说笑笑，气氛热烈。谁也不提生日、不提病情，只是吃喝说笑，深情尽蕴于不言之中。张鲁的灵魂为之震动。要是死了，将愧对妻子，愧对家人，将使他们为他作出的种种努力和牺牲付之东流，那是死了也得不到安宁的！

离死亡远了一步，活下去的愿望更充实了一分。张鲁说，没有这许多朋友对他的牵肠挂肚，没有妻子的慰藉与支持，也许世上早已没有他了。能够活下来，实在是基于一种最实惠的打算，为了答谢妻、友的深情。

然而，每天早上醒来，不知该干什么。确切地说，不知该想什么。白色房间，白色大褂，露着职业性微笑的面孔。除了清醒而活跃的思维和必须忍受的病痛，一切都停止了。翻身，要靠护士帮忙，茶杯就在眼前，也要护士帮忙。窗外艳阳诱人，却令人发狂。只有夜夜好梦，巴不得留在梦中永远不醒。

后来他决定首先摆脱输液瓶。活下去的起点是吃好，吃，多吃，人是铁，饭是钢。

可是，肺活量降低大半，咀嚼几下便喘不过气来。颈部疼痛妨碍下咽。从来没感到吃饭也会这么艰难。他

把多进食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吃吃歇歇，一家人轮流喂，保质保量。这样，张鲁从死亡的阴影下挣扎出来，离开绝望的低谷，生命开始回升。

他曾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到过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在那五色斑斓的回忆里，有一片线条粗犷、赭黄与铁灰相错杂的色块，即西藏广袤的原野留给他的深刻印象。1985年秋，他和《巴桑和她的弟妹们》电视剧摄制组来到拉萨，洒下辛勤的汗水，还访问过日喀则珠峰和樟木口岸，结交了不少藏族朋友，其中一部分到今天还保持着联系。

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相交替的地方，那片阴影地带，张鲁身处白色静谧中时，谁也不知道他曾想过些什么。谁也无法猜测，他回忆过一些什么样的成功的欢乐与失败的抑郁。但我能肯定，他脑海里浮现过西藏的原野与诚挚的藏族朋友，青稞酒与甜茶，糌粑与土巴，因为每一个到过西藏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些。

妻子历尽千辛万苦，找遍东北三省各个角落，终于在内蒙古找到了气功大师严新。多亏神奇的气功，张鲁的腿虽还不能支撑身体，但也没萎缩腐坏，也就还有重新站立希望——张鲁准备为这希望付出平生最大的努

力。

严新教张鲁“人静”。

顾名思义，“人静”就是克服情绪躁动，使身心宁静，进入“神游”的境界。

战胜情绪干扰，对于一个终日困卧在床的人来说，几乎和战胜死亡同样困难。

张鲁说：“有一年多，我无法人静。大脑清醒而活跃，思潮汹涌，畅游于无极，却身不由己，在平躺和斜躺中去回忆，去想象，去思考……不定时的靠别人帮忙翻身，来打断蓬蓬勃勃的思维……正常人每天有很多活动，闲下来，如果烦闷了，可以散散步，找人聊天，饮酒下棋，听音乐打麻将，我呢？”停顿。

插入一段题外话，凡是从头至尾看过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人，都会记得霍元甲被强迫注射吗啡后，要想戒掉毒瘾时的惨状。那失态的摔跌狂叫，使观众目不忍睹。大陆作家还没有敢这样去描写英雄人物的。

张鲁的停顿使人难堪。似乎为了绕开他曾有过的一次失态，一桩令他懊恼不已的事件。他的脸略为涨红，嗓音也激动了（这之前一直使用叙述语调）。“我只能躺在床上，任何活动，任何动作都没有，只有各种情绪的

侵扰。在灰暗的思绪中孤身奋战去排除它们。”

他坐在轮椅上，弯腰去搬动左腿。左腿象演戏用的道具安装在他的腰上，不听使唤。这个动作刺痛我的心，不由联想起他从前晨起长跑时健壮灵活的双腿。这个对比那么残酷，使你猛然间明白了“伤残”这个现实，意识到他所忍受的痛苦，提醒你他已不同于活跃在摄制组里的张鲁。从心底里涌上一阵深切的同情，而这同情又恰恰是他拒绝接受的！

“……有一年多，我完全不能入静。朋友送来书籍，其中有老子《道德经》。我从头至尾抄这本书，一遍，又一遍，有一天，发现自己的字写得很好了，与受伤前比判若两人。”余下的话不须再说，在练字过程中获得宁静，战胜情绪困扰这一战役已基本胜利。

“有一天，来了一个朋友，他也被疾病困扰，准备来和我谈他如何与疾病作斗争。走到窗外，他听见了歌声，悠悠然自得其乐的歌声。唱完又吹口哨。他伫立窗外，不相信是我在唱。我完全理解他所遭受的病痛，一笑，但不发表意见。经过自己的痛苦能更深地体会别人的痛苦，但不要谈论它。诉说的过程就是淡化的过程，表达出来的苦难淡而无味。真正的痛苦是无法表白的。”

张鲁流露出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凝视的目光总显得高傲，因为他总是胜利者。

现在他生活得很愉快。今年，他编剧由陕西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悬崖百合》又获飞天奖连续剧银质奖，并被法国一家公司购买了版权。张鲁使一度萎顿的生命重放光辉，他用自身实践证明，伤残之后仍然能昂首挺立于世，显示存在的价值。

某个雨夜，我贸然拜访张鲁，目的是要征求他的同意，接受记者采访。

他笑笑。“我看还是算了吧。有什么值得写的？再说我不习惯接受采访。当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一时空气僵住。

我慢慢说，人生之不幸就好象生命的轨道出了问题，比如说，生命塌了方，这个人剩下的时间就是与病魔斗争，苟延残喘，再没其他价值了。而你，能顺利通过塌方区，依然按原来的轨道前进，依然显示自己的创造力。这种勇气和能力具有社会价值。

他沉默。突然问：“你为什么写？与其来一个不认识的记者，不如你来写，更自然些。”

我沉默，决定了由自己来完成。

后来他表示，希望能在遥远的刊物上发表。

那自然是西藏了。

由此有了这篇稿子并将它寄往遥远的拉萨。

（原载于西藏《主人》杂志，1991年第5期）

6 引 子

雪域高原静穆中的反思

有人失去过家乡么？或者，有人在寻找家乡？

我就是。

走过西藏那些路，是为了永无定所的飘泊感，是为了颠踬劳顿的心灵渴望家园，渴望那低徊着牧歌——和谐优美曲调的精神家园。

故事中的罗竹生，刑满以后，在改革开放第一道潮水涨起时，率先致富，成为全县第一家“万元户”。

不可思议的是，使我终于成为作家的最初激励，来自于一个“监外执行”的犯人——为摆脱他那悲惨的处境，为他自己设立的远大目标……

何处是家乡

物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精神和意识徒然挣扎于其中。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顺应、不断反抗的痛苦过程。

谁能逃避这痛苦？！

除非去到另一个世界。

我坐在西藏高原上暂时属于我的陋室里，不断涌起在心里、出现在梦中的，是嘉陵江畔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辛酸的回忆。

“妈妈，那儿有田鼠吗？”

“有啊，很多。”

“它们穿天鹅绒礼服吗？”

“嗯，它们的皮毛就跟天鹅绒一样。”

“它们都是瞎子吗？”

“对，田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你得记住，他们这儿不叫田鼠，叫山耗儿。”

“山耗儿？”

“是啊。要是你老说田鼠田鼠，人家就会盯着你，好象你是个怪物。”

我闭上嘴，却没能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拇指姑娘呢？”

“拇指姑娘是童话里的小姑娘。可是你看，这儿不是童话。”

我看看周围的陌生世界。山坡、黄土，种满绿油油的玉米。山洼里梯田层层，早稻正吐穗。我熟悉童话世界，却对面前的一切感到新奇。转脸看看妈妈，妈妈没穿我看惯的浅灰西装裙，换了一件农村妇女穿的蓝花布大襟衫。

“妈妈，你这件衣服好看。”

妈妈低头看看自己的花衣服，笑了。

“妈妈笑起来真好看。”

“世界上就数你话多！”妈妈瞪我一眼。

阳光斜射过来，草地和水沟上移动着两条影子，弯弯扭扭，妈妈的影子比我长一倍，我的影子常跟她的重迭起来，好象我隐入她的身体里去了似的。

我忍不住咯咯笑了。

爸爸饿死的那个上午，我也这样笑过，还边笑边蹦蹦跳着去追在地上觅食的小鸟。

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就象早晨的太阳，美好，愉快，

轻松；甚至，还有点儿滑稽。

我觉得妈妈是世界上最年轻漂亮的妈妈。

妈妈尽力打扮我。黄头发编成的辫梢上打着两个鲜红的大蝴蝶结，粉红连衫裙的领部和胸部有薄如蝉翼的皱纱边，脖子上还有一串琥珀项链。

妈妈提着一口精致的皮箱，另一只手牵着我。

“妈妈，到了吗？”

“到了。你看，我们的新家就在这里。”

公路一个急弯向左拐去，前面展现出两山夹峙的一个大山沟。山沟越向下越开阔，一直伸展到碧绿的嘉陵江边。梯田，真象梯子似的，一级级降下去，我想象自己踩着高跷，迈开其长无比的两条腿，从这些梯子上踩过，然后，一步跨过嘉陵江，看看对岸积木搭成般的小房子里都住着些什么人。

两边山坡上，一点缝隙也没有，长满了玉米，密密麻麻，黑油油，象片大森林。

“妈妈你看，那儿有条小河！”我高兴极了，清澈的小溪在石缝里汨汨流淌，一滴滴水珠闪耀着阳光，又神秘，又美丽。我从小喜欢玩水，喜欢喝水，连吃饭也爱喝稀的。妈妈说我“看见水就不要命”——这时我还不

可能预料到，往后的日子，吃饭只有稀的喝，直到二十多年过去，才能在想吃干饭的时候有干饭吃。

田畴溪流之中，点缀着三五成群的泥墙瓦舍，组成一个个小院落。

有一架水车，足足让我看了五分钟。

“妈妈，这就是……新家吗？”

我已经有过许多次新家。在我出世前三个月，父亲被开除党籍，我们就一直搬来搬去。一年前父亲去世，我和妈妈住进一个集体性质的小裁缝铺给人家守房子，好处是不交房租。

突然，一只约有七八十斤重的黑猪四蹄腾空，从小溪边向上冲来，边跑边滴水。

我“哇”地一声扑到妈妈怀里，妈妈紧紧搂住我。

黑猪窜过我们身边，洒落满地水珠。我和妈妈退到路边小沟里，幸而沟里没水。跟着黑猪跑上来个小男孩。赤膊、光腿、两片脚丫子乌黑，小裤衩颜色近乎土灰。他看见我们便呆住，眨巴眼睛，啃咬肮脏的手指头。

“小珂，别怕，”妈妈轻声说。

我把头从妈妈怀里转开，看着那小男孩。我对他的惊奇并不亚于他对我的惊奇。

“小珂，这是缸子，他是你的小朋友。”

我盯着缸子，他咬着指头往后退，一点也没有要跟我交朋友的意思。最后，他一扭身，追赶黑猪去了。

我和妈妈跟在张叔叔身后，沿山沟朝下走。张叔叔打着赤脚，乌黑的脚后跟裂着泛白的大口子。我们住在小裁缝铺里时，他每次到我家来，都带着新鲜蔬菜。

山沟底部有座小院落，住着四户人家。

小瓦房，低矮狭窄，门朝西开，门口是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晒坝。小晒坝边上是个小猪圈，行人来往都从猪圈的粪坑边经过。

“妈妈，那是什么？”我指着粪坑。那里蠕动着许多白色的虫，又肥又软。

“别多嘴！”妈妈拍拍我的头。

张叔叔对妈妈说：“这房子木料多结实，根本没有白蚁。我想两年后再盖这么一间……小晒坝多好，晒粮食不用跟别人伙用……”

他用骨节粗大、皮肤糙裂的手从一只提包里往外掏糖果。妈妈抓起糖果逐一递给围在门口的小孩。我注意到缸子也在孩子群中，他身边是一个肤色黑黑的胖脸蛋女孩。

“爸爸。”我低低地叫，没敢抬眼。知道妈妈正用爱怜的目光注视我，“爸爸”也正用发窘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光脚指头。

这个词我好久没用了。爸爸的位置早已从生活中消失，他的面容也早已在记忆中模糊。当这个词重又从嘴唇间怯生生地蹦出来，我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我和他，和这间小瓦房，这个山沟以及溪流、玉米、稻穗等，发生了一种密切的联系。一切陌生新奇的东西，现在有了支配它们的权利，可以用主人的、占有的目光来打量它们。

门外的小猪圈和小晒坝，屋里的桌子、凳子、屋角的锄头扁担以及那一对洗得油光锃亮、一点也不臭的粪桶，顿时活了起来，非常亲切。

要是我想摸摸这些东西，或者，拿起锄头去挖土，没人干涉，甚至不用妈妈许可吧？

我真兴奋啊！

我看看“爸爸”——张叔叔，也有更为新奇的感觉涌起来：我交给了他一种权利，让他来干涉我、保护我，将自己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正因为这一切，使得这个词的出现，成了一件很严

重、很复杂、很别扭的事情。幸亏我适应得极快，半天过去，再叫“爸爸”已经相当流利自然，还带着毫不做作的亲切意味。

我和这块土地的联系建立起来了。我把它叫做家乡，因为我是个没有家乡的人。

这天晚上，我被一阵低低的说话声惊醒。睁开眼来，妈妈不在屋里，只有豆大的小油灯摇曳着，在烟熏火燎的土墙上，映出许多妖怪。

爸爸和一位山羊胡子老头正促膝而谈。老头叼着一根长得吓人的烟管，上头坠一个沉甸甸大烟袋，不时“叭”地往地上吐泡口水。

“……扫盲班的老师也真怪，”老头说。“明明是一个字，她偏要压成两个字来念。花——依呀花！”

我在被窝里差点放声大笑，因为我知道他拼错了，应该是“花—— h—— ua—— 花。”

“……我们都跟老师开玩笑。花——鸡呀巴！”

爸爸低沉地附和着，笑笑。他心事重重。

老头闷声吸烟，过了一阵才说：“我看嘛，是合算的，她马上去村小当老师，每个月有工资。这小丫头，又不是儿子，再过十年就可以出嫁，不会跟你的儿子争家产。

我是说将来你有个一男半女的话。”

我懵懵地听着，突然明白过来：他们是在说我呢！“小丫头再过十年就可以出嫁……”我十七岁就得出嫁吗？嫁给谁呢？国王和王子都不会要我，要是有个仙女来帮助我就好了。

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继父不是本地人。

一九二九年，嘉陵江下游局部地区遭旱灾，粮食欠收，他的父亲死在饥荒中。母亲还算精壮，带着四个小孩——最大的九岁，最小的还在吃奶——去求地主允许他们继续种地。

五口之家，孤儿寡母，缺少男劳力。地主摇摇头，告诉她说，要收押佃，收回土地另租别人。

年仅四岁的继父，睁大幼稚而惊恐的双眼，看着帐房先生把家中的破铜烂铁一件件往外扔，母亲跪在地上，呼天抢地，磕头流血：全家被扫地出门了。

逃荒路上，他和两个哥哥光着屁股躲在别人家成熟待收割的稻田边，捋下一串稻穗，搓出米来，用小瓦罐煨熟……

他想念小妹妹。还在吃奶，就送给一家中农做童养

媳，比几个哥哥更可怜。

他们终于在这个山沟里落脚。母亲给人当女仆，大哥去小煤窑当童工，二哥在数里外给地主干杂活，他给地主放牛。

晚上跟牛一起睡，冬天贴在牛肚子上。有人在冬天叫“冷得很”，他便开玩笑说：“你钻进牛屁眼里去吧。”

但是有个晚上拉肚子，连爬起来四五次，早晨双目深陷，眼光发花，还得赶牛上坡，控制不住，拉在裤裆里了。

他偷偷脱下裤衩，光着身子，去水田边洗干净——已经懂得害羞，生怕被人看见。下午，裤衩半干时，套在屁股上。

这天夜里，独自跟牛在一起，他吐了一滩绿水，烧得迷迷糊糊，肚泻却基本止住了。

忆苦思甜时，工作组叫他“倒苦水”。他结结巴巴讲了一气，回家来，在妈妈身边呜呜咽咽直哭到半夜。他说，再也不上台去讲这些了，这是要他挖出疮疤来给人看啊，真不愿意。

从玫瑰色的童年梦幻中惊起，第一次感到外部世界的强大和居心叵测，感到自己那么弱小无助，是来到“新

家”的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家的小凳子不见了。

“是谁顺手端去开会了吧？”妈妈猜想。“小珂，去会场上找找。”

我非常害怕，但只得硬起头皮。

会场上人很多，妇女们都带着针线活，“刷刷”地从鞋底板上抽麻绳。男人们呆着脸抽烟。许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人群中乱钻。

我盯着一个男孩，他不会小于十二岁，正趴在母亲裸露的胸膛上，叼着长长的、干瘪难看的奶头吸吮。

他们当中没人穿裙子，连小姑娘也不穿。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在这里，妇女穿裙子会被人嘲骂为“降落伞队长。”

有个小姑娘扎着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蝴蝶结。

他们也都盯着我看。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瘦得脖子上青筋往上蹦，眼眶周围全是稀糊糊的眼屎，神情古怪，盯着我不转眼。

是的，我太特殊了。衣服崭新得发亮，洁白得耀眼；皮肤，在一片蜡黄粗糙之中也别具一格。真恨不得能有个地缝让我钻进去。

最糟糕的是，我们家的小凳子就在那老头的瘦屁股底下。

我站在那儿咬指头。尴尬，屈辱，为自己的胆怯而羞耻。鼓了几次勇气，都没敢跨上前去，只想朝后退，想逃跑。

突然有个希望象浓雾中的灯光鼓舞了我：要是这老头不象表面上那么恶毒呢？“人不可貌相”嘛。我终于向前跨出一步，一心巴望他的态度跟外表成反比，和蔼可亲地把凳子还给我。

“这是我的凳子。”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可是他听见了。

“你的凳子？”糊满眼屎的眼睛瞪着我，凶巴巴的。
“这是张老么地坝的凳子，想说成你的？”

我一步步往后退，恐惧和难堪窒息得心都不跳了。周围有那么多眼睛盯着，能想象出这些眼神全是讥讽的、幸灾乐祸的，就象从前在大学校园里碰到的那些眼光，使人芒刺在背。

“你们看吧，嘲笑吧，”我慢慢往后退，直退到大晒坝转角处，谁也看不见我了，才捂住嘴，“呜——呜——”地哭起来。

一俟自制力恢复，便急忙擦掉眼泪。眼睛的红肿瞒不过妈妈，要是妈妈知道我这么无能，会伤心的。所以我在田埂上转来转去，假装采集野菊花，呆了好久。

回到坝子里，禁不住又惊又喜：小凳子已经回来了，它就在地坝边上放着。

“你？”妈妈看着我。“刚才人家自己把凳子送来了。”

我走到厨房里，假装要喝水。刚从水缸里舀出一瓢凉水，又听见妈妈叫“小珂！”

我咕咚咕咚喝下几口水，跑出来。

“小珂，你去小商店买一斤盐，半斤酱油。妈妈没空。”

我还没从“凳子事件”的屈辱里恢复过来，心里老大不愿意。这不情愿全从眼睛里露出来。

“你已经是小孩子了。妈妈忙不过来，你应该帮帮忙。”她搁下切猪草的刀，去衣袋里掏钱，手上的细密皱纹里全是草汁染成的黑色。

我接过钱和小篮子，一步一迟延，往那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代销店走去。

实在不想去。我在路边蹲下来，干脆坐到石头上。

来来往往的人都用那种眼光盯着我，那是永远也不能从记忆中抹去的眼屎老头的眼光。而过了近二十年后，不知不觉地，我也习惯于用这种眼光去看待我所不了解的人了。

恐惧心理主宰了我——这些人是我不能理解的、另一个世界的奇怪生物。他们随时可能侮辱或殴打我。

决定对妈妈撒谎。

“酱油卖光了。”我说。

“那么盐呢？”妈妈看着我，洞察一切的眼神里全是责备。

忘了还要买盐！无言可对。

妈妈的表情严肃得让我害怕。

“小珂，脚并拢，立正，站好。”

我极力忍住嘴不往两边瘪，蹭到妈妈面前，站端正了，看着脚尖。

“你撒谎。对妈妈说，是不是？”

我仍然看着鞋尖。

“告诉妈妈，以后不再撒谎了。”

“是。”我抬起眼睛，与她的目光正视。

妈妈满意了。“做人应该光明磊落，襟怀坦白，重复

一遍。”

“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嗓音是坚定的，充满了自信。

“好吧，这猪草等着你爸爸回来切，”妈妈在围裙上擦着手，“我们去商店。”

也许，这次挨训并不是挨过的训斥中最重要的，但是，直至今日，对待重大问题，我从来没有撒过谎，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如果恐惧心理依靠一两次谈话就能克服，那世界上真不知会增加多少欢乐。

春天的葫豆地，万物欣欣向荣。每两行葫豆棵之间，有着三尺多宽的空隙。这空隙，冬天用踩撬翻松，春阳晒软松松的肥土，野菜便绿油油、蓬蓬勃勃，争先恐后地往上长。

我背着一个小竹背篋，蹲在葫豆地里打猪草。鹅儿肠、苦菜花、空笼菜、清明菜。我非常仔细，一棵棵连根拔出，再轻轻拈到背篋里。

隔着半块地，不时冒出两个小男孩的头，他们背着的竹背篋也一冒一冒。

我尽力低下头，缩着身子，不让他们看见我。他们

一定又粗野又凶狠，使人畏惧。

一阵尖细的童音飘过来，是他们在唱山歌，一唱一笑。我尖起耳朵，想从这优美的形式里找到同样优美的内容。

“白鹤的脚杆——”

“——又细又白哟！”

“公鸡的衣裳——”

“——又红又绿哟！”

“叽叽雀的嗓门——”

“又尖又细哟！”

“那妹崽打猪草——”

“又少又慢哟！”

接着传来小男孩压住的笑声。

我吓得连气也不敢出，缩在葫豆棵底下一动不动。千万别让他们过来，我暗暗祈求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他们过来。

又有声音传来了。

“老头是反革命哟！姆妈是坏分子哟！”

我慢慢挪动身子，准备悄悄退走。两个男孩似乎在吵架。年纪与我相仿的那个孩子，我已经认出他就是赶

黑猪的缸子，正在叱骂他的弟弟，叽哩咕噜，听不清楚，声调却很气愤。

我受不住，拖着竹背篋，里边只有垫底那么一点猪草，顺着葫豆棵，连走带爬，外部世界呈露着神秘而阴险的嘴脸，让我不寒而栗。

妈妈从自留地摘菜回来。“小珂，怎么啦！”

我呆着脸，语无伦次，把经过讲了一遍。

傍晚，金色云霞在天边闪闪发亮，我们喝完了新鲜玉米熬的糊糊，妈妈把吃剩的辣椒炒南瓜片从桌子上端走，便过来和我一起坐在那只有十几个平方的小晒坝里。

“你看小溪对面那座小院，”妈妈说，“那几丛竹子，多么幽雅！”

“挺漂亮的一座院儿。”我的态度很消极，闷闷不乐。

“那院子南面，凸出来的那几间房子里，住着一户姓赵的人家……”

“小路弯弯通大路，大路旁边有人家”我不觉低吟起民间叙事诗《马莲花》中的两句，因为这两句特别朴实明了，富于民间诗歌特色。

“……姓赵的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八岁，比你大一点；另一个六岁，比你小一点。”

我不做声。妈妈要说的，已经明白了。

“那两个男孩可能干啦，每天打猪草、挑煤炭，捡柴，抬水，帮助他们的妈妈做那么多事，就是有一点：男孩总有些顽皮。”妈妈看着我，目光充满慈爱。“你说有男孩骂你，我就去找他们俩了。哥哥叫赵刚，小名是缸子；弟弟叫赵潭，小名是坛子。他们说以后不再跟你开玩笑。本来人家坛子也不是存心要骂你，是逗着你玩么。要是你也唱山歌，给他们堵回去。昨天，你们已经成好朋友了。”

妈妈提出了一条原则：我应该变得跟他们一样，我嘟起嘴。

要我变得跟他们一样！

人生的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和小家伙们交上朋友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的模样、言谈、举止、心理，跟那冷漠残忍的外部世界一样，老让人抓不住实在的东西，使人感到雾茫茫，冷冰冰。

妈妈教我读书。“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做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似懂非懂，朦胧中，仿佛我就是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拖鼻涕的缸子坛子是最干净的工人农民。我下定决心好好向他们学习。

山坡上，白茅吐出绒绒的穗子，在夏末熏风中酒醉似地摇摇摆摆。我，早已脱下粉红色衣裙，琥珀项链也深深藏进老式立柜底层，换上花布衫、蓝布裤，和黑妹一样的红布鞋。小脸也不再粉嫩，由于风吹日晒和营养不良而趋于黑黄。

赵刚、赵潭、秦黑妹和我，一起在山坡上打猪草。

还有一个男孩，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眉宇间透出一股英俊气概，也跟我们在一起。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他漂亮又聪明。

“竹生，快来呀，这儿有好大一条虫！”

他跑到我身边。“这叫猪儿虫，肥得象猪。”

“它吃什么？”

“吃——吃草、吃树叶子。”

“你敢碰它吗？”

“我敢碰。但是有什么意思呢？叫别人看傻气？”

这句富于哲理的话让我大为赞赏。我用明澈的目光

看着他，他也回报以亲切的笑容。他的目光使我低下头去。我受不了亲切。

缸子挨过来，轻轻捉住肥虫尾巴部翘起的一根刺，把虫提到我鼻子尖上。

我“啊”地一声往后退。

他嘻皮笑脸挨过来：“胆小鬼，嘿，胆小鬼……”

竹生大声喝斥：“缸子！你疯了？！”

缸子毫不示弱：“他是你妹妹还是你亲戚？”

竹生瞪圆了眼：“你又想打架？”

“哼！我手板心早就发痒了！”

我急忙插到二人中间，背靠竹生，面对缸子，和解似地说：“算了，算了，别吵啦！”又转过身，面对竹生，背朝缸子，“你们看，我捉住了一只虫。”

竹生说：“这叫灶鸡。”

这下该我得意了。“什么灶鸡！这叫蟋蟀，古书上叫蛩。”我摆着脑袋。

一直闷头割猪草的黑妹，这时探过头来看。“穷——还富呢！给它取什么名儿，它又不反对。”

“不是穷富的穷，是上面一个巩字，下面一个虫字。”我看他们都在手心里划着这个字，忍不住，朗朗地背诵

起来。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静，户外月笼明……”

四个小伙伴一声不吭。我和他们一样，并不理解诗的含义，而是被音韵之美打动了。

得意之余，我又背起另一些句子。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竹生轻声问：“谁教你的？”

我低下头。“爸爸，还有我妈妈。”

黑妹反应极快。瞪圆眼，又是满脸直率神气。“你爸爸妈妈都是坏人！”

缸子坛子瞪大疑惑的眼睛。

竹生想了想。“什么坏人？坏人有好多种。”

黑妹说：“坏人就是坏人，反革命！”

我一句话都没有回答。地上有一棵小草，被整个夏天的烈日炙烤，奄奄一息。可我并没有要用眼泪去浇灌它的意思。

出人意外，坛子突然大声说：“背篋满罗，该回家罗！”

竹生带头朝放背篋的地方走去。

西北方涌上来一堆乌云。风驱赶着，很快便阴云四合，还有耀眼的电光和隐隐雷声。

我害怕了，叫道：“跑快点，要下雨啦！”

缸子在我身后。“哼，书呆子！落雨就是落雨，下雨？书上的话！”

我委屈得撇了撇嘴。自卑感压住我，使我的人格再次萎缩。这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跟他们那么生疏，而且，很多很多年，生疏感和自卑感一直让我抬不起头。难道真有一条逾越不了的鸿沟？

幸而还那么年轻，我下决心要学会他们的一切：语言、动作、劳动技能、生活习惯。

二十多年后再来回想，真是可怕。

四双乌黑裂口的赤脚，跟我穿小红布鞋的、虽然已经变黑和变粗糙了很多，却仍然显得白嫩的脚，是明显的对比。

“你们等着瞧吧！”我咬紧牙，把布鞋脱下来装进背篋，赤脚站在阴凉干燥、有些扎皮肤的田埂上。

竹生回头看看我。“快点！”

他在最前头跑着，后边紧跟四个小家伙。他大声说：“云是从九龙山来的，要落雨了。要是黑云从牛角峰过

来，雨就落不下来。”

我边跑边气喘吁吁地问：“为什么？”

“牛角峰太高了，黑云不会翻山。”

我说：“哪有这种道理？云总是在山的上面，大气层——”戛然而止。因为又想到了那条鸿沟，缸子和黑妹的口头语汇里决不会有什么“大气层。”

五双赤脚噼噼啪啪在田埂上跑。乌云追赶着我们，豆大的雨点也追上了我们。

这是搬来“新家”后的第一次，我主动地去适应这个环境，而在此之前，我都是取逃避态度的。

第一次上山挑煤炭。

青松又高又直，伫立不动，青松脚下有丛丛灌木，灌木上结着指头大的小果子。我放下扁担箩筐，爬上陡坡，摘上一颗果子，梆硬。

“妈妈，白毛女吃的就是这个吗？”

妈妈站在路上等我。“不是，这个不能吃。”

“可惜。”我跳回路上，抄起扁担。

越往上爬，越冷。松枝上出现白雪，风也飕飕的，刮得人脸疼。我顾不得风吹，一个劲盯着松枝。多好看，绿绒毯上堆棉花。

买好煤后，我们往回走。妈妈挑六十斤，我挑二十斤。好些挑煤的人看着我们发笑。

头上冒热气了，脱下棉衣，折几枝青松垫在煤炭上，棉衣就堆在松枝上。

肩膀疼得要命，脚也疼，红布鞋的鞋袪掉了，趿拉着鞋，一步一拖，我想哭，但是哭给谁看呢？妈妈早跑到前边去了，转过一个山弯又一个山弯，连影也没有。

我僵着身子，干瘦的两臂伸得老长，无力、软弱，抓着不听话的箩筐绳子，死死地。

终于忍受不住，歇下扁担，蹲在路边，不是低声啜泣，而是大声嚎啕起来。

妈妈转回来，微笑着看看我，不说话，挑起我的箩筐就走。我觉得妈妈的力气真大，她的体态也越来越矫健。

我伸出血淋淋的双手给妈妈看。肩上还有被背篋绳子勒过的红肿痕迹。

“疼吧？”妈妈心疼地抓过我的手。“来上点药。”

“不用！”我满不在乎地一甩脑袋。“一点也不疼！”其他小朋友的手受了伤，从来不上药，除非伤成了残废，他们的父母才带着上医院去。

小晒坝里，我割来的柴草堆得小山一般。在爸爸眼里，这只是可怜的一小堆，我却觉得其多无比，足以引为自豪。要知道，我拼尽了所有的力气，才比秦黑妹多了一点点——为此，她还不大高兴。她感觉到我在跟她比，而且她输了。

不知我和黑妹的矛盾是不是由此而始，由于我们双方的好胜心。反正，我们俩一直处于明争暗斗之中，时而我赢，时而她赢。

我的手跟身体一样，正在发育中。它们从来没有被顾惜过，反而被肆意糟蹋。我希望手指头变得跟树根一样，变得和竹生、缸子一样。

我跑到床头挡板那儿。“妈妈——我的裙子呢？”

妈妈吃了一惊。“你怎么了？”

“妈妈，我想看看裙子。”

“锁进箱子里了。”

“我想看看嘛。”

“你就会给人添麻烦！”她扔下正洗的衣服。

粉红丝质裙子叠成四方块，安安静静躺在箱子底里。它是最最温柔的老朋友，跟粉红色的梦联在一块儿。但是我要抛弃它了。

我跟它默默道别：“老朋友，再见了。”

妈妈站在我身边看着我。

“妈妈，我已经变成农民了，是吗？”眼睛里闪耀着遏制不住的喜悦。

“你还差得远呢！”她笑了。

“今天我割的柴比黑妹还多！”

“那算不了什么。你得学会一整套本领，从洗衣、做饭、喂猪到经营自留地、到上坡干活挣工分。你的道路长着呢！”

我象一棵小树，被洪水冲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没有晒死、淹死，却把根须扎进石头缝里，挺立起来了。

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万物。无论别人怎么说，我总觉得有那么一股力量，而且它很强大，无坚不摧。为什么这个人必须出生在这片土地上，而另一个人必得流落到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这两个人必须结婚，而另两个人又必须离婚？……

我温驯地顺应着冥冥之中那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不敢反抗它。这力量可以在渺小的人类惊惶失措的一刹那间，把世上的生灵全部捏成齑粉。因此，我必须热爱这片土地，热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热爱这些素不相干的人？仅仅是为了应该生存下去，象一条丧家之犬？要是为了这条不值钱的小命而去爱一些不值得爱的人，还不如掐断这条命呢。

我感到这些人值得我去爱。

夜，小瓦房内，油灯如豆。

爸爸躺在床上看着我。“我们小珂这阵子瘦了。是吃不饱？”

话音未落，远处传来一声凄厉刺耳的唢呐。有人用粗犷的嗓音高叫：“呵——呕——！抓贼呀！抓偷红苕种的贼呀！”

爸爸闻声而动，敏捷得象只猫，弓身跳下床，青烟一股，消失在门外。

我和妈妈瞠目结舌。

二十分钟后，爸爸回来了。

“是李家坡的李驼子，偷了一口袋苕种。”

“偷苕种有什么用？”我问。“现在还是冬天。”

爸爸沉思片刻。“他断粮了。”接着补充道：“饿死也不能偷苕种呀，明年全队老老小小一二百人，要吃饭呢！”

“抓住了，打他吗？”我又问。

“你听，”爸爸说。

果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哀嚎，撕心裂肺，在夜间的田野上，游魂一缕，飘飘荡荡。

“求求你们哇——”

我全身的汗毛连同头发一起竖起来。

“唉！”爸爸唱然长叹，重新披衣出门。

哀嚎声停止了，我朦胧睡去。

现在，当我坐在高原上的陋室里，透过玻璃窗看着荒凉的原野，看着在荒原上肆虐的风沙时，我想，对陌生的土地，我们常常是无权去批评的。无权选择，无权表达自己的好恶，就象我童年时的感觉，那时我并没去想，对这片土地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或者说，这个世界，不喜欢我，因为我有很多缺陷，配不上这个地方，得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它。

每一个来到西藏高原的年青人，不都是改变自己以适应这儿的一切吗？

其实，当初我是尽了最大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在改变自己的每一阶段上，都充满着发现弱点的痛苦、悲哀和克服弱点之后的喜悦自豪。

从外貌到心理状态，我都改变得极快。偶然回到从

前生活的大学校园里，碰到从前大学附属小学的同学，我有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我熟悉的许多东西，都是他们不知道的；我会干的许多事情，他们连听也没听说过。甚至，心底里会响起一声冷笑：这不再是从前那个又丑又怯的黄发小姑娘了，不会再忍受你们的歧视和欺侮了！

有了新的家庭、新的家乡，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力量。甚至，我也想学学打架——这在从前是连想想也觉得犯罪的。

兴趣全部转向。注意力放在怎么多捡一把柴，怎样装满猪草背篋，挑煤时，怎样在发疯般的人群中去抢夺一块好煤，那好煤闪闪发亮，就象一根带肉的骨头吸引着一群饿狗。

对大学校园和从前的同学失掉了兴趣，再过几年，根本就不想回从前生活的地方去了。那里变得如此陌生，那里的人，他们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兴趣爱好以及心理状态，都使我觉得不可理解。

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

又可惜，这个农民的内心世界并不那么彻头彻尾的农民化。

竹生多么威风呵！绿军装、绿军帽，草绿解放鞋。

这一身有些晦暗的颜色，要是不佩上红帽徽、红领章，完全不好看。可是竹生有一个鲜红的袖章，上面烫着三个飞扬跋扈的金字：红卫兵

班主任老师挑着一担粪水从操场经过，一群男同学拥上去，给他涂了满头满脸污泥。竹生不屑于参加这显得有些下流的行动，他在操场另外一头，缓缓踱步，冷眼旁观，俨然总司令派头，身边还簇拥着几位扈从。

我孤独地站得远远的，看他们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我自己虽然不属于污泥浊水，却被洪流冲到岸边，成为无法前进，在河湾里打漩儿的黄色泡沫。不气愤，也不高兴，只是隐隐感到深沉的忧虑。

妈妈，也正被不懂事的小学生推来搡去。

“……我又没说话……我又没说话。”

我反复念叨着，用指头抠身边石缝里的小草，透过模糊泪眼，看泥土杂草根簌簌往下掉。

“我的命不好……”一想到这点便倍加伤心。这是农民意识。什么是命？谁能说得清楚？是强大而不可知的自然力？

有脚步声走近。一双熟悉的、穿黑布鞋的大脚停在我身边。

缸子的声音问：“你怎么啦？”

我不想搭理任何人，扭过身去。

他转到我面前，低声问：“谁欺负你了？”

我受不了关切，可又不忍心对他不礼貌。

“刚才……支左的王指导员把我从教室里……赶出来了。”回忆起刚才的屈辱，我拼命压下喉咙里的呜咽，
“他说……狗崽子，不许呆在……宣传毛泽东思想……”

“你上课时讲话了吗？”

“没有，我又没说话……是兴凤给我梳头发，”我的
小辫老是不规整，女同学爱在上“毛泽东思想课”时，
趁那乱哄哄的劲头给我梳小辫。“他们都在闹……王指导
员拿我出气……”

缸子怕我再说下去。“算了，算了，混日子的屁课，
不上更好。你看，我根本就不去上课，多自在。”

另一种价值观，如此明澈。他轻轻拉我的袖子，要
我离开这偏僻无人的乱石堆。我抬起泪眼，觉得他是那么
亲近。

以后好多年，对缸子的这种感觉一直控制着我。

有一个家，是多么好啊。

把书包往床上一扔，愉快地叫声“妈妈”，还哼着歌

儿，好象在学校里过得轻松愉快。

妈妈从厨房里出来，眼神好古怪。我不由得摸摸脸颊，仿佛那儿长了个毒疮。歌儿的后半段堵在喉咙里，我垂下眼睑。

“妈妈……我不上学了。不要念书，也不要上高中。”我等待着妈妈坐到身边，说上许多宽慰的话。“我要回家来当农民。”

但是妈妈一句话也没有说，撇下我，顾自走进厨房。

我呆坐着，看泥地上一只小蚂蚁拖苍蝇。不一会儿，脚步声从厨房一直响到我身边，轻轻的，好象我正在熟睡。

“小珂，你看，事情不大好办，”妈妈的嗓音很平静，“爸爸不能参加‘贫下中农协会’，他想离婚呢。”

我被炸雷击中了。

“你明天就回学校去吧。”不知为什么，妈妈脸上挂着微笑。

我盯着继父，眼里充满恐怖。他瞟了我一眼，那冷淡的眼光明明白白地说：你不是我的骨肉，不应该住在我家里。

吃饭了。硬将饭和菜塞进嘴里，它们在嗓子眼里堵

得发疼。泪水滴下来，妈妈和继父都看见了，它们一滴滴掉进碗里。

学校里的人漠不相关，可以互不理睬。可以与别人擦身而过，扭脖子不看。家里却不能这样。家里大眼瞪小眼。真不忍心看妈妈，她眼里有好多我能解释、却解释不透的东西。

继父低着头。

从第一次叫他“爸爸”，在世界上我就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我热爱这个位置，为自己有了这个山青水秀的立足点而欣慰。同时，为了使自己能够配得上它，已经克服了自身很多东西，包括优点和缺点。我已经变成了粗野的乡下丫头，我把自已交给“爸爸”支配和控制，那么干脆，那么心甘情愿，按照他的希望竭尽全力。

一切都无意义。我是无足轻重的。世间一粒浮尘，浩荡人海中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连母亲也无力保护我，我和这块土地缺少血缘关系，并没有被这块土地接纳。

总之，我的灰心失望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走出家门，涉过小河，登上对面山坡。扭头望，见妈妈孤零零地站在小晒坝当中，默默无语，目送着我。

咬牙而返，还是学校好啊，那里有女生寝室，有我

的床位。那里有我合法的位置。

同学们轮流去厨房里帮厨。

我蹲在地上摘韭菜。花白胡子的杨师傅在我旁边剁肉馅。菜板是个大树墩。架在木头支架上。男同学们抬着大白菜从我们身边经过。

“ 当当当…… ” 菜刀在耳边响。

我斜眼看看菜刀。

要是抓住菜刀往脖子上砍……脖子上有条大动脉。《斯巴达克思》里好多英雄都是被砍中这条动脉死的。鲜血会象喷泉一样直喷上厨房潮腻的天花板。那么一切都结束了……要是砍不中呢？……

能割断喉管也不错。

鲜血淌出来，象鲜花盛开，我变成花蕊，从无人理睬一变而为人人关心……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 你怎么了？ ” 杨师傅的怒喝打断我的退思。这老头以凶恶而出名。男同学们背地里骂他“ 骚鸡公 ”，女同学们则津津乐道地议论他为什么到五十岁了还打光棍。

“ 你好好干活。干事情嘛，就得有个架势，别那么贪生怕死磨洋工。…… ”

菜刀砍在脖子上……我继续着自己的思想，会疼的，

不过，只疼那么一会儿，马上人事不省，告别这个世界……多么轻松，多么好啊！

“你不舒服吗？”杨师傅突然弯身在我头上。“唉，不舒服就别来了。这儿没你也行啊。”他举起油腻的双手，用肘子把我往外推。

我没有注意杨师傅，死死盯着菜板上的刀。砍的时候要猛，一下子砍断……血管或喉管。多疼啊，决不能有第二下。杨师傅已经放下菜刀了，它就搁在树墩子菜板上。有谁推着我……极好的机会，只要纵身一蹦，就成功了。

我想以极敏捷的动作扑过去。但身不由己，刚站起来，便软软地靠在杨师傅怀里，筛糠似地抖着。

“骚鸡公！”抬白菜过来的男同学骂那老头。“专爱找女生摸奶奶！”

老头没有听见。他急着用油腻的手去抓水瓢舀水，给被认为是发急痧的女学生揪痧。

我晕晕乎乎。脖子怎么会疼？

“已经砍过了吗？”我伸手去摸脖子。

由于失望，我全身发抖，软弱无力。再次看看搁在菜板上的、大而雪亮的菜刀。

“要是让妈妈知道……”

要是一个人在四顾无人的荒野，被神秘的命运的力量推下深井，他会怎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尝过这滋味。但我自己尝够了这滋味。

家庭得以稳固而不致破裂，是靠了继父的善良，底层社会劳动者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不允许他在患难时刻抛弃孤儿寡母。

我的依赖感却永远地被打破了。一片随风飘去的枯叶，没有家，没有家乡，抓不住一点儿实在的东西。

来到西藏以后，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西藏，用它粗犷的自然风貌，用它淳朴的人情，赢得了我的爱。何况，我是边疆的一名普通建设者，在这儿洒下我的汗滴——我爱这块广袤的土地，毋庸置疑。

可是，西藏并不是家乡。

家乡，用不是家乡的任何地方，都取代不了。从小生长的地方，祖籍、血缘亲族共同生活的地方，这才是家乡。

也许，我一开头便搞错了家乡的概念。

不管怎么说，依赖感永远地被打破，它一去不复返。

当别人兴致勃勃地夸耀家乡，无限向往地怀念家乡时，我能夸耀什么呢？

空荡荡的内心象一座巨大的坟墓，它吞噬了属于青春年华的一切：好奇、追求、欢乐……于是爱情的渴望病态发展。我需要思念一个人，让他住在我心里，填补空虚，免得这片黑暗埋葬最美好的一切。

这时，我还不满十五岁。

我的目光常常凝聚在小溪对岸的小院子里，凝聚在那丛优雅的慈竹上。

干什么都得靠自己——这是学生生活结束时得出的结论。凭自己的精神站起来以后，没料到依赖感反而更强。我意识到自己是那么怯懦，那么弱小不值一提。常有令人惊怕的东西扰乱我，使我需要依靠一个人，哪怕只是抽象的、精神上的依靠。

这时，我常在睡梦中、在幻想中见到心上的小伙子。

竹生面色惨白。那张英俊、聪明的脸已憔悴不堪，茸茸的络腮胡须挂了满脸。他的眼珠盯着空中一个不存在的物体，没有光泽，毫无表情。

我从一位大嫂肩上望过去，偷偷凝视着他。

霹雳般的断喝吓得我一颤：“对打砸抢分子罗竹生，

进行揭发批判！”

竹生的脸色苍白到透明。他并没有五花大绑，也没有被人押着。

“罗竹生，站到中间去！”

四百名社员的目光一齐射到他的身上。有的仇恨、有的嘲讽、有的怜悯。他知道自造反以来自己在社员中造成的恶劣印象，也知道战友们偷鸡摸狗的胡作非为。

他被什么力量驱使？这一切该怪谁？？

一腔心事付瑶琴呵……

“你聋了吗？站到中间去！”

竹生“腾腾”几步迈到会场当中，依然豪气逼人。就象当初他揭竿造反，应者云集，那是一段辉煌的，值得纪念的日子。

“打砸抢分子罗竹生，老实交待你抢劫行凶的罪行！”

他不卑不亢地说：“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家都很狂热。我们卫东兵团的战士，抱着一个最崇高的目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由于年轻幼稚，我们被利用了……”

队长一拍桌子：“不许推卸责任！老实交代你的反动

思想根源！”

竹生坦然地抬起头来，望着会场中央一个不存在的物体，眼珠后面凝聚着复杂内容：“我只能说我想到的。”

这句话使我大为惊讶。我只能说环境迫使我说的——我缺乏他那独立不羁的态度和自我意识的心理。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

秦书记捅捅身边的治安委员：“喊个口号嘛！”

治安委员捅捅他身边一个傻呼呼的小伙子牛娃，“喊：打倒罗竹生的嚣张气焰！”

小伙子模仿电影上的动作振臂大呼。人群中，零零落落响起应和声。

我没吭气，因为嗓子发不出声音来。无论人家告诉我竹生多坏，抢了多少东西，刺伤过多少人，应该憎恨他，怜悯心却不管道德要求，充满了我的胸间。

竹生安静地等待呼声过去。

我视线前面的肩膀一晃，接着瘦削的脊梁挡住眼睛，大嫂站了起来。

“竹生，你的心也太狠了！连乡亲们的东西也偷。我那只黄母鸡……”

竹生开口辩白：“那不是我，我叫他们别……”

大嫂打断他：“都一样！你们一起吃掉的。”她抽泣，拿手中正在缝的白布汗褂擦眼泪。“那年它被老鹰啄伤了，我一颗米一口水把它养好，正在下蛋……”

大嫂的儿子，带头喊口号的傻小子，气呼呼走到会场中央，照竹生的脸便是一巴掌，打得稳、准、狠。

竹生踉跄了一下。他曾多次这样打过别人。当对方无力还手时，打人是多么愉快的事啊。这个动作震得掌心发麻，发泄了郁闷，使残酷的欲望得到满足……那些乱七八糟的日子。吃过多少鸡？从集市上讹诈鳝鱼，还有鲜鱼、鸡蛋……他本人从不偷鸡摸狗，全是战友们搞来的。当然，大家一起吃，热热闹闹地。

一滴血珠从鼻子里掉下来，碰一下裤管，落在鞋尖上。他看不见周围以各种神情盯着他的眼睛，眼前只浮动着一双眼睛——一双女性的、温柔而深情的眼睛。

她爱过他。也许，直到现在还爱他。可是联系断了。

如果真还爱他的话，爱情，是空间和时间的阻碍所能隔断的吗？他常常遏止不住地狂热地想着她，可为什么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呢？水汪汪的、多情的眼睛，它们很可能又凝视着另一个青年男子了。

还是斩断这不祥的丝缕吧。

他明白，越是孤独痛苦，这丝缕缠得越紧。

我有三分之二的心思，放在当好农家小媳妇的准备上。

我挑着一对小粪桶——确实很小，只有六十二斤；其他人的则至少在七十斤以上，甚至还有一百斤的——在山坡上给玉米苗浇粪水。不愿意在妇女组里跟嘴皮子发热的妇女在一起，因此男子作业组里多了我这个女的。

妈妈常说：“别做出那副清高样子，好象你多么了不起似的！”

可是我什么样子也没做。本来的样子。这本来的样子离农家小媳妇的形象距离太远。

不自觉地，常将目光投向那片竹林。什么时候，那里才会闪现熟悉的粗壮身影？他又黑又粗，面部线条却又那么柔和，显得憨厚朴实。

我喜欢朴实的人，他们没有歪心眼。

但要到什么时候，他才会察觉我对他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会理睬我吗？我——符合他心目中预定形象的条件吗？

我拼命学做家务事：推磨、筛玉米粉、煮玉米羹；做各式咸菜；煮猪食、买精饲料、喂猪；经营自留地、

烹炒刚从地里摘回的菜蔬，在缺油少盐的情况下做得鲜美可口；去自由市场上出卖新鲜蔬菜又买回油盐酱醋.....

可惜，做的这一切都成绩不佳。

无论如何，我把一颗心暗暗地给了我的心上人。他从来不会想到，在他的窗户外面，有一双如泉的眼睛，每天对他隔溪相望。

自卑感太重了，使初萌的爱情带着严重的病态，也注定了经历的曲折痛苦。我的爱情仅仅表现为一种煎熬，一种不尽的思念。

梦想着、渴望着、期待着.....

他什么时候才从矿上归来？

他不在，我无限惆怅。他回来了，使我知道他就在身旁。青年们相邀着去看他，听他讲外面的新闻；我坐在人们背后，默默注视一阵，然后随大家告辞。

要是他偶然注意到我，开上一两句玩笑，那我真是幸福极了，会兴奋得一夜无眠。

他什么也不知道.....我怀着无限悲哀，克制着在内心汹涌奔腾的爱情狂涛。

我把扁担架在两只空桶上，呆坐着。对面山沟底部，

临近小溪那座小院，是安静的。那从慈竹也是悠闲的。他正坐在院子里削竹扁担，动作那么利索，手势那么准确。绒绒一圈黑毛围住他的脸，再过十年它们会长成一部络腮胡子。可惜中国人没有蓄胡子的习惯。

但对面院子里并没有人。他是在我的想象中削扁担。他身材高大，手臂粗而有力，挑煤炭能挑二百斤，扁担都给压折了。

在当好农家小媳妇的准备之余，还有一丝压得最深、藏得最严的念头，这念头与小媳妇相悖：我渴望念书，渴望继续被中断的学业。当然这一念头羞于被人知道，因为纯属不可能。只有妈妈，偶尔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她明白压在心底里的这一丝不灭的希望。

我觉得对面的小院跟我那么接近，却又那么疏远。我那么了解它，又那么不情愿住进去。

一阵歌声把我的目光引向左面山坡。

“……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啊，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歌声里充溢着诉不尽的哀怨和愁苦，把我吓了一跳。谁敢在这红彤彤的天下唱禁歌？

刚才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作业组的社员正在左面山

坡上浇粪。竹生紧盯着我们这边，一逼空粪桶悠悠地在他肩上颤。他紧紧盯着我呢！

一阵心跳。急忙低下头假装没看见他。

不知他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与他的女友关系如何。能跟他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如果说他生活在地狱里的话，我也只是在地狱的边缘上。我可不愿掉进地狱。

我同情竹生，也喜欢竹生。可同情与喜欢都不是爱。在这山沟里，他是最英俊、最聪明的小伙子。然而，光靠外表的美丽，在我们贫苦的土地上，怎能赢来爱情，如果他不同时具有勤劳勇敢的品质和一颗富于同情、乐于助人的心？对弱者缺乏同情，怎能换来弱者的爱情，如果他向她要求爱情的话？

古人有云：“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这些话在我脑子里化成一幅恬然自安的居家图，仿佛一位银髯老翁，以有条不紊的动作，率领他的晚辈们，与世无争，经营管理着四世同堂的大家族。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羞……”

这是多么让人安心的格言！要是田园图中果真充满农家乐，我真愿杜绝他念，安心把一切都奉献给这块土地！

可惜现实生活全不如此。现实生活充满了骚乱、争斗、动荡和令人心悸的种种丑恶荒谬。

清晨，霞光道道，草叶湿漉漉，露珠反射着绚烂的光彩。

我从山沟底下挑着一担粪水，呼哧呼哧爬上坡。凉爽的晨风迎面拂来，东升的太阳用金光亲吻沉睡了一夜的庄稼。

粪水一瓢瓢淋在蔬菜根部。施水肥，我们是不放下粪桶的——坡度太陡，只能挑着两只桶，依靠平衡律，用左手和右手轮换着使瓢。

粪桶空了，我将空桶搁在地垅头上，俯身察看自己亲手栽种的，用汗滴浇灌的蔬菜。

辣椒红了，需要摘回家，用竹箴串起来晒干，茄子濒临死亡，应该拔掉。红薯藤得翻翻，免得附生在地上。翻过之后还得浇点粪肥。

菜地坍了一个角，泥土都从这个角流失到下面的排水沟里，又被雨水冲跑了。

我吃力地抱起一块石头，将坍了一角的土坎垒起来。

汗珠在额上映出五颜六色的光。一滴汗珠掉在脚下松土里，留下湿印，旋即变成极其模糊的白印。生活多么艰难，要在无形的命运压力下生活多么艰难！幸而艰难之中有乐趣。

我突然发现，与邻居“獠牙”的自留地相隔的界沟被谁挖松，足有一尺五宽的界沟归了邻居。而新的地界直向我这边侵犯过来，挖到我亲手栽种的青菜根底下，连菜根的黑须都露出来了。

邻居“獠牙”，是一位老妇，年近五十，凶悍、阴毒，龇着她暴突得吓人的大板牙，荷锄而立，站在我们的地界边上。她经常为柴草地界之类的小事同四邻发生纷争。

她的出现太意外，我微微哆嗦一下，“你怎么挖到我这边来了？”

她早有准备。“谁挖了？你血口喷人！”

我指着新开的界沟：“这是什么？”

“你自己把菜种到边上来了，你贪心不足！”

我返身往家走，去搬救兵。

金灿灿的太阳升起来，它看见地球上这个小小角落里聚集着一群人，正在为跟战争、掠夺、残杀的起因同

样古老的起因而争吵。獠牙带着她的五个儿女，放开喇叭似的嗓子；我和患病的父亲、斯文白净的母亲，音量没他们大，运气没他们足。

雀噪一般。各执己见，难以结论。

人类要到哪个发展阶段上，才能免去这最不光彩的一幕呢？

最后，妈妈说：“别争了，去请秦书记来主持公道吧。”

回到家，爸爸面壁而卧。他突然回头，用微弱的声音，恶狠狠地答道：“我，从小看主人的脸色，到现在，还要看主人的脸色？”

妈妈沉默好久。“秦书记不是经常对人说，你和他关系最亲密，小时候一起放牛，青年时代一起参加清匪反霸，是并肩长大又并肩战斗的好朋友？”

“那时候，他还没做官；现在，我还没做官。”爸爸侧脸向墙。“唉，自留地算个啥，吃点哑巴亏吧。”

没想到妈妈掉泪了。“你就看着……我们小珂……受欺负？”

我一直微不足道。甚至，看不出我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那么，是否连一点值得骄傲的回忆也没有呢？

也许没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有值得高兴的东西。

我的人格总会冒出来显示一下啊！

爸爸推倒了原来的小猪圈，想把它扩大一倍。我和他去小溪的乱石滩中寻找石头，找到了合适的，用绳子套上，我抬前头，他抬后头，重心移到他那头，很不平衡地爬上溪岸。有时，爸爸会在身后一声怒喝：

“你哪个搞的！？”

吓得我一颤。有次吓得我扔了杠子。

猪圈需要木料。但算来算去，还缺一根作柱子用的。

“只好等几天再说。”爸爸消极地看着。

那是溽暑炎夏，整个嘉陵江中下游区都热得象蒸笼。我想让爸爸吃一惊，便谁也没告诉，独自揣着一把雪亮的砍刀出了门。

正在“武斗”期间。一切执法机构都陷于瘫痪。郁郁葱葱的山林几乎被洗劫一空。高山之下的漫坡和小山头，只剩下了不成材的幼树。

虽说偷砍树是半公开的，我还是害怕被人撞见。我的身份不同于一般社员。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边朝山上爬，边心虚地四处张望。

太阳把一切都晒得白晃晃。人们在家里睡午觉，谁也不愿在最热的午时出来“烤油”。偌大的山沟静悄悄。

不敢砍大的，砍倒也扛不动，我选中一棵约两米高的小棕树。棕树皮很硬，铁似的，砍起来“崩崩”响。我砍了两下，停住，朝四下里张望，见没人窥视，便举刀又砍。棕树皮木渣横飞，已砍出一道白圈。树心是软的，我用脚使劲一蹬，“哗——”，树倒了。成功告半。我极迅速准确地几刀挥去棕扇一样的棕树叶，扛起它便跑。这是一棵小树，不太重，飞一般，上坡下坎，前后花了半个小时，人不知鬼不觉回到家里。

爸爸听见“咕咚”一声，出门来。他什么也没说，连笑容也没有，看看我，用手掂掂树干——啊，我那么费劲，可这树干在他手掌里只象一根竹竿。他眯缝起眼睛，左看右看，好久才说：“可惜嫩了点。”

当天下午，这树干就竖在猪圈里了，一直到现在，它还竖在那儿。黑乎乎，铁似的。棕树皮不需要剥去，所以它永远是粗糙的。猪时常在它上面蹭痒。

我有些得意，这得意又用冷淡盖着。明显地，我和爸爸更加亲近了。

可是这些活儿都属于男子的范围。女子应当熟练掌握的诸如筛玉米粉和纳鞋底之类，我觉得自己笨到永远也掌握不了的程度。

为此，我害怕到对岸有丛慈竹的小院里去。缸子和坛子的母亲精明强干得远近闻名，十八般武器她样样玩得纯熟——包括最难的自己剪裁全家大小的蓝布褂子。

她会喜欢我吗？

望着对面小院时，我不敢想象自己已成为那儿的小媳妇，或者想象着，怎样在未来婆婆的怒骂声中战战兢兢过日子。

社办小煤窑的煤，同一户人家，每一百斤煤炭，上等煤可烧九天，中等煤可烧一周，下等煤则连六天都不够。它们价格不分等，一律每百斤六毛。

黑妹跟我一样长成了大姑娘。她太黑，稍有点胖，脸蛋圆鼓鼓，身体也圆鼓鼓。她不喜欢人家叫她“黑妹”，已经改名秦红兵。

我却不习惯叫她“秦红兵”。而且，我觉得她的肤色黑得有味道。天底下有“黑美人儿”之称嘛。

我们都挑着箩筐。“黑妹，你看映山红开得多好！”

但她心事重重，根本没注意满山满岭红艳艳的鲜花。我好奇地盯着她的脊梁，想知道为啥她不高兴。

是为找婆家吗？我们这个年龄的大姑娘，谁不为归宿操心！闷头走了十分钟，我们都没说话。

她突然问：“你知道大学招生的事吗？”

象被人打了一棒，我立即蔫了半截。想到这个，让人痛苦，我避免去想它。

“知道。”半天，我才回答。

“知不知道条件？”她又问。

“听说了。下乡知青，初中以上程度。”

黑妹暗暗叹口气。我突然意识到在队里只有我是符合条件的。

难道我的命运真要出现转机，庄稼院的小媳妇真的不是我的归宿？一阵狂喜袭上心头，窒息得我出不来气。

但是，一贯的命运的黑色阴影象一片乌云重又在头顶上聚集拢来——我的前途决不光明，它不可能光明。没有理由去想象命运之神会照顾我，对外部世界永远不能寄予信任。

我们都闷声不响，走完了上山的路径。

小煤窑的工人，在腰上围一块破布片，乌黑、稀烂。臀部挂着电池瓶，头帽上小灯泡闪闪发亮。他们从窑底下出来时，只剩下眼珠是干净的。

挑煤的人排着队候在煤坪外。他们能买到哪种煤，全凭运气。看煤拖子运出来倒在煤坪上的是什么：闪闪

发亮的煤块或毫无光泽的细煤面。煤炭常常供不应求，有人等了一天还空手回家。

有些煤拖子出来后不住煤坪上倒，而是被推到特殊地点，给特殊买主留下。

这一天，出煤量少得可怜。无论好煤次煤，一运出窑口就被候煤的人抢个精光。到下午四点，人们都急了，因为五点钟，最后一批拖子出窑，然后煤厂就关门下班了。

窑上的帐房先生（应该称为会计，社员们沿袭了旧社会的称呼）走到黑妹身边，轻轻说了句“跟我来”，黑妹便兴高采烈地跟他走了。十分钟后，黑妹挑着一担亮铮铮的特等煤出来，对我说：“我先走一步啦！”

我咬了咬牙，再次相信，命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照顾我，一切全得靠自己，任何求助于外界的企望都是梦想。

这时最后一批拖子接二连三地出来，每拖有四至五百斤煤。排队的人哄地一声围上去，用扁担，用十个指头，在煤堆里乱挖乱刨。有一拖特等煤应该拖到特殊地点去，忙乱中人们忽视了这一点，也挤过去抢。推煤工人搬起煤块朝他们猛砸，顿时有两人的额角鲜血直冒。

开头我吓呆了。愣了片刻也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左肋一阵剧痛——前面一条大汉的扁担刚好抵在我的肋骨上。躲过扁担，右肩又疼起来，有位姑娘的胳膊肘一下下撞我。我只能低头从他们的脚下、胳肢窝下抓点煤面。

等到煤坪上精光，连煤渣都没有剩下的时候，许多人面带笑容，揉完伤处，挑着煤走了。也有伤得很重的，坐在煤窑外等家里人来接。

我到手了四十斤煤面，最差的等外级煤。挑着这点煤面，象挑着两片树叶。

妈妈见到我非常高兴。她烧好热水，捧来干净衣服，转身又把冷掉的午饭放到锅里。

我苦着脸，心情非常坏。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我没有地位，象狗一样活着。或者说，混在狗群中活着。神秘力量不仅冷漠，而且狰狞可怖。管帐先生为什么对黑妹笑脸相迎对我却不屑一顾？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平等，也极少友爱与关切。明白这一点，对幼稚的心灵来说是残酷的。

我想寻求解答。

仅仅因为黑妹的爸爸是大队书记？她爸爸为什么能当上大队书记？是因为她家祖居此地？那么又是什么力

量给了她祖居此地的权利？

爸爸下班回家，放下锄头，问妈妈：“孩子为什么哭？蹲在溪边。”

妈妈先吃了一惊。“没有啊。”随即又笑着说：“让她哭去吧，哭一哭对她有好处。”

爸爸跨进厨房，皱皱眉头：“这怎么够呢？”

妈妈连忙接过来：“什么了不起，明天我去捡点柴。”

黑妹常来我家，亲热地叫“张么叔、张么婶。”

多年来没和她谈过知心话。这以后，更不可能知心了。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我的脸象块红布。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着，仔细研究我脸上的各部分比例。

“我刚回来，你就知道了。”

我硬着脖子点点头。今天下午四点三十分，我站在窗子前，象往常一样地凝视着。突然，慈竹后面有个粗壮的身影，这身影绝不是坛子，坛子每天要从我眼前经过数十次，不用看，凭直觉就知道是他。而这个身影，同样地，也可以凭直觉知道，它象电流般触击着我，使我又惊又喜，差点儿叫起来。

当然，随即只能深深叹口气。

“你每天站在窗口旁看我们院子，”他又说。

“我给你带来一本书，你不是喜欢看书吗？”他很潇洒随便地将一本书扔到我的桌子上。这些派头是他离开山沟以后，到矿上去学会的，这些动作不是农民所有的。

书很平常。《小靳庄诗歌选》。要是它在书店里或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我永远也不会注意到。但是，凡经他抚摸过的东西，在我便有了极其深刻复杂的意义。

随后翻着。突然有一段钢笔字迹跳入眼帘。它们象蓝色火花，灼得眼睛生痛。我急忙合上书。

“你看看吧，”他的目光深沉而又亲切。

我机械地翻开书，字迹粗放、潦草，是念过中学的农民的字迹。

“那天边的彩云呵，要是你不随风飘来飘去，我愿把你留在我火热的心上”；

“那唱歌的姑娘呵，要是你不变幻无常，我愿把名字刻在你洁白的心上。”

又一阵热血涌上我的脸。小时候，他和坛子在葫豆地里唱山歌“白鹤的脚杆又细又白”，与现在的诗句同出

一辙，是他自己写的。

我怯怯地抬头看他的眼睛。没有用嘴说的话，全都在眼睛里了。

啊，他并不知道我是绝对的一夫一妻主义者，信奉从一而终！

继续翻书，末页夹着张小纸条。

“ 明晚八时半，小石桥下等。”

缸子回矿上去时，悄悄托我关心他母亲。“ 妈妈想我，常在夜里哭。”

我极愿意前去安慰他母亲。她喜欢我与否，关系到一辈子的安宁和幸福。

于是，我带着一脸坦率诚实的微笑和一张本市交通图，进了赵家。

白木方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微胖、动作利索的赵大婶，面容精明慈爱，正就着豆大的灯光缝补衣裳。她抬起头来，迎着我的笑容却显然是堆出来的。

极不自然的笑容……这么说，她根本不喜欢我，因而也就不欢迎我……我的心往下沉，直沉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我会住到这个家里来吗？

“ 大婶，做针线啊。” 我心里有点乱。抬头，可见布

满尘垢的乌黑横梁，上面搭着过年杀猪时用来吊腊肉的绳子。再往上，可以从瓦缝中看见蓝黑色夜空中初现的星星。

“快来坐”，大婶招呼我，却并不抬头。

坛子给我端来一杯水。“小珂姐，喝水。”他的微笑是诚恳明朗的。

整个屋子呈现出慌乱气氛，好象这里正在预谋杀人被揭发了。我如坐针毡。当时我不知道，也毫无怀疑，有人藏在屋里，挑拨我和这家人的关系。

交通图在白木桌子上摊开。“从这里到矿上，要坐三天汽车。您看，七里沟一夜，李家坪一夜，回来也是这样。”本来准备了好多话，宽慰，劝解，使她不致过分伤心，这时都飞掉了，只剩下跟地图有关的干巴巴几句。“地图留给您了，要是想缸子，就掏出来看看。大婶，我走了。”

我刚刚随手关上门，秦红兵就从里屋出来。

“赵大婶，你看，我说得对吗？”她有些得意，“凭哪样要她送地图？”

坛子走到屋角，抄起一把锯子，“吱嘎吱嘎”的响声怪刺耳。

黑妹皱皱眉。母亲连忙喝斥：“坛子！大人说话，你安静点！”

黑妹说：“我从小石桥上过，看见桥底下有两个人影，”坛子母亲竖起耳朵，坛子也停止了动作。黑妹颇为说话效果高兴。“我听见小珂的声音说：缸子，这水好清凉啊。”

大婶忙问：“那我的缸子说什么？”

“他们听见桥上有人，就不作声了。”锯子声又嘎吱嘎吱响起，扰得黑妹心烦。她又皱皱眉，“当时要是派民兵来抓他们都行的。”她满意地看到缸子母亲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担心，便补充道：“小珂完全可以抓，对贫下中农哪能这样呢。”

“你想，要是小珂和缸子真好了，缸子还会有前途吗？入党、提干，都完了，只好在井下干一辈子，连个地面工作也捞不到。”她突然感叹一声，“小珂也真聪明，什么都装在肚子里。”

她道了再见，出门去。

有多少人能把最阴深的心之一角挖出来给人看？世界七又是否有人，能够把人们的阴暗心理解释清楚？黑妹意图何在，直至今日我也不甚清楚。或者可以解释为

有些人天性恶劣，要是缩小范围，便可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培养训练了许多特务暗探。

坛子在屋角重新抄起锯子，吱嘎吱嘎乱锯一气，气愤地说：“鼻子这么长！”

他母亲问：“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妈，你别去管哥哥的事，他跟谁好，是他的自由！”

“可是要影响入党提干的呀！”黑妹的关心已经使母亲平添了一层担忧。

“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入党提干的吗？”

母亲突然冒火了。“你懂个屁！你天天到井下去，撅屁股挖矿，试试看！说话象放屁一样轻松！”

坛子闭上嘴。

我再也没到缸子家去过，虽然我仍是每天站在窗边望着那丛优雅的慈竹。

青春的梦，就象那绯红的晚霞，飘浮了一阵，渐渐淡去。

我喘得象拉风箱。肺疼，是粗气割的。

腿软，跑不动。沉重的担子压在瘦肩上，脊梁都弯了。真想扔下担子。但我还是咬着牙拼命奔跑。每跑一

步，这段路程就少了一点。前面有棵五百年老松，松下一泓泉水，约定俗成的休息点，挑煤的人全去那儿歇下担子，喝口泉水，抽支烟。

有个坚强信念支持着我：跑完这段路，可以到大松树树下灌一肚子水。咬咬牙吧。

这是一根可怜而滑稽的精神支柱，却又是一根极其实用的精神支柱。要是没有它，我会一步也跑不了了。

大松树到了，它真粗，高耸入云，枝叶如盖。两人还不能合抱。投下大片浓荫，让脚夫乘凉。不过，最大的一枝，去年已被人偷砍掉了。按照已经能够执行的《森林管理法》规定，砍树枝不算犯罪，或者说罪行没那么严重。被偷砍的这根松枝，比一株二十龄的小树还粗，它可以做半间屋的椽子。

我浑身都松了架，趴在山泉边，喝下一口清凉的泉水，换口气，喝下第二口。一口接一口，灌了满肚子。老一辈告诉我，歇下担子，要过一会儿再喝水，否则会得一种可怕的病，叫“哽积病”——我想，大概就是指食道癌；喝水不要一下子喝得太多，应该留有余地，否则肠胃受不了，还大量出汗。汗出得太多太急，就浑身发软，再也跑不动了。

我把一切严重后果抛之脑后，直到冰凉透骨的泉水胀满了肚子。要是真病了，谁替我付医药费？后半生怎么过？一概没去考虑。

幸而食道癌至今没有找上我。偶然想起它，也总是默默地祈求它不要找我。

我半瘫在松树下。后面来了一人，他看见我，眼睛一亮。

竹生望着我笑笑。他迈着小步，扁担在他肩上颤悠悠，走得很轻松。

他盯着我看，发亮的眼珠是探索、询问性的。接着，他动手把我箩筐里的煤炭往他自己的箩筐里捧。

我们都是为生产队瓦窑挑的煤。我爬起来，感激而又不安，想拦住他又觉得辜负了他的好意。

竹生问：“你挑了多少？”

“一百二十五。”

“为什么？”

“因为……不为什么。”

竹生怀疑地瞧瞧我，我受不了他的眼光，低下头。“七妹挑了一百三十斤。”

“七妹比你劲大。只能承受一百斤担子的体力，偏

要自讨苦吃，去挑一百二十五。有什么必要去和七妹比？虚荣心作怪！也许，还有工分的因素吧？”

不知该怎样回答。他太尖刻，我不习惯。呆了一会儿，才回答：“工分的因素是主要的。”

“这倒还值得同情。”

跟他在一起有点不自在，准确点说，有些害怕。他身上有魔鬼的素质。这是不和谐的自然力造就的神秘的人。

我想离开他，抄起扁担。

他伸手拦住我：“多歇会儿吧。”

我只好又坐下来，双手抱膝，盯着脚尖。

“我有很多话憋在心里，想对人说一说。你知道我的处境，很孤独，想找个朋友——能听我倾诉的朋友。”他恳切地望着我，目光很柔和。

在我心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动了动。

“你愿意听我的经历吗？”

我仍盯着脚尖，默默地、顺从地点点头。

“我太幼稚、太天真了。以为自己真是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为在这条路线的尽头，真是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结果，犯了错误。”他狠狠咬着下唇，看看

侧目静听的我。

我低着头，面部表情淡漠，竭力使自己的感情与他的倾诉隔开一段距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为什么会是偷鸡摸狗、拿刀子戳人家？

“终于，我进了监狱，看见了中国社会最黑暗的一面，那里丝毫没有公理和正义，只有强权和暴力施行统治。欺诈掠夺是家常便饭。”他捋起袖子，手腕上一道深紫色疤痕。“这是那次，一个卑劣的强奸犯用欺骗手段从管理员那儿抢走了我的午餐，”竹生恶狠狠地瞪着我，好象我就是那个强奸犯；“你知道，我们每天只有八两粮食的定量，还要被人贪污克扣一部分，每天不足七两，平均每餐只有二两多一点。经常干苦力，累得半死不活，饿得两眼发花。我愤怒得象只狮子，朝他猛扑过去。我们扭成一团，在地上翻滚，其他犯人围成一圈看热闹，喊加油。管理员来了，把我们从地上拧起来，每人扇了两耳光，又踢了几脚。‘谁先动手？’那强奸犯已被我打青了眼圈，他指指我，不吭声。马上镣铐锁住我的双手。管理员故意把手铐拧得紧紧的，不到二十分钟，双手都肿了。乌紫、虚胖，象发面馒头。大家都拿我的手取笑。管理员刚转身锁上门，我就举着镣铐向那强奸犯猛扑过

去，把他的头砸了个洞。我也没占便宜，他骑在我身上，几乎把我揍死。我俩的血在地上流了一洼。苍蝇嗡嗡叫，整个星期，它们为了刺鼻的血腥味不肯离去。”

我全神贯注地盯着他苍白憔悴的脸，盯着那发亮的眼睛。五月的太阳那么明亮，青山那么葱翠，他的眼睛闪着病态的光芒，透过松枝注视着山底下遥远的田亩村落。

“其实，我们都巴不得苍蝇也住到牢房里来，好给我们解闷。”他沉默了好久。

“现在回想起来，那日子真象野兽过的，每顿饭一个瘪瘪的馒头，或者拳头大一碗米饭。有时给点米汤或菜汤，多数时候不给菜吃，更不用说肉了。这点吃的只能维持着不饿死，可让人饿得发昏。海市蜃楼似的，一盘盘美味从眼前飘过去，伸手去抓，便消失了。每晚梦见我爸爸炒回锅肉。嗯，本来不该对强奸犯那么凶。”

我想起他那次震动全区的越狱事件。“你怎么跑出来的？”

竹生怪模怪样地笑笑。“你对传奇事件有兴趣，可对我的痛苦没兴趣。不管怎么跑的，反正我跑啦。牢房里有通风设备，围墙上的电网有漏洞，卫兵也有疏忽的时

候。”

“那个打架的……强奸犯，没有告发你？”

“嗨，对这些，你一点也不懂。他为什么要告我呢？架是要打的，打架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但绝不会去告。我跑啦，凭我自己的力量。我过了三峡、游了黄山、庐山，看了黄河。你从没离开过家乡——当然，这儿也不是你的家乡——不知道我们的祖国多么大呀，风景多么美呀。在美丽的湖光山色之中，过的不再是野兽般的生活，虽然时常要躲避检查；这时思想也变啦，”他自嘲地一笑。“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使所有的人吃惊，”他又微笑了，带些腼腆，真地使我十分吃惊；“我想，虽然我的前半生已完蛋了，但还是应该为这美好的山河做点什么。不能为祖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那么活着有什么意思？这样，我构思了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叫做《祖国啊，我爱你》。”

我惊讶，我佩服，竟然目不转睛了。

他的语气重又变得很沉重，脸上有了狠毒的表情。“我能干什么？一个逃犯！再也不愿进监狱，决定朝西北方向逃，看有没有越过国境的机会……”

无论他说这番话的真挚程度如何，在我的情绪上激

起的震动是空前的。活在世上，应该有所贡献，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的路费和生活费从哪儿来？”

他嘲讽地对我撇撇嘴。“自然不是你给的，我的好朋友多着呢！离开长沙，我往兰州跑，一路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自然在检讨。我恨这个虚假的社会，它玩弄青年的一腔热诚。可是我又爱许多人，特别爱我的父亲。”

竹生深深地垂下头去。

我的怜悯心蠢动起来，差点伸手去抚摸他的头发。

“最后我决定投案自首，争取宽大。”他重重吐了一口气。“你也知道我自首以后的事，恰好赶上颁布一个新的宽赦政策。中国警察的素质很低，破案率低得要命。如果我不自首，他们永远抓不住我。自首后三月宣判。现在的日子比蹲监狱好不了多少，只是，玉米糊糊里边可以多掺些水，几大碗便撑得肚子象个皮球。可以随便上山挖野菜，没人干涉。马齿苋可好吃了，你们家常吃吗？”

我点头。“常吃。但吃得最多的是地丁。”

“地丁？太苦了。”

“对。我妈说，这东西虽然味道苦，对身体好处可大了。”

他那令人又厌又恨，古怪难看的微笑重新浮上唇边。
“不，没有思想，光有行尸走肉，哪怕壮得象牛，也只不过是牛。”

我将嘴一嘟，站起身来，要去挑煤。

“莫忙嘛，”他想拦住我。

他蛮横无礼的冷嘲热讽已经激怒了我，与他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所唤起的怜悯心相抵销。我抄起扁担，冷冷地回敬一句：

“所以你把刀子捅到别人身上，是认为捅了一条牛！？ ”

他呆了一霎。

我正气凛然朝他看看，迈开步子。

他在我身后恶毒地冷笑：“亲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别忘了你是有性别的！别忘了你是个女人，愚蠢的女人！”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叫道：“你是我向着吐露内心的最后一个——女人！”

我飞快地跑着，巴不得离他远一些，同时奇怪自己何以能跑得这么快——竹生从我的箩筐里捧去将近二十

斤煤。

要是死心塌地想嫁个农民，我就该离竹生远一些。可是那股不安心当农民的心思，象一头束缚不住的野马，使我老朝他的小瓦房张望——他能让我知道许多从一般人那儿得不到的东西。

我知道，竹生家的桌子上放着厚厚一本《资本论》，还有列宁、斯大林的汉文译注。

初冬之夜，寒冷、清寂、白霜如银。

我裹着棉袄，披件大衣，戴着带耳朵的棉帽子，手指头缩在帆布手套里，一手拄棍，一手拿电筒，在广柑林里巡夜。

广柑成熟了，灯笼似的又黄又大，挂在树上，耀人眼目。我们每年拿三万斤广柑换回几千斤玉米。它们需要人保卫，否则会被不请自来的小偷摘个精光。

月色朦胧，周围坟墓似的静，又象大海般空阔辽远。空气冻住了，冰得鼻子通红。最要命的是穿胶鞋的脚，脚指头都不是自己的了。赶快走动，挥棍打断茅草，踩得白霜嚓嚓响。

在寂静的夜里，独自一人，会对着天空寥落的晨星大发幻想。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迟迟不爆发？我的每

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准备着从军，多么渴望过战斗生活呀！战场上的夜，一定也是这么静，坟墓一般，大海一般，神秘而诱人。但是猛然间信号枪响了，我端着枪冲上前去……不用怀疑，我绝对是勇敢忠诚的战士，将象黄继光、董存瑞一样壮烈牺牲……

头顶上树枝“索索”响，吓我一大跳。这声音轻微到几乎听不出，除非是久经夜间训练的耳朵。我抬起头来。

他的小名叫“五子”。一只色彩斑斓的猫，大红运动衫崭新，鲜艳的天蓝色长裤，在月光底下，高高攀着广柑树枝，皮笑肉不笑。

“你的问题，你自己清楚。”五子阴阳怪气。

我蓦地转过身去——差不多跳跃性的；怒冲冲瞪着他。单是那刺目的颜色，就激起我的愤怒，因为它们破坏了月夜朦胧柔和、适于神思遐想的景致。

“我有什么问题？”

他依然皮笑肉不笑，毫无声息，从树枝上摘下两只金黄的大广柑，揣进怀里，那轻而柔软的动作，更类似一只五彩斑斓的猫了。

我的语气已经在请求，深怕嗓门大了被人听见：“你

别摘了！”

他笑嘻嘻地：“我摘的，谁也看不出来。”

我绕着树打转。果然！别人摘掉广柑后，总要留下白白的果把儿，被查出后，守夜者要罚款；而他，则连果把儿一起掐掉了，做得毫无声息。

我松口气。“你说呀，我有什么问题？”

“黑五类，你犯罪了！”

“什么？”

“莫装蒜！你写的反动诗词，叫人家拿跑了！”

反动诗词？我有好多本呢！经常有股潜在的忧惧迫使我把它们藏得好好的。

身后突然没人了。五子来无声息去无踪。

我咀嚼着他刚才的神态和闪烁其词的问话，感觉到某种对我不利的气味。

猛然，我被身旁的呼吸声吓了一跳。五彩斑斓的猫蹑手蹑脚又回来了，蹲在旁边。

我顶讨厌这个幽灵一般、贼名四播的小伙子，没理他。

“喂！”

我没动，也不吭声。

“喂！”一只爪子搭到我肩上。

我一甩肩膀，站起来。“不许你碰我！”

他嘻皮笑脸。“你紧张什么？待会儿还得求我碰你呢！”他的脸色渐渐转为严肃。“喂，听说了没有？到处都讲你是现行反革命呢！”

我眼里一定冒出了绿光。“你讲清楚！”

我的眼神使他害怕。他跳开一步，姿势轻捷优美。“你怎么啦？这事其实不与我相干。人家叫我告诉你，黑妹通过她爸爸交给公社书记一个笔记本，上面全写着你的反动言论。”

我跌坐在地上，原来如此！怪不得前些天黑妹老上我家来玩，是她偷走的！……

本子上写了什么呢？唐诗、宋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当心拿你做黑典型。”五子说。

“谢谢你，”我抬头向着五子。

“谢我？我可不受。”花猫阴阳怪气地摇脑袋。“谢竹生去吧，是他叫我告诉你的。”

“竹生？”我大惑不解。

我到竹生家，坐在他对面。他的眼光是挑剔、不礼

貌的。

“你看这个？”我指着那本《资本论》。

“我不该看？”他的目光咄咄逼人。“还要奉劝你一句话：缸子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好。”

我是为感谢他而来的，却实在受不了他的尖刻。“你什么意思？”

他目光冷峻尖峭，直射到我心里。“好意。奉劝你，不听对我也没妨碍。”

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种人，恶毒就是他们的本性？为什么竹生要把别人看得那么坏？他投向人们的眼光跟我不一样，既不善良，又不友好。

我不能允许任何人诽谤缸子，蹬蹬蹬几步迈出竹生的家。

愤愤不平，这是第五个难眠之夜。我翻来复去想着竹生的最后一句话，忽然悟出了被忽略的一点：他为什么要托五子转告笔记本的事？

还是出于善良和好意啊。

他的善良比我的深刻得多。

善良，太肤浅了，就和愚蠢成了同义词。

半个月后，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来生产队巡回演出，

表演新编小歌舞《黑妹上大学》。

黑妹被清华大学录取，马上要离开山沟了。她走了，我们的宁静的日子依然和嘉陵江水一道，缓缓向前流淌。

这种日子，以同样的速度和节奏，已经流逝了几千年。

醉了似的迷迷糊糊。

我爱上一个善良多情的灵魂，也得到一颗心的回报。缸子粗黑的圆脸盘在眼前晃动，使我如坠雾中。

睡梦中，曾多少回见过这张脸？

“今晚的月亮真大呀！”我喃喃着，依在小石桥洞的石壁上。

缸子朝我靠过来，眼睛象两颗红炭丸。

“你知道吗？有个白胡子老头，每晚在月亮里砍桂树。”我又说。

他不说话，光喘粗气，盯着我的脖子。

我的脖子怎么啦？又细又长，三根筋挑着一个头，别人都说这叫“雁鹅颈子。”

“你没擦香脂？”他伸出一条胳膊抱住我的肩。这动作吓得我心都不跳了。“你身上没香味。黑妹常常擦的。”

想躲开他，又没力气。啊，我需要的爱情不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想到了中学食堂里那把雪亮的菜刀。

“缸子！”我有些愤怒，低声叫。“别这样……听见没有？！”

他并不放开，而是把我拉向他，紧紧搂着。我处在一团烈火烤炙之中。

“小珂，你听我说。好多好多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啊。”他轻轻耳语，轻柔的话音缓和了我的情绪。“以后你住到我们家来，跟我母亲在一起，我每个月回家看你一次。”

他盯着我的眼睛，象是要把我的眼睛永远印在他的眼睛里。我也望着。他有力的手臂把我扳过来，面对面，粗而重的呼吸直接吹在我脸上。在这种姿势中，我的眼睛不能坦然、从容地对视，而是勉强、不自在、畏畏缩缩的。

“你妈妈不喜欢我。”我说。

“没有啊，”他很惊奇。

“她嫌我笨，”我委屈得哽噎了。

“没有的事！”缸子很肯定地说。“以前她常夸你：性情随和、能吃苦、会体贴人。”

“真的？”我高兴极了。

他眼里也冒出喜悦的火花，同时，抱住我瘦肩膀的手臂顺着单薄的脊梁向下滑，慢慢地、坚定不移地滑到腰部，握住瘦腰；另一只手往下摸，托住大腿。

我悬空了，紧贴在他那宽厚的、咚咚响着的胸脯上。同时，脑子里浮起未来甜美幸福的居家图。

“……居家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我帮着妈妈把爸爸抱到架在屋当中的门板上。

爸爸睁开眼睛，盯着妈妈看了很久，直到认出来，才微微翕动嘴唇，好象要说什么。妈妈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唇，仍然听不清。

爸爸已经衰竭得变成一具骷髅，只剩下一口游丝般的气息。青紫色血管突起在蜡黄透明的皮肤底下，隐隐能看出搏动。

昨天，爸爸要求出院。他明白自己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叫着“回家”，他不愿意死在医院里。最后这一个月，输液针头扎遍全身，待全身血管都萎缩、硬化后，针头扎到太阳穴上。

在自己亲手盖的小屋里，听着肥猪在亲手盖成的猪

圈里吃食，想到屋外包围着他的、撒下过一生中所有汗滴的土地，爸爸多么不愿离开这个世界啊！

门板上垫了两床棉絮，免得枯瘦如柴的脊背硌得生疼；爸爸身上搭了一床薄毯，免得仲秋之际未退尽的暑热蒸着他。薄毯底下突起象一面鼓似的大肚子，癌细胞已经排挤了所有内脏，并且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继续繁殖着。

家里的资财也随着爸爸的衰竭而一天天衰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爸爸的眼睛就是不肯闭上。

妈妈哭得所有的妇女都跟着掉泪。她哽咽着问：“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

妇女们搀着她，来帮忙的男人使劲抹爸爸的眼皮，好不容易，眼皮才最终合上了。

尸体在门板上停了三天。

全队的人都来吊唁。无论男女老少，都按乡下规矩，提着小篮子或小袋装的杂粮。家庭富裕的，用白纸包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祭帐送来。还有的送上几块钱、几斤粮票。最穷困的携来一把蔬菜。总之，在席卷全省的艰难的大饥荒里，我们的简单丧仪需要什么，大家就凑集什

么。

我没有掉泪。特别是没有在“应该”嚎啕大哭的时候掉泪。和所有年轻姑娘一样，哪怕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命运即将出现转折的严峻关头，心思也不能完全放在眼前的危险上。

我仍然凝视着溪流对岸有一丛慈竹的小院，牢牢记着他母亲夸奖我的那些话，希望着他伸出手来帮我一把。哪怕只来丧仪上说几句安慰的话，也会让我觉得人生是美好的！

人们忙着往新坟上培土，葬礼基本结束。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躲到一块大石头背后，眼泪哗哗往下淌。

五子悄悄走到我身边。“别哭了！”

我没有理他。

他等待着，好久好久，最后他发狠，跺脚，大声嚷：“我叫你别哭了！”

爸爸死去，我跟这块土地最牢固的一线联系中断了，新的联系还没建立起来。又象一片飘飞的枯叶，悠悠荡荡、恍恍惚惚。

如果说，中学时期我从理性上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世，那么，现在必须从实际上依靠自己。

真没想到如此艰难。首先是经济的困难。

很容易从粮店门口排队的人中识别农民。衣着寒窘，面带菜色，尤其是神态：那么卑微。我明白，自己也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当年，沉醉在童话境界里的小姑娘，连同她的鲜嫩肤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深陷在严酷的现实里。

家里几乎断顿。豆腐渣掺上牛皮菜做成浆子，已经维持了好多天。开头妈妈不知道还应该把泡菜切碎掺进去，后来，连泡菜也所剩无几。妈妈拿出最后一张粮票，面值五斤。这是珍藏了好久，打算到最后关头用的。

我到离家七公里的镇上买米。

突然一阵恶心，胃里有股酸水往上冒。我赶紧蹲在路边上，“哇哇”吐起来。

吐出一口口绿水，那是每天吃下去的牛皮菜变的。半夜里总要吐一阵，比白天更难受。有过路人盯着我看，大概是看我灰黄的脸色吧，我恶狠狠地还他们一个白眼。

买粮的队伍在粮店门口排到了上百。大门刚打开，队伍“哄”地乱了，乱推乱挤。我被人流拥着、撞着，挤到了柜台边。绝大多数人都拿着一叠叠全国通用粮票，还持有证明。而“全国票”买米，必须搭配百分之五十

的杂粮——玉米或葫豆。

据说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全国通用票”都流到四川来了，弄得粮食公司很恼火，库存都空了。

我递给营业员一张五斤票。这压得平平整整的小纸头，妈妈拿出来又放回去，眼巴巴看了多少次。营业员粗鲁地将它扔进抽屉，离开柜台时，听见不耐烦的叱问：“粮票哪来的？”

苍老的、结结巴巴的声音回答：“我……我用莴笋和莲花白换……换来的。”这是一位两鬓苍苍，枯瘦不成人样的老农。他手中的粮票全是零碎的，面值一两、二两，半斤都不多见。

“蔬菜换粮票违法，你知道吗？”营业员态度生硬。“我不收！”

“求您高抬贵手……”

我一阵心酸，咬牙咽下快要溢出的眼泪，赶快朝称米的地方走去。这儿同样排着长长的队。我的前面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长得白净水灵，衣着时髦。她买了十五斤，袋子却小了一点，剩下约二三两米，装不下。

“我不要了。”她提起口袋。

突发的冲动驱使我上前一步说：“我要。”

营业员——中年妇女，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不光为我的举动，更为我菜色的脸和寒酸的衣服，推开我说：“你要？！谁的米谁带走，带不走的，归公！”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什么时候变得被原始需要控制、成为叫花子的？羞耻心、自尊心飞到哪儿去了？

回家的路上，我神色凄惶，除了主动改造自己之外，能抗拒生活对人的改造吗？我变成了农民，是自愿的，可并不愿变得卑微下贱啊！

是的，成为某一类的人，就得完全成为那种人，连同他们的优越性和缺陷。

过了半个月，我再次上街，拿着一元四毛钱去黑市上买了两斤米。两斤米，我和妈妈掺上菜，能维持一个星期。

爸爸去世以后，我盼望着缸子，盼望着他来看我、安慰我。除了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他了。

爱情是两颗心的互相吸引，是默默地互相思念，我恪守这一条，相信他也跟我一样，会信守不渝。他说过，永远爱我。那时候他喘着粗气，贴近我面颊，厚嘴唇里喃喃地念叨过。

猛然，我看见那个粗壮的身影在竹丛后边闪动，象

逃避什么似的，轻捷地躲进屋里。

他回家了，可并没把我放在心上！

于是幻梦又一次破灭了。

最初的震骇过去以后，我反复自问：“该怎么办？”

当然，应该是：永远不再见他，永远不理他。

我绝不会去赖着一个倾心喜爱的小伙子，糟踏自己圣洁的感情。爱情消失之后，不可强求。强求的念头即使在最最震怒失望的时候，哪怕在梦里，也不会出现的。

我不可能想到，爱情属于心灵和理想的范畴，而心灵与理想，极少能够战胜强大而冷酷的现实。不可知的冥冥力量又一次摧毁了我美丽的想象，这次打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深刻。

我并不知道，他这次从矿上回来，给我带了一份礼物，那是他荣获先进生产者称号时，工会奖给他的一个笔记本。红封皮、烫金字、二十四开、带插图。

我并不知道，他每天从窗口隔溪望着我，默念着不知从哪儿抄来的诗句：

“你的窗户朝着东方，由此我更爱太阳；

愿你能安慰我的心，把温暖留在我心上……”

他是爱我的。可是母亲另外替他物色了一位姑娘。

母亲动不动哭鼻子，说不能眼看儿子葬送了前途。

啊，笔记本还是不要送，免得大家都认为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免得小珂据此而纠缠——这是他的想法。

从此，我不再朝小溪对岸张望。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缸子的新对象来山沟露面，这个消息给了我最后的、最彻底的打击。

我的自主精神从来很弱。弓着背，缩着头，象一个饥寒交迫、神情萎靡的婢女。而她对社会的顺应，她的柔弱胆怯，也被蹂躏够了。

这一切全可以推给客观。换言之，推给物质世界。我的懦弱全是外部世界造成的呀！一切都可以从物质世界得到解释：悲哀、软弱、怨恨、自卑……

意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物质第一、精神第二，颠扑不破。

就此为止了吗？

精神的活动就这样被动无能吗？

即使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解释，精神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要转过来为物质服务。精神要在活动中显示其自身。没有精神对物质的积极反馈，人也不成其为人。当

然，服务的形式是千差万别，复杂多样的。

从某个时候起我的反抗精神抬头了。渴望着挺起胸膛做人。越来越强的自主精神攫住我，驱使我向一切压力宣战。

从前，物质世界以它的强大压倒我时，我经常受着莫名的煎熬，为自己的弱小、卑贱、屈辱而痛苦，感到压抑又无力反抗。

人们都喜欢那时的我，常有人寄予同情、给以怜悯，常有人夸我温顺、勤劳、能忍耐。大家都喜欢小人物，因为小人物顺眼。

一旦这小人物要对命运表示反抗，要抬头挺胸，白眼和非议便跟着来了，因为看起来不那么顺眼了。而他们廉价的怜悯和同情便飞向爪哇国。

可是我，宁愿不要同情、怜悯、夸奖，甚至于帮助，而愿意挺起胸来做人。挺着胸，物质世界的压力就在无形中退走，让位于高昂的精神力量。我什么也没有失去，反而获得了许多：自尊、自主……这样，虽然内心还是极为不宁静，可这不宁静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因卑贱屈辱缩成一团，而是焦虑于怎样依靠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去跟一切外部压力作战。

啊，没有抬过头挺过胸的人怎能明白，抬头挺胸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幸福，这幸福常常压得我喘不上气，眼里进出喜悦的泪花！

从某个时候起，我又常跟竹生呆在一块儿。因为他有知识，因为我不再梦想去慈竹小院当温驯的小媳妇。

雪白的细纱蚊帐，洁净光亮的黑漆书桌，反光丝质粉红被面，全都簇新、闪亮，跟灯光交映生辉；泥地坚实，象是打磨过的，且扫得极干净——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居室。

灯光从瓦缝中向漆黑的夜晚微笑。桔黄的灯光召唤着我，每到晚饭后，我便向着竹生的小瓦房走去。他的笑脸热情、诚恳——他素以好客闻名乡里。我俩相对促膝，喁喁到夜霜染白田野、月亮偏西。

谁能明白？心情沉重的，是他，更是我！

“……剥削，什么叫剥削？阶级划分多么明显，你竟不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有人拿高工资，住成套的好房子，出门有轿车等着。而最大多数的人呢？劳动人民，象我们队里的社员，饥饿、劳累、衣不蔽体。说远了你没有概念，公社书记你总认识吧？领工资、吃国家粮，他的利益跟社员的利益不一致，由他来管生产，怎

能管好？他属于另一阶层。国家抽出人民的血汗钱给他发工资，却并不为人民增加收入，你说他叫不叫剥削者？还有我们的队长……”

超出法定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规范的言论！超出法定阶级关系规范的言论！

顿觉视野陡开。入迷似地，我盯着他的眼睛。微微凸出，黑黝黝，亮闪闪，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它们经常怀疑、挑剔、不信任地盯着对方，绝对不盲从。这双眼睛是诱惑人的。

但，我的入迷不是爱情——我非常明白。

有那么多年轻姑娘被迷惑过。这眼睛富于魅力。它们一眨不眨地盯着你，直看到你耳热心跳，想入非非。

可惜，竹生的恋爱老是不成功。他先先后后谈过好多次了。

有一个夜晚，与已逝去的若干夜晚一样，宁静、温馨、充满着田野里的清新气味。我踏进瓦房门的时候，只有竹生的老父单独在家。

老头左臂瘫痪，左手指头象鹰爪一样，尖削而弯曲，还不停地痉挛。他呆滞的眼珠，盯着人一看就是半小时。

他就用那使人害怕的眼神盯着我看了好久，看得我

浑身不自在。

这老头是什么意思呢？一边躲避他的目光，一边在心里嘀咕。

“我的竹生只比你大一岁！”他突然蹦出一句。

这下子轮到我盯着他不转眼了。

幸而此时门吱喽一声，竹生提着猪草背篓，带着夜晚的凉气进屋来了。

他对我笑笑，很亲切。我看看他，又看看他父亲，预感到今天晚上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东拉西扯谈了一阵。他突然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盯住我，那神气跟他老父刚才盯着我时一模一样。

“小珂，”热情闪烁的眼睛迫使我抵下头。“我想跟你谈谈……谈谈，关于我们的终身大事……”

我害怕得呼吸都停止了，不知所措，竟“蹬”地站起来，“那，不行的。”

竹生瞪着我，眼神极其复杂。眼里有好多好多东西，让我怜惜，让我恐惧，但我却清楚地看到一点：怨恨、讥诮。没法跟他解释，什么也不能说。在他那吓人的瞪视中，呆了一霎，便转身逃离他家。

黑夜的凉风抚慰着我，吹冷了发烫的脸。我独自站

在小溪边倾听汨汨水声，许久，许久。仿佛麻木了，痴呆了。

竹生的谈吐在耳边萦绕。那些未必正确的言论，象一线飞舞着灰尘的阳光，刺疼了我的眼睛，使我看到灰朦朦天际之外，还有更高更辽阔的一线青天。我曾经惊奇、怀疑、犹豫，不停地画问号，可也对那九重天之外的蓝湛湛青天产生了浓厚兴趣。

原来世界是博大无垠、丰富多彩的！没有哪种规范能够囊括万物！

不知过了多久，我从麻木痴呆中惊起，思如泉涌。

我恨自己！为什么刚才不听完他的话呢？他的意思绝不是那么单一。他所要求的，有比爱情更为复杂的东西。

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我不能原谅自己。自尊之火是竹生点燃的，为此我永远感激他。可我太自私，太狭隘！

心里一阵发紧，又一阵发痛。怎么就想不到爱情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世界？！

象农民吝惜粮食，书呆子吝惜书本，守财奴吝惜钱财——我是如此吝惜自己的感情。对竹生，两度袖手旁观，不肯给予帮助。

机会丧失了，它一去不返。已经不可能再与竹生相对促膝。

我在溪边直坐到浑身冰凉，连心窝里也凉透了。难受得想死，想了很多很多，真想永远脱离这痛苦的生活。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痛苦中煎熬？

我的难受是双重的：心的最深处还保留着初恋时期的偶像，至今念念不能忘。

缸子。

姑娘大了，总得嫁人——不嫁给本乡的小伙子，就要嫁到外乡去。

落叶飘飞的感觉第三次攫住我。在这块土地上，我是多余的、外来的，是极不牢固地附生着的。

稳定感丧失了。在这个地方住不下去，应该离开，何况，本乡好多姑娘受不住山沟的贫困饥饿，相继远走他乡。

这正是四川妇女大量流入福建、东北之时。

我也应该走，走……

去哪儿？

扔下妈妈！？

四人帮倒台，招生制度改革，“招生办”和“招生组”

遍及各区、乡。

我气势汹汹，双手叉腰，站在公社的“招生办公室”里。

反抗心理发生着病态变化。当年怯生生找人家要凳子的小姑娘，现在在哪儿？

“为什么不登记？”我逼近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她是招生工作组组长，正吃惊地扶着眼镜。

继而为我的态度气得满面通红。她很克制地回答：“文件规定，必须具有高中学历。”

“你来看，”我抓住她的袖子，毫不费劲地将她拖起来，拖到“布告栏”旁，那儿贴着《人民日报》的招生简章。我用指头在一行铅字下面划：“你没看过？”

她凑近去。“……或者具有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程度

“哦，我没留心这句话。”她讷讷着，略加考虑，又反问，这一反问弄得我无言可对：“你用什么来证明你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呢？有小发明吗？或者，文章登过报吗？”

急中生智。“我写过小说。”

“你？”她不相信。“发表过？”

“没有发表。可是，凭什么说我的小说比发表的小

说差？”我赶快放软了口气，讨好般地说：“明天我把小说送来审查，行吧？”

她如释重负。“行。”

我，只要能报上名，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当晚熬到曙光初露，写了近万字的“小说”。

我被父亲曾经任教的大学录取。不久，妈妈摘掉帽子，落实政策，也返回大学校园。

阔别二十年的地方！

还依稀记得那斑驳的围墙，小时候觉得高不可攀的，其实却只比头顶高出一点点。还有，上幼儿园时每天必经的水泥小路，路两旁的柏树曾是那么青翠挺拔，如今，柏树已七歪八倒、枝柯横陈，失去了军营般的整肃精神。

那唤起过我多少美丽想象的小湖，以前曾是银灰色鱼儿的乐园，现在也已荒废，杂草一直长到湖中间，不知名的小虫，滑腻腻，在水草中蠕动。

童年住过的房子也衰败了，虽然还没倾圮。石墙上，还有石板铺的院子里，到处有杂草探出头来，挑战似的，对着人摇头摆尾。

我的生身父亲就死在这幢小房子里。

这房子留下了我童年回忆中最深刻的一幕，死亡以

它全部的神秘莫测，第一刺激了我的幼稚的心灵。现在，它里面住着谁呢？

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从半开的门里跑出，瞧他那神气，好象我是来偷东西的。

这里可以算是我的家乡？一切都格格不入，跟记忆中的相去甚远。我认不出它们，它们更认不出已经长大的黄毛丫头了。

我不属于这儿，它不是家乡。

那么，我应该属于哪儿呢？

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多么重要的转折，即使在我努力压抑、折磨自己，使自己成为合格的农家小媳妇的时候，有谁能知道我深锁在心灵里的求知欲？而今，我终于踏进来了，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当我急匆匆地夹着书本走向教学楼和图书馆时，还常常以为是梦。大学呵，连树叶都绿得可爱，半透明的，香樟树长得很高，枝柯舒展，叶片浑圆，亭亭玉立。夹竹桃藏在香樟树底下，枝条柔软，叶片象手指似的细长，婀娜多姿。然而，大学并不是我的归宿，就象当年挑煤时路旁的那棵古松，在底下喘口气，歇歇脚，还得走。想到这些，我不免伤感，于是眼泪就悄然地流出来。

可我为什么要哭呢？

要说也有一丝难过的话，是为了我生活过二十年的山沟。本来就不牢固的联系，如今彻底断了。我跟那儿没有任何关系了。直到四年后，我又匆忙离开大学浪迹天涯的时候，我仍在想，我四海为家——我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录音机轻轻颤动。“……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我的心也随着歌声，随着录音机一起颤动。是呀，流浪。我的故乡在远方……

来西藏工作，转眼已经两年了。我自己都不明白，当初是什么吸引着我。是雪山、是海子、是珍珠般滚动的羊群？是蓝天上的云朵，那么洁白而优雅？或者，是美丽的藏族姑娘和英武的藏族小伙子，那浪漫的异域情调？

反正我是一片枯叶，飘到哪儿，就在哪儿生活，飘得越远越好。

在西藏过得很愉快。虽然愉快，不稳定感却并没消失。在这儿，呆不了一辈子。落叶归根的话不无道理。

要是跟妈妈似的远方有个故乡在等着你，那该多好。

无论你浪迹何处，心里总有一块是踏实的，你总会想：我要回去、回去，那儿有我熟悉的山山水水，有我世代相依的血缘亲属。

可惜并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天底下，没有家乡的人正越来越多。

我经常悲哀地想给自己找一个家乡。命运的流水把我冲到荒滩上，刚刚缓过一口气，又被另一股无名水冲走。挣扎着，呛咳着，头晕脑胀，无能为力。

碧绿的嘉陵江，两岸青山，嫩绿的麦苗和玉米苗，油绿的广柑树，还有一座座小院落，院落边的竹丛，芭蕉，院落里边的人……常在梦中出现，真所谓神萦梦绕。

我把这山沟当作家乡，事实上它并没有真正接纳我。在那儿没有一个亲人。也许有些人曾被我当作亲人，他们也待我亲人一般，但这种联系毕竟太脆弱，既不是血缘的，又不是精神的，只是感情的。

这点感情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随着思想差距的增大，日渐淡漠。我不否认这种淡漠是唯物辩证法应该承认的。虽然淡漠之中并不是没有一点惋惜，并不是毫无留恋。

永别了，不是家乡的家乡。

“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

录音机还在颤抖。

我的心也轻轻随之颤抖。

（ 本文曾以《思乡成疾》为题刊登于《西藏文学》
一九八五年特刊，获当年自治区文学创作二等奖 ）